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九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第七篇 林彪篇（下）

——绝境中的林彪

九、第三次庐山会议

（一）前奏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 to 九月六日，中共第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这次会议在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导致了林彪的坠落。此次庐山会议之前，有过两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彭德怀落马；第二次，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这次算第三次，三次庐山会议，都成为标志性事件。

一九七零，文化大革命最凶狠的时间已经过去，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连红卫兵都已经拍拍身上的灰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该上台的都上台了，特别是江青和林彪的人马，在九大已经瓜分权力完毕。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如果想继续扩大势力，只有攻击对方了。

尽管如此，上层的政治生活方式一点都没变，大家还是文革斗争那一套。所以这一次庐山会议，斗争的气氛反而是空前的激烈。

大会主题有两个，对内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의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

对外：“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一系列的旧话重提，而且还没来得及说，剩下的就是斗争了。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大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按照这个论调，接下来应该首先讨论宪法修改的事。接下来的程序，关于“宪法修改”的报告应该由康生作。然而康生未登台，林彪却上台了。注意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这个动作和林彪的一贯形象很不相符。

林彪讲话前后半个小时，观点不多，翻来覆去地讲。他已经准备好了，人生走势如何，在此一搏。开场白部分吹捧：“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场白之后，渐渐切入正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主题部分，林彪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所谓国家元首，就是指国家主席。

所谓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

——这些观点也没啥新鲜，也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那老一套。

林彪讲完后，康生紧接着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表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是否设国家主席——便是庐山会议动乱的根源。这一切究竟是咋回事呢？

（二）关于国家主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共有过两位国家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刘少奇上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但是刘少奇到死的时候都是国家主席。中共九大召开时，刘少奇还没死。现在刘少奇死了，国家主席的位子空了。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同时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

泽东的意见，开始准备修改宪法。当时林彪在苏州，让叶群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因为林彪和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陈伯达、张春桥这两位大理论家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时吵了起来：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而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就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理睬林彪。林彪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有答复，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林彪见毛泽东没有反应，人在苏州就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时间是四月十一日，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此条言不由衷。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可有可无。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受够了各种各样的副主席。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表态不设国家主席。

四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威望，凡事也就是蜻蜓点水一下。同一件事，强调三次，不说绝无仅有，至少非常罕见。林彪对毛泽东向来都是跟着画圈，试图站在毛泽东的背影里。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却一反常态。毛泽东三次表态之后，林彪依然故我。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一九七零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

家主席一章。

毛泽东以为，自己三令五申强调不要设国家主席，事情应该摆平了，哪想到庐山会议刚开始，林彪就半路杀出来，提议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日后说，他们想要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突然袭击——林彪精心设计的突然袭击。

——那么他想要干什么？

（三）林彪的念想和资本

其实很简单，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据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他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夕，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刘少奇死后，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之间的纷争开始了，而且表现形式很独特。

毛泽东不可能再担任国家主席，因为之前他已经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如今都七十七岁了，老胳膊老腿，也不好上了；再说，上去的话，那样等同于说，文革就是夺权。林彪很了解毛泽东的性格，所以他主张设国家主席，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又不担任，那么只能是林彪了。林彪很想成为国家主席，虽然他的名字写在党章上，是毛泽东的战友和接班人。但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有点尴尬：党内一把手是毛泽东，军委主席是毛泽东，这两个头衔，只要毛泽东还在，林彪想都不要想。国务院总理的权力很大，但那是周恩来的菜；林彪也吃不下，因为周恩来干的活太多了，林彪的身板干不了那么多活，而且干活太多会得罪人。想来想去，只能是国家主席了。

虽然中国的国家主席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好歹也是正职，不像挂着一堆副职，给人感觉千年老二的样子。而且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天知道最后能不能接班？如果还以一系列副主席的头衔挂了，太不值了，所以他要争取成为国家主席。

以上是从个人角度分析。政治人物要说全部为公废私，那不现实；要说全部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同样不现实。为私还是为公，任由后人评说了，后人的立场不一样，所得结果也就不一样。所以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也不能说全为了自己，从集体角度看，国家确实需要元首。

但是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另一个他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原因后面再分析。

这样就造成了上面的局面：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并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并表示他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也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情形非常有趣。背后透出两点信息：一是毛泽东和林彪有了裂痕——很严重的裂痕；二是林彪的政治水平有所长进，玩起来也像模像样了。

林彪虽然想当国家主席，却也不至于傻到要和毛泽东对着干。他之所以敢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是因为他私下估算过成功率。当时设国家主席的呼声非常高，无论如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国家元首。即使没有国家主席，也得有类似的头衔作为国家的代表。五大常委的意见也很一致——要设国家主席。

周恩来的意见：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

——周恩来是干实事的，他的意见代表一大堆老同志的意见。

康生表态：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康生是文革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文革新贵的想法。

加上陈伯达和林彪，五个常委里有四个赞同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林彪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想给毛泽东来个措手不及，生米煮成熟饭。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又能抬高自己的威望，为日后正式接班造势。然而林彪的政治手腕虽然有所进步，但还是有很多弯弯绕他没弄明白，等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

既然战线已经铺开，剩下的就是战斗了。

（四）所谓天才论

林彪的讲话达到了预期效果：接下来是康生讲话，他表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进一步完善，说：“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看见康生的表态，林彪感到一丝喜悦，而毛泽东则波澜不惊。

当时表示同意、拥护的还有陈毅。以前开会陈毅总是被分在“华东组”，当上海帮的理论家们的口水打靶用，很是心烦，这一次分到“华北组”则轻松许多。其实陈毅早已远离政治中心，不了解毛泽东多次明确表示过不设国家主席，而对江青和林彪两帮人马的大体情况有点了解。陈毅对江青那帮人不买账，对林彪的印象也不怎么好，但相比较而言，还是林彪靠谱些，所以他选择支持林彪。

接下来，林彪的忠实粉丝——空军司令吴法宪跳出来建议：明天全会各小组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接下来是陈伯达的表演，表演题目叫“天才论”，时间是八月二十四日下午。

陈伯达的讲话还是老一套：首先把毛泽东和林彪狠狠地歌颂一番，尽管他的福建口音很多人都听不懂，但也能知道他的意思。接下来他对林彪的讲话搞一个概括总结：“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好、非常重要。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既然毛泽东已经三令五申表态了，陈伯达唱的是哪一出呢？其实也没啥，为了给林彪造势而已，充分发挥“捏橡皮泥的绝活”，用林彪的话证明林彪的观点。

陈伯达引用林彪的话，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

——反正就是说毛泽东是天才，把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吹起来的泡沫继续吹下去，只要那泡沫还不破裂就没有问题。

既然要竭力证明毛泽东是天才，那么其它观点就要批判了。陈伯达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其实那些评价已经很高了，而且很中肯，干嘛非要无休止地吹嘘呢？

陈伯达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还是要继续批判：“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理论家都要证据的，说人家居心不良，必须有证据。陈伯达的证据也很简单：“有的反革命分子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

——穷图匕现：凡是不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就是反毛主席、反革命！看看这顶大帽子，即使在当时那帽子满天飞的年头也显得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看看陈伯达的论证过程，整个都是不确定的，有人，有人，有人。

但是在场的人很明白：“有人”，具体指的是张春桥。

咋回事呢？号称理论家的张春桥当然不敢对毛泽东不敬，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而能让张春桥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本人——连江青都不能。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又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看起来相当拉风。文革开始以来，虽然干过很多混蛋事，得罪过不少人，但他始终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大家看他斯斯文文的，一脸正经，没几个人知道他已经委身林彪。

而且很多人对张春桥看不惯，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看见江青那矫揉造作的样子就来火，因为陈伯达和林彪的观点一致，所以就支持陈伯达。

比方说陈毅，他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这种人利用了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的宽大，是不能容忍的。”

陈毅这一席话，现在听起来很过火，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属于正常言论，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的话和陈伯达一个调子，变成了是对陈伯达发言的补充。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在全会印发，内容大致是：大家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对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党内有人否定毛泽东是天才；并且注明，陈毅也发了言。

陈毅的讲话就此成为希望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证据。此后陈毅一次又一次的检讨，特别是九一三事变之后，陈毅的大心脏也跳得更快了。

（五）冲锋

陈伯达以其特殊的身份打头阵，如战役中的先锋，干得很好，效果不错。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既然是一场闪电战，光有先锋是不够的，后续部队还得跟上。后续部队就是四大金刚，实际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二十四号早晨，陈伯达发言之前，叶群就交代大家：“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

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根据形势需要，大家统一步伐，按照以下方式行事：

第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观点。——那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牌，基本点，一定要坚持。

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目的嘛，即使迂回一点，也要达到。

第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攻击江青派的人，虽然不点名，也知道在说陈伯达。

第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的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第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这要看个人的表演水平了。

当陈伯达按照既定的战略在华北组表演时，中南组也很劲爆，因为叶群和李作鹏都在那里。他们主要攻击两个人：点名攻击张春桥和不点名攻击周恩来。

攻击张春桥：上海是“反复旧”的根子，张春桥批评湖北省委领导人是错的，湖北的造反派就是按上海《文汇报》的调子反对省委负责同志的。

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有人”，指张春桥。

不点名攻击周恩来：有的人吃“洋面包”出身，不懂做工，不懂种地，不会打仗，是常败将军，在中央苏区执行王明路线，打败仗。——虽然没有挑明，但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几个常委中，康生吃过“洋面包”，但没有到过中央苏区，没有指挥过打仗；陈伯达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打过仗；张春桥、江青，他们没有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指挥过打仗。其他人都已经靠边站，不值得他们浪费口水。

——为啥要攻击周恩来？后面再分析。

西南组的表演也是有声有色——因为吴法宪在那里。他是政委出身的，搞政治是轻而易举，他说：在这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西北组有李作鹏在，他说：“对毛主席思想的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一天忙碌下来，基本完成任务，而且效果不错。虽然忙碌，却很充实，大家看见了胜利的希望——那可不是一般的希望，而是接近最高权力的曙光。

二十四号晚上，其他人都在积蓄力量时，陈伯达又拿出他的平生绝学来干一件事，把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精心修改之后下发。

八月二十五号是决定性的一天。那天早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二号简报下发。简报首先拍马屁说：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接下来提出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

简报再次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态说把那种人“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这样一份简报，实际上是一枚炸弹，威力堪比第一次庐山会议时彭德怀的“万言书”，意味着新的斗争开始。

林彪听了陈伯达的简报后表示很满意，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听，心想完了，首功被陈大理论家抢去了。不行，要亡羊补牢！吴法宪赶紧让西南组也出简报。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吴法宪把所有能想到的最尖锐刺耳的词语都加在自己的发言中，什么“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什么“定时炸弹”，什么“罪该万死”，什么“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

李作鹏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都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

邱会作：“要加温！要加温！”

一看那情况，江青的人马架不住了。张春桥还好，能沉住气。江青本来就是演戏的，别人不说话，让她上蹿下跳可以，指望真刀真枪地干，她没那个决心和韧性。至于姚文元，本来就是一个落魄文人，因为特殊机缘才辉煌腾达的，让他和那帮大嗓门的军人对吼，呵呵，即使有那才能也没那

胆量。

所以简报刚刚下发不久，江青就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那才是她的真实形象。没有毛泽东，她或许是一个相对出色、兼具个性的女人，但是绝对没有实力站在政坛的最高舞台上。据说江青一看见毛泽东就尖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那么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虽然他没有参加小组讨论，但他对形势的走势了如指掌。江青没有去告状之前，毛泽东就把许世友喊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那是毛泽东释放出去的第一个信号。许世友回去一放风，那些不是林彪死党的军人，都会谨慎行事。

二十五号下午，小组继续讨论。毛泽东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分别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单独谈话，要他们正视这一最新事态发展。

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刚才他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全会各组讨论了不该讨论的问题，这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

毛泽东给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把目光投向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陈伯达那脆弱的心脏立即加速乱跳起来。他隐隐感觉到一出悲剧正在上演，他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昨天，不，今天早晨，一起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美好！

毛泽东又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庐山的政治风向就此转向。

林彪沉默地回到住所，脸色苍白。他知道自己精心准备的战术被毛泽东瓦解了。他在思考着自己的命运，想下一步该如何落子。

叶群赶紧招呼秘书：“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造成今日之被动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上蹿下跳造成的。

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他的不淡定，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林彪有了这样的活宝老婆和宝贝儿子，也是命数。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总之是败了，一败涂地。

接下来两天，他们也处于这种惊慌之中。因为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说是换换空气，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在那两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天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把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样，林彪那帮人（吴法宪等人）就沉默了。康生（老妖怪，见风使舵，反应迅速）、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活跃起来，到处做工作拉人。

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

和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又有一个“军事俱乐部”。毛泽东让陈伯达去和康生、江青那里谈谈。结果康生和江青把陈伯达骂了一个狗血淋头。他们说陈伯达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他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等等。陈伯达知道自己完了。他本来胆子就不大，毛泽东一批评，江青等人一骂，更是变得神经兮兮的。

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打电话喊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告诉他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话说得非常凄凉，搞得几个军人为他愤愤不平。

就在陈伯达被骂得狗血淋头时，周恩来和康生找到吴法宪了解情况。康生对吴法宪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

吴法宪当然不买账。康生来对吴法宪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看看康生那反应速度。当初林彪的观点他又是赞同又是拥护，跟吴法宪有何区别？其实康生在给吴法宪设陷阱。因为二十四号分组讨论时，陈毅在华北组讲话，吴法宪在西南组讲话。如果没有交流，是不会相互知道的。康生向吴法宪询问陈毅的情况，就等于说它们是串通的，所以说康生是老奸巨猾。

幸好吴法宪也混了很久政界，对政治斗争很了解，马上反应过来，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一席话说得康生的老脸没地放。

但是吴法宪依然被要求写检讨——周恩来让他写检讨。周恩来的意思让吴法宪写点检讨了事，给“林副统帅”承担点责任。但是林彪很不同意，因为林彪明白，检讨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彭德怀现在还在写检讨呢！所以林彪对吴法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此时的林彪已经领悟到了某些东西。之前他讲话时，所有人都表示拥护。现在风气刚刚转变，那些所谓的拥护者摇身一变都成了批判者。所以林彪感叹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此时的他已经逐渐理解十二年前那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处境。

当林彪感叹人心易变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沉思——怎么办？

对陈伯达的深浅，毛泽东太清楚了：此人一辈子虽然还算顺畅，建国后长期身居高位，但靠的是在高层之间的钻营，并无主见。这一次跳那么高，肯定是下决心了。陈伯达的决心就是林彪的决心——但是在当时还不能处理林彪。

林彪和毛泽东是一体的，他是副统帅，是接班人，这已经是写入党章的，大家转不过来弯。但是在毛泽东的设想里，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就必须处理陈伯达。

处理陈伯达，最关键的是可以敲打林彪的整个军人团体。那么如何处理陈伯达呢？那是一个艺术活。直接一巴掌拍下去，很容易。以陈伯达的分量，不够毛泽东一巴掌。但是那么做太粗鲁了，而且没有技术含量。

也可以发动别人批陈伯达。比方说毛泽东让陈伯达去找江青和康生，让他们用狗血给陈伯达洗洗头，那样就比较有技术了。因为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嘛，政治局委员嘛，理论界地位高嘛。让他们骂一骂陈伯达，杀杀陈伯达的锐气，再让其他人一顿乱拳，陈伯达基本上就玩完了。

如果把技术再上升一个层次，那便是艺术。

最艺术的办法是让林彪的人去处理陈伯达。让林彪同意处理陈伯达，那样他将永世不得翻身。第一步是要稳住林彪。吴法宪回忆：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毛泽东找林彪掏心窝子，实际上是想换取林彪的支持。林彪不支持不行，但是林彪可以不配合。后来林彪还是配合了，让叶群他们去找江青，把所有脏水都泼到陈伯达头上。这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掏心窝子是成功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进入十二年前的程序。大家或许很纳闷，在林彪设计的闪击战里，各位粉丝纷纷亮相，但是不是少了一个，黄永胜怎么没有登台亮相呢？因为黄永胜不在台下，他留守北京。他是总参谋长——军方的神经中枢。

黄永胜虽然在北京，对庐山的事却很清楚。吴法宪一直向他汇报。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跟他保持联系。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

吴法宪回忆：林彪的讲话内容，我打电话告诉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

——虽然不在台上，也不愿少了戏份。由黄永胜急切的心情来看，如果他在庐山，嗓音也不会小。

十二年前那次庐山会议，总参谋长黄克诚按照原定计划，也是留守北京的，后来也是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才上山的。十二年前的转折点是毛泽东的表态，如今也是一样。

十二年前，为了批彭德怀，让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山。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很铁，是军委里的合作伙伴。由黄克诚批彭德怀，既能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只是黄克诚铮铮铁骨，不为所动，把自己变成“军事俱乐部”一员。

十二年后，为了批陈伯达，让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山。黄永胜是林彪的人，又是总参谋长，由黄永胜出面批陈伯达，也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不需要他亲自说话，只要表态一下就行了。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飞到庐山。在这之前，吴法宪他们还能和黄永胜保持联系。二十九号之后就不一样了，一切由周恩来安排。

吴法宪回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到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吴法宪回忆：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做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做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吴法宪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表示：“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毛泽东和黄永胜究竟说了啥，已经难以探究。大意就是，毛泽东说陈伯达那个家伙不安好心，让吴法宪几个大老粗上当了，黄永胜表示认同。经过那一番谈话之后，很明显黄永胜表态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可不想也不愿意当黄克诚第二，因为他不是黄克诚，虽然战场上是响当当的好汉，但就沾花惹草的那档子破事，人品方面就和黄克诚没法比。当然咯，陈伯达也不是彭德怀，也不值得黄永胜拼命。如果当时要批判林彪，黄永胜倒是有可能称为黄克诚第二。陈伯达，他不配。

把黄永胜的思想搞通，再让周恩来去做吴法宪那几个人的工作。吴法宪写了检讨，那么他们之前的那些事就这样过了。接下来还需要做两点：第一，毛泽东表态。第二，让林彪批判陈伯达。

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陈伯达所编的《恩克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克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

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说陈伯达的理论不是马列主义可以说得通。要说陈伯达有多大能量，太高估他了，必然是牛刀杀鸡，必有后招。

（六）有趣的一幕

毛泽东的表态算是判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死刑，但是谁来执行“死刑”比较合适呢？周恩来可以，但是周恩来身边的人都已经靠边站了；江青和康生也可以，但是难以服众；只能是林彪了。

毛泽东又把林彪叫过去，让他出面。林彪没办法，他出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以暂时撇清他和陈伯达的关系，暂时把所有责任推给陈伯达，暂时保住他在军方的力量和地位；弊也是很明显的：陈伯达是林彪身边唯一的笔杆子，批判陈伯达，相当于自断一臂，而且有了陈伯达这个先例，日后和文人政客就不好搞了。归结起来是利大于弊，但是林彪没有选择。

所以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林彪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时间是三十一号下午三点钟。

三点半，陈伯达出场。会议场面上的各人表现是乖乖的，因为几天之前，大家还在同一条船上，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一转眼就把口水喷向对方，兵戎相见了，虽然各位都是久经风浪，神经足够粗大，一时还是转不过弯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陈伯达比较识趣，自己批判自己：“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吴法宪很不好意思，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则悲戚的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吴法宪他们则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

——哪里是批判大会嘛，分明是惜别。大家同坐一条船，意见都是一致的，所有谋划都是一起搞的。而且陈伯达还比较能干，前两天还惹得吴法宪和邱会作一阵嫉妒。这事至少说明，林彪的军人班子还是比较够意思的，比起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要真实一些。当时在“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刚刚表态，康生、江青等人那是一转眼就把尿盆子全部浇上去了，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但是没有关系，只需要一个名头就可以了。只要让大家知道林彪主持了陈伯达的批斗大会就行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下面的人去办。

当天晚上，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林彪主持。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主题还是批判陈伯达。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让一贯批判别人的陈伯达充分享受到被批判的滋味。

首先是康生，绝对不会放过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之前那番言论不仅对着张春桥，也连带到康生。如果陈伯达得逞，那么此刻享受批判的，估计也有康生了，所以康生很来火。因为从来都是他打击别人，没有被别人打击过。对于陈伯达他是从来看不上眼的，经常在中央文革小组内修理他。但是陈伯达偏偏爬得比他高，政治家常委排名比他靠前，让康生很生气。虽然之前他已经把陈伯达骂过好几遍了，但依然难消心中之恨；而且他很享受把别人打翻在地的滋味，所以康生的火力很猛。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封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

康生说陈伯达善于搞分裂活动，想要在此次会议上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

康生说陈伯达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这一点最为致命，谁都知道陈伯达是文人，如今竟然搞军事俱乐部，而且把吴法宪等人也“引诱”了。

这就是康生的毒辣之处：名义上批判陈伯达，暗地里把吴法宪等人拉下水，就可以趁机把手伸到林彪那里。他仿佛看见另一场天崩地裂的好戏将要上演。

而且康生还有一个帮手，他夫人曹轶欧也是一个激进者。她直接对吴法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吴法宪一看那女人，眼皮一耷拉，不鸟。

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吴法宪赶紧给叶群打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也没办法，只能安慰吴法宪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周恩来觉得闹下去也不是办法，下午亲自去了西南组，对大家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但是陈伯达就那么点料，也不够批判的。所以毛泽东就提议大家不要再搞了，讨论一点其他问题，然后散会下山。讨论了宪法修改问题、召开人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讨论的。大家忙着搞斗争，忘了，现在拾起来补上。

九月六日大会闭幕，毛泽东发表讲话：“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指陈伯达）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张春桥）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概括总结，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庐山会议结束了，但是政治斗争没有结束。正是从庐山会议开始，林彪从光辉的副统帅沦为一头困兽。

（七）林彪的失误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表态之后，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句话后来被认定为林彪搞政变的依据，其实很扯。当时林彪还是副统帅，毛泽东还告诉他要他上台呢。当时毛泽东只是批了陈伯达一个，其他人一个都没有涉及到。要说林彪会为了陈伯达搞政变，鬼都不信。批判陈伯达，也就是堵住林彪的国家主席愿望而已。

拿下陈伯达也就是敲山震虎，震慑林彪身边那些有跟陈伯达同样想法的人。毕竟陈伯达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非同一般，从延安相见开始，两人的关系就开始了。几十年走过来，当年的政治秘书成为政治局常委。这几十年，正是共产党由弱变强，兴旺发达的时候。尽管陈伯达只是毛泽东身上的一根羽毛，却也相当耀眼。说句不好听的话，养宠物几十年还有感情呢！如果连陈伯达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扔掉，其他人也就不用心存幻想。

林彪团队里的成员对此惊诧不已。据陈伯达回忆，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愤愤不平之意跃然纸上，还是二十年之后写的回忆录。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非常被动。尽管有很多理由要当那个国家主席，但他始终是一个谨慎的人。按照林彪的行事风格，至少有几分把握才去干。当林彪设计那场漂亮的闪击战，主要依据就是支持率比较高。

在当时那个形势下，大家基本上都赞同林彪的意见。看看康生和周恩来的发言，都表达拥护林彪的意见。然而林彪不明白的是，政治和军事虽然是一个连体怪胎，但是毕竟不一样。军事上，造势成功之后，指挥得当、一番冲杀后，就是胜利。政治上的造势难得多，因为政治家都是善变的。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可能瞬间就会转变。

当林彪以为他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其实就掉入了一个陷阱。

以康生为例。直到毛泽东表态之前，他都是坚定支持林副主席的。对林彪身边那些大老粗也是相当客气。然而一转眼变成什么样子？死死抓住吴法宪不放。康生难道不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人么？当然知道！就是知道才那么干的。如果吴法宪背后没有林彪，康生恐怕都懒得理他。冲着吴法宪去，就是冲着林彪去。之前在林副主席面前点头哈腰，一转眼怎么就变了呢？康生本人敢对林彪如此放肆么？当然不敢。康生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他对毛泽东的理解，知道事情没完。

康生也好，其他人也罢，他们可以支持林彪，甚至说一些肉麻的话，前提是林彪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林彪以为凭他那点实力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左右毛泽东，太不自量力了。想想之前的刘少奇，人脉比他强多了，最后怎么样？所以说林彪步入政坛十几年，政治水平依然没有赶上军事水平。

当初刘少奇可是赢得整个行政系统的支持的，依然无法和毛泽东对抗。当年的康生等人和刘少奇关系也是刚刚的，至少比和林彪强多了，最后还是选择跟随毛泽东。林彪选择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一场闪击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了解政治舞台上那些人的心思。也许是没有能力，也许是不愿

意，反正就是没有摸透。

为啥会这样？说林彪笨，那是不现实的；说林彪不善谋略，也是不现实的。毕竟林彪也是白手起家，从军数十年，身经百战，关键时刻从没有掉链子。虽然就性格方面而言，某些时候他会忧郁、犹豫，但意志的坚韧，思维的缜密，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原因还是习惯造成的。从大的方面说，军事和政治虽然是一体的，但细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

军事上，讲究言出必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政治上，很多时候玩的就是心眼，讲究的就是见风使舵。林彪一辈子，人生的高峰阶段都耗在战场上了，为党为国立下赫赫战功。至于政治，他一开始并不热衷，后来又不擅长。虽然从五九年之后复出，在政坛上也摸索了几十年，总算捣鼓出一点心得，玩得还算可以。但是他身边的那些人，呵呵，已经在政坛上纵横驰骋了几十年。即使放在整个历史上看，都是一流高手。

林彪的班子里那几个人也差不多，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小角色，直接拿上来用，说不好听的，摆不上台面。让他们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修理一下低级别的人（如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整人，邱会作在总后整人）还可以，拿到最高舞台上搞竞争，和那些靠吐口水谋生的人打口水战，说真的，有点强人所难。看看康生同志，整人一辈子，举重若轻，大师级别。如果在战场上，“四大金刚”可以秒杀中央文革那帮人。但是开会时，不好意思，有劲使不出来。

至于林彪那位福建老婆，情商还是可以的，收拢那些军人够用；但是智商，至少和她的位置以及她周围的人不匹配。

林彪的人马中，能玩政治的笔杆子只有陈伯达一个。陈伯达能在最上层的圈子里混几十年，自有一套钻营之术。而且刷笔杆子、派高帽子的本领都是刚刚的。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直接出手拿掉了陈伯达，看似没有伤及林彪团队的筋骨，实则非常要命，相当于打蛇打到七寸。下手之犀利、之老辣，古往今来，少有人能及。

接下来的事情就看怎么收场了。

按照林彪的设想，败了就是败了，把责任推给陈伯达了事，相当于舍弃个把卒子。战场上为了稳固核心阵地，牺牲一部分外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政治舞台上，却不是那样，任何一个卒子都可能引起溃败。

当吴法宪作检讨时，林彪就不同意，让林立果去告诉吴法宪：“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后来吴法宪还是做了检讨。果然，批判陈伯达的大会还没有结束，康生就把矛头指向吴法宪了。

因为林彪很明白吴法宪的重要性：吴法宪是林彪的核心成员，一旦吴法宪挨批，火力必然涉及到其他人，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那些人，连萝卜带泥，都会一起带出来。如果他们都被批了，那么林彪那病怏怏的身躯也就失去了保护，所以他可以抛出陈伯达，但是不想让吴法宪做检讨。

但是吴法宪还是检讨了，而且没完没了。那帮文人则欢天喜地地期待着再来一场狂欢。

（八）没完没了

会议结束之后，林彪和叶群一起去看望了江青。当时的会面非常有意思，两派人基本上算关系破裂了，却还要去看望对方。

林彪打心里看不起江青，因为在庐山上失败了，还是要去江青那里看望她。江青嫉妒林彪的威望和势力，却还是被迫虚与委蛇。双方都觉得吃力不讨好，却又必须这么吃力不讨好地应付。

林彪回去之后，又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几个人去江青那里。这一次江青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几个人立马瞪大了眼睛，说真的，他们几个人是否犯错和江青关系不大。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后面，那话基本上可以反过来说。当然咯，失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只能听。

江青越说越得意：“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这些话惹得几个军人差点就忍不住了。最后江青总结道：“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这话相当莫名其妙，因为黄永胜他们几个都是军委的人，完全不在江青的控制范围之内，凭啥要多联系她？即使在中央政治局，她也并非常委。但那个时代有很多好笑的事，又能说啥呢？

但是这一切只是开始而已。根据路线斗争的经验，这一次又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会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落马，从早期的陈独秀、张国焘，到后来的彭德怀、刘少奇，无不如此，现在轮到谁了呢？陈伯达么？他的地位是高，但分量太小。还能有谁呢？

真正的斗争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的。周恩来和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找黄永胜几个人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事。黄永胜和吴法宪他们也不是笨蛋，早已统一口径，步调一致。任凭周恩来循循善诱，任凭康生横眉竖眼，还是没谈出啥子东西。

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几个人当然不承认。如果承认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就做实了。

其实具体情况，周恩来和康生都知道。他们都在政治舞台上沉浮那么多年了，可谓久经风浪，对于政治斗争那些小伎俩早就司空见惯、了然于胸。之所以还要问一问，不过是走一下程序，为下一步做准备而已。

康生想把问题扯到黄永胜身上，因为在这几个人当中，黄永胜的地位最高——总参谋长。把他扯进来，相信会有更大收获的，特别是想到他背后的那个人，康生就兴奋，因为康生这辈子就是不断打击别人的。从上海开始，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延安整风，整人的水平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毒辣，功夫越来越炉火纯青。建国之后更了不得，每一次斗争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如果不去打击别人，那么他活着就少了很多滋味；而且他已经打击一辈子人了，一般人物他还看不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是陈伯达，他也仅仅持续了几天的热情而已。他一口气咬住几个人不放，目的很明显，就是他们背后的那个人——林彪。

康生对黄永胜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语气相当不客气。黄永胜同样也很不客气，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此时的康生，还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只要林彪还在，他就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所以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

如果连康生和周恩来都谈不出结果，那么只能有如下结果：一，不了了之，放这几个人一马；二，毛泽东亲自出马。

毛泽东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大家都明白，庐山会议上那些事，绝对不是几个人的自发行为，也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

十、毛泽东的选择

（一）敲打四大金刚

庐山上的那场政治风波，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参与，不用林彪说话，庐山之上的其他人都会吃掉中央文革小组。

所有的军人都站在林彪这边，不仅包括许世友那样的领兵大将，还包括陈毅那样靠边站的老资格。原因很简单：军人对理论家横竖看不上眼，因为他们得罪的人太多。整个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张嘴到处啰嗦不停。比方说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不给好脸色看，时不时对他指指点点。对王洪文还可以，可以在一起喝点酒，但也是看不上。陈毅等老师，被那帮人批斗到已经很不耐烦了。

按照会议开始的那个形势发展，张春桥很快就会被批斗，然后是姚文元，甚至连康生都可能被拔出来。那样的话，历史必然是另一个走势——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为啥要选择对林彪紧追不舍？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毛泽东为啥要帮助中央文革小组？从阴暗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私情，这个说法有两个含义。

第一，江青是毛泽东老婆，关系近。这种说法是很不靠谱的，因为毛泽东的权威根本不需要江青去干啥。以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基本上不需要动手。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那群理论家永远不会威胁到毛泽东，军方实权派则可以从根本上威胁到毛泽东。这个说法也不太靠谱，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已经至高无上了，而且有周恩来在，林彪就不可能掌控行政系统，也很难掌控情报系统。个人威望上，林彪更没有办法威胁到毛泽东。

还有其它原因么？还有。

回顾一下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第一次拿下高岗，原因在高岗的自己身上。第二次军内反教条，是彭德怀和邓小平搞错了。真正的第一次斗争，是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

前面的篇章里已经说过，彭德怀写那封信，矛头是指向刘少奇去的。但是毛泽东却趁机解决了彭德怀。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固然恩恩怨怨一大堆，但是在庐山会议那个当口，并不是解决个人问题的最佳时期。毛泽东选择在那个时候解决彭德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维护三面红旗的基本经济政策。

三面红旗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虽然执行者是刘少奇，所以当彭德怀想要有所表示，可能会危及“三面红旗”政策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拿下他。

建国之后，因为大家没有经验，一切都在摸索。遗憾的是，经济建设吃了大亏，导致了大饥荒。

大饥荒又引起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最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过于强劲，把整个行政系统全部都打碎了。

打碎了之后怎么办？接下来怎么走非常关键。第三次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善后工作。那个时候林彪那帮人和江青那帮人就对上了。

情形和第一次庐山会议差不多。当时彭德怀写信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赢得不少人的支持。这一次林彪设计的闪击战，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吴法宪等人的发言更是直指核心人物张春桥。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人可能会让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难看。因为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当时左倾得厉害，作为国家主席，无论如何难逃干系——尽管政策的设计师不是他。

第三次庐山会议，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林彪为首的军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干掉中央文革那几位口水大师。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也是毛泽东。毛泽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设计，不论是谁。谁上，谁遭殃。

正如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为了维护三面红旗；这一次也是一样，为了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必须对林彪动手。当时拉倒彭德怀是毛泽东亲自出马，而且就在庐山之上。这一次不一样了，故事发生在下山之后，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正坐着同一辆战车，很难对他动手；要动手也只能从其他人那里找突破口。谁呢？空军司令吴法宪。

在庐山上，在林彪的团队中，除了已经打成了死老虎的陈伯达，就只有吴法宪要写检讨了。既然写检讨，那就是要承认自己有错误；既然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要追问；只要努力追问，就能问出更多。康生已经很努力了，无奈分量不够，抓不住吴法宪，那么只有毛泽东亲自来抓了。

一九七零年国庆节之前，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林彪怎么又转变看法了呢？是因为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对林彪表达了对空军的不满。吴法宪很听话，想去找毛泽东做检讨，结果三次都没有找到机会，为此吴法宪的心里还有点不舒服，日后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

吴法宪同志，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你的那些身份在别人面前可以显摆，在毛泽东那里一文不值。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生产、批发那些头衔。

吴法宪没办法，继续写检讨。这一次他是彻底用心了，不用秘书，亲自去写。吴法宪回忆：“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看看这一段，说他们搞宗派是绝对错不了的，说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也成，至少比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那个“军事俱乐部”多了一些实质内容。

这一次，吴法宪等到了回音，而且是毛泽东亲笔回的。主要四条：第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是一顶大帽子。

第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把帽子送给林彪的团队。李德生将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不是林彪的人，因此除外。

第三，“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吴法宪说过“毛主席伟大谦虚”。

第四，“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让其他人出来检讨。

吴法宪看到这些，心都凉了；其他人也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领袖如此穷追不舍。说实话，毛泽东这些批语是很到位的，虽然他不知道他们几个人在庐山上的具体细节，但是从这些批语上可以看出，他对林彪团队的动向了如指掌。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毛泽东神通广大，情报工作干得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就不需要情报，从那些简报上就猜出个七七八八。毕竟毛泽东年轻时就在国民党那里工作，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玩了几十年，啥情况没见过？一帮军人想在他面前耍政治手腕，那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班门弄斧而已。

这样，火就烧到了叶群的身上。叶群被迫写一个检讨，但是叶群布置得很精明，找一个不知道内幕的秘书帮他写，那样就可以避免“机密外泄”。

毛泽东给叶群的批示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抛开政治斗争不谈，这些确实是叶群的毛病。后面那个“请其他同志研究一下”，请哪些人呢？

毫无疑问就是军委办事组那几位，就是一直哼哼哈哈拖着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这几个人。如果把他们几个一起拉出来，再加上已经检讨的叶群，相当于把林彪的团队翻了一个底朝天。再接下来就是林彪本人了。

双方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三番四次让那几位检讨，林彪一直不同意，就拖着；所以叶群写检讨时，找一个不知道内幕的秘书代笔。如果仅仅是吴法宪一个人检讨，将来出事了，也就一个人扛着，但毛泽东铁了心要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既然这几个人不肯出来检讨，那就出面敲打。

在林彪的团队中，核心中的核心是黄永胜。他是总参谋长，军方核心人物。庐山开会之际，就让黄永胜上山，表示批判陈伯达的。黄永胜刚下飞机就被毛泽东拉去彻夜长谈。很显然，黄永胜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毛泽东要敲打一下黄永胜。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的办事组。”

这么说黄永胜也不冤枉他。因为庐山那场闪击战，黄永胜虽然不在现场，身为林彪团队和新成员，对事情的进展了如指掌，就在毛泽东表态之后，黄永胜还在电话里让吴法宪帮助他表态呢。对此黄永胜也无话可说。

其实黄永胜当时也挺为难。一边是林彪，直系领导，甚至可以说伯乐。当年黄永胜因为管不住自己的拉链，狼狈去了东北的情形仍历历在目。是林彪给机会他发挥了他的才华，让他的人生迎来了绽放的机会，可以说林彪对黄永胜有知遇之恩。抛开战争不谈，单说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林彪的保护伞，以黄永胜的生活作风问题，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同时黄永胜对毛泽东也是剪不断的关系。因为黄永胜本来就是秋收起义出来的，可以说一开始就跟着毛泽东。后来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最高领导人还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如同神明一般存在，黄永胜等人对他可谓敬畏有加。真让他和毛泽东对着干，他也不见得那份心思和胆略。但也不要指望黄永胜跟着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的后面，不可能！军人即使走上政治舞台，本质上还是军人，对一般的嘴皮子还是看不上的。

敲打过黄永胜之后，毛泽东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了，具体说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三板斧打完，林彪葬身大漠。

（二）甩石头

甩石头，顾名思义，杀伤力很大。对林彪那样力量在军队的人而言，要形成杀伤力，必须能震

慑军队。那么石头该扔到哪里呢？真不好扔。远了，没效果，也涉及不到林彪。近了，不好找理由。因为文化大革命乱的只是表面，整人整风整得再乱，国家机器还在。军队一直在毛泽东的手上，要调兵，必须有毛泽东的同意。

惆怅之际，一支队伍自己出现了，就是三十八军。三十八军是共军最为赫赫有名的队伍，骨干和前身就是井冈山红军。由毛泽东一手调教，林彪一手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骨干，在各个阶段的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抗美援朝中，更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

回国之后，三十八军一直在山海关和北京一带游弋，神秘莫测。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武斗。军队武斗的时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表演的时候。比方说王力到武汉一番表演，惹出了七二零事件，不仅他自己完蛋了，把关锋和戚本禹也一起连累了。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陈伯达当然也不会闲着，到处发表演讲，其中恰好有一次讲话引起了三十八军战士的不满。庐山会议之后，大家努力批判陈伯达，大家都要发言，三十八军党委就把陈伯达之前的讲话写进去上报，并说陈伯达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威信。

本来也就是走一个批判流程，但毛泽东一看，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石头。三十八军是王牌，有分量有威力，需要立马把石头扔出去，于是批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了增加分量，毛泽东把林彪扯出来，说：“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军委是林彪直接负责的，把负责人拉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下结论：要北京军区“批陈整风”，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

——北京军区也正是林彪的重点所在。把军区各个级别的人都拉出来批判陈伯达，可以想象，那石头的分量和威力。威力增加火力，中央文革小组剩下的那几个人全体出动，负责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军委办事组的人却回避。

大会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实际上是批判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李雪峰是北京军区政委和华北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

李雪峰白区出身，一开始是搞文政工作的，抗日战争之后潜入敌后搞武装斗争，转变为武行。后来跟随了刘邓大军，和林彪没有亲密接触。

郑维山起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人，后来也跟随了刘邓大军。在历次战争中，从红军到志愿军，郑维山均有所表现，而且很猛。因为很猛，赢得中将军衔。

从战争的角度看，李雪峰和郑维山与林彪都没有亲密关系。批判他们的原因是：当初陈伯达到处打嘴炮时，两位全程陪同，亲切接待。罪名：放任陈伯达乱跑乱说。实际上很冤枉，当初陈伯达

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红得发紫，站在革命潮流的前沿，相当于文革的代言人，谁敢怠慢？如果当初不接待陈伯达，李雪峰和郑维山估计前几年就参加批斗会了。

但是真正让两人遭难的是在庐山会议上：他们和陈伯达同在华北组，李雪峰还是华北组组长。陈伯达那份简报，就是通过李雪峰之手传出来的。

李雪峰是白区出身，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而且是华北局书记，也算是玩政治的了。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要说他看不到陈伯达那份简报里的含义，那绝对是低估他的智商和情商。也就是说李雪峰和郑维山两人虽然在战争年代和林彪没有关系，但在和平年代有了关系。

但妙就妙在，两人不是林彪的嫡系。批判他们两个，可以敲打林彪的团队，同时不至于惹起过激的反应。用一句俗话讲，叫温水煮青蛙。

也就是说，毛泽东扔出的那个石头，分量足够大，但是落点很妙，既不会暴露自身的终极目的，也不给下一步的行动铺好路。

对此，林彪有所警觉，但毫无办法。

（三）掺沙子

甩一块石头出去，制造问题，敲山震虎的同时，却没有打草惊蛇。

接下来，就可以沿着那个路子走下去，怎么样呢？就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军委办事组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甚至可以说是军队的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进入最高峰的标志有两个，第一，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第二，中央军委办事组代替中央军委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只不过军委办事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那么显眼，没有干那么多荒谬的事情而已。毕竟都是军人，异想天开的事情少些，相对靠谱。

一九五四年，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一切转向正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二人组成，就是未来的十大元帅加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天之后，军委设立了秘书长，由黄克诚担任。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挨批，军委改组。新军委扩充为二十一人，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肖向荣中将为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兼国防部长）主持。当时国防部的十位副部长，除了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上将和廖汉生中将之外，其他八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冲击到军委，军委只有小的调整。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军委发生最大的事，就是谭政大将被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打响之前，作为第一炮，罗瑞卿被彻底拿下。罗瑞卿当时除了是总参谋长，还是国防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罗被拿下相当于军委的一次地震。

地震之后，军委再次调整，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日后叶剑英也在二月逆流中被批判。

文革闹起来之后，毛泽东主张不再设立军委秘书长，理由是：“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军委秘书长原本是要处理日常事务的，也就是干活的。没有那个职位不要紧，活总得有人干吧？

作为军委负责人的林彪就换一个名字，叫军委办事组，代替原来的军委秘书处。但是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替代。因为当时在搞文化大革命，军委那些老师们挨批斗的挨批斗，在家写检讨的写检讨，没有时间、精神和条件执行权力和履行义务，大权基本上被军委办事组拿走了。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吴法宪负责领导。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号。

一个月之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和其它几位人员（相当于群众演员）。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军委办事组还是军委的下属分支，接受军委的领导。军委上面的那些老师日子相当不好过。杨成武按规矩办事，该请示的去请示，该汇报的去汇报，然后没多久，杨成武被打倒，中间涉及到“杨、余、傅事件”，这个在周恩来篇章里说。

当时讨论继任者时，毛泽东比较倾向于皮定均。林彪没有接话，沉默许久之后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也没有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最后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示：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样军委办事组就成了林彪团队的天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号，毛泽东和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四月一号，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五天之后，黄永胜在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

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

从此之后，办事组彻底架空了中央军委，正如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之前架空了中央政治局，而且办事组的几个新兵还写了一篇大作，叫《“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作为整人的教科书，去搞臭军委常委。

由于黄永胜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拉链，以至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其中意见最大的就是他老婆项辉芳，她曾经给林彪和叶群写信揭发过黄永胜。黄永胜当时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长之后，那些花边新闻传播得更广了，甚至传到毛泽东那里。某次开会，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

林彪听了吓了一跳，赶紧为黄永胜辩解说：“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韩先楚和黄永胜不对路。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后，一共干过两件事：第一，整人，这个前面说过了；第二，准备战争。但两者的作用是一致的：整人是为了抓权，战争也是为了抓权。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常常擦枪走火，还发生了珍宝岛战争。当时中央军委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另外还有一个小组，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几位老师虽然挨批、写检讨，但本性不改，依然关心战争和国家前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因为当时世界的主旋律是苏美争霸，争夺的焦点在欧洲。苏联不可能拿出全力进攻中国。中国应该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用外交解决问题。几年之后，中美建交。

但最后还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占了上风，因为人家有实权嘛。军委办事组落实林彪的要求：“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那个要求，就要大规模扩大军工生产，军费比例大幅度增加。中国那个时候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心思、没有钱去搞那些。但是搞军工生产，就可以增加人事调动，就可以在调动中增加新的人手，扩展自己的势力。那些老师们分别被疏散到各个地方。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号，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是：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看看吧，这张名单一共十个人。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没有一个。第二野战军的有两个，李德生和谢富治。其中谢富治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国家机器的重要一员，参与

其中理所当然。其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其中，李天佑将军去世比较早（一九七零年），温玉成将军又被打倒了。刘贤权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且长期在外任职。

等到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军委办事组基本上就是叶群和四大金刚。

如果改组军委办事组，那么对林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虽然谈不上致命。要知道林彪就是靠军委办事组来掌控军方的，被掺入沙子后，林彪的实力将被大幅度削弱。

其实军委办事组里面已经有一颗沙子了，就是李德生。

李德生将军生于一九一六年，河南人，起于鄂豫皖根据地，身经历次战争，从小兵一步步升为将军。左胸曾被子弹打穿，侥幸逃得一命；左手在战场上受伤，留下残疾。抗战时在刘伯承的一二九师，表现很不错；解放战争中是刘邓大军一员；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接受过上甘岭的考验；回国后升任军长，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此后的建设和政治运动中，李德生基本上没有遇到波折。大比武时代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他发现、总结、推广的。罗瑞卿因为大比武惹了林彪，罗瑞卿本人，和郭兴福都遭殃，而李德生却没事；不仅没事，在文革中还上升了。一九六八年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安徽省第一书记。当军委办事组逐渐沦为林彪的团队时，毛泽东想在里面放一粒沙子。

放谁呢？元帅们肯定是不行的。他们都是军委的，还在写检讨。办事组虽有实权，名义上还是一个下面的机构。而且元帅作为目标太大，容易被攻击。大将也不行，理由差不多。老的老，挨批的挨批。必须找一个和林彪没有关系，又不显眼的人放在那里。最后的人选是李德生。

毛泽东召见了李德生，那是李德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让李德生不要紧张，好好干。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并且告诉李德生：“要读《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李德生博古通今。

这样，李德生就成了办事组的一员。

尽管他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尽管他是安徽省委书记，尽管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也是孤立的。他起于红四方面军，但徐向前元帅已经靠边站很久了；他跟随刘邓大军，但刘伯承元帅也靠边站十年了，邓小平也被打倒。他是孤立的，是沙子。

在军委办事组，没人和他交流。开会时，他没啥存在感；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不跟他交换看法，横竖都是要通过的。有人对他客气一点，拿他当外人；有人对他不太客气，拿他当敌人，总想办法整他。但是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因为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安排进来的。沙子不好当啊！但是很快，李德生就不再是孤立的沙子。

庐山会议之后，为了瓦解林彪团队，毛泽东选择继续掺沙子，这次掺进去的是李先念和纪登奎。纪登奎一直是搞行政工作的，安排到军委办事组，作用相当于稀释了军方力量，也就是稀释了林彪团队。

李德生和纪登奎还只是中层，而李先念则是元老级别。

李先念，生于一九零九年，湖北人，念过书，打过工，参加过运动，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和湖北老乡，大将王树声的资历相当，贡献也差不多。

日后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徐向前带领红四军西征，因为种种原因遭到失败，只有李先念带领一部分人到了新疆，保存了相当一部分骨干。

抗日战争年代，李先念重回鄂豫皖，在那里搞出了一个中原纵队，相当于自己拉出来一支武装队伍，非常厉害。解放战争开打之前，共军为了和谈（也为了缓解国军压力），撤出鄂豫皖。后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当于再一次回到鄂豫皖。

建国之后，李先念是由军转政的典型。如果没有转，按照资历的话，李先念、谭震林都应该是大将级别。在建国之后的建设中，李先念虽然不像最前面的刘、邓那般显山露水，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各个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就已经身兼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和陈云干活，而且在日后的反冒进中挨了批。

刘少奇在前台工作那会，李先念和刘少奇合作的不错。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初期逃不掉挨批，而且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之一。尽管如此，李先念依然是批而不倒，依然有活干，依然帮助周恩来干活。

把这样一个人安排到军委办事组，已经不是“掺沙子”这个词能形容的，而是彻底打破了办事组的结构。因为按照军人的资历，李先念压过林彪的四大金刚。四个人级别最高的黄永胜也只是上将。李先念可是自己拉过队伍的。按照行政工作经验，李先念在周恩来身边干的事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多。说白了，林彪的军人团队根本就没有行政经验。现在李先念加入，开始彻底瓦解了那个原来铁板一块的军委办事组。

（四）挖墙脚

其实三板斧是一套组合拳，一招三式而已。

借着陈伯达的问题甩石头时，就是用郑维山和李雪峰两个不是林彪嫡系的将军开刀，找一个突破口，为最后一步挖墙脚做准备的。

掺沙子，相当于瓦解了军委办事组，瓦解了林彪的团队。

接下来呢，再让沙子成为尖兵——就是让李德生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让纪登奎当政委。李雪峰和郑维山虽然不是林彪团队的核心成员，但跟林彪团队的关系也不错，不然的话也不能在北京军区的位置上呆着。但是李德生就不同一样了，不仅和林彪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一直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放在军委办事组的一枚棋子，在军委办事组一直被冷落，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和林彪扯上关系。

这里说说纪登奎。纪登奎应该是中共后起之秀，即在抗战前后加入中共的精英人物，从一个小八路干起。在那批人中，能混到高层将帅的基本没有。因为抗战开始的时候，共军已经从红军成为八路军，历经十年战火的洗礼，已经成熟。后来之人很难再有机会冒出尖来，独当一面。所以那批人中干得好的，还是文职。纪登奎就是这样，一直搞文职工作。

建国之后，纪登奎一路往上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已经是封疆大吏（省级领导人）级别的了。文革是一场风暴，很多人被那场风暴吹趴下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的命运非常奇特。纪登奎就是命运奇特的那种人。

由于纪登奎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不可避免的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系走得比较近。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派遣工作组时，纪登奎并不认可。但是奇怪的是，纪登奎没有立刻被打倒。而纪登奎也和文革初期的所有高干一样，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自己还是河南省“省委文革”副组长，负责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如此，纪登奎依然没有躲过那次风暴。在最狂暴的一月夺权那段时间，纪登奎还是被打倒了，被隔离，“直升飞机”就坐了一百多次，差点丢了老命。在那个时代，凡是被打倒的，没有好几年基本上别想起来。但是纪登奎仅仅半年就复出了。至于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复出了。不仅复出了，而且还得到重用，从中央文革小组到地方造反派都承认纪登奎是“革命干部”。就那样，纪登奎在河南一边搞生产，一边搞革命。中共九大召开时，纪登奎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还做了发言。

从这些经历来看，纪登奎完全是行政系统的干部，跟军方很少关系，跟林彪更扯不上关系了。正因如此，毛泽东要把他当沙子来掺入军委办事组，而且让他当了北京军区的政委，由沙子变成石头。毛泽东就是用李德生和纪登奎重组北京军区，相当于挖了林彪的墙角——尽管之前郑维山和李雪峰也不是林彪嫡系。

北京军区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要护卫首都的。而且那时候世道很不平静，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在边境大规模陈兵。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纪登奎肯定无法胜任。不仅纪登奎，连李德生都未必能胜任。因为李德生在朝鲜战争中也就是指挥师级别的战争，没有大规模军团作战的经验。

一看那情况，瞎胡闹嘛！怎么可以让政治斗争损害国家的安危？其实不用担心。纪登奎也知道

他自己不能打仗，所以他就对毛泽东说，要找一个能打仗的过来。谁呢？就是已经靠边站十来年的粟裕将军。如果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统帅必然是林彪或粟裕，二者必选其一。现在要推倒林彪，自然要让粟裕出来干活。于是粟裕带着几个参谋，开着吉普车到边境上转悠了好几个月，拿出一个防御计划来，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继续搞斗争。

不管是李德生也好，纪登奎也罢，实际上都是斗争的需要，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可能和林彪的团队有关系。

三板斧之后，还有后续的招数——那才是毛泽东真正的谋略所在。

（五）大招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些招数的杀伤力已经很大了。

真正的大招在后面——南巡。

毛泽东一辈子南巡了很多次。这些南巡有一个规律，就是在每一次做重要的决定之前都会南巡。高岗闹事那会，毛泽东南巡去了；南巡回来之后，高岗已经身陷囹圄。第一次庐山会议，事出突然，下山之后，彭德怀已经臭了，无需再做决定。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南巡后做了最后的决定。打击林彪，需要另一次南巡。

文化大革命，如果抛开深层次的东西不谈，可以简化为两次政治斗争。第一次是毛泽东借助军方力量战胜了行政系统的刘少奇；第二次，则是毛泽东借助行政系统的力量战胜了军方的林彪。两次都是伤筋动骨；第一次因为打倒刘少奇，把政界打碎重来。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军方系统清洗重来。

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从军方的罗瑞卿入手。因为罗瑞卿是刘少奇在军方潜在的依靠。拿下罗瑞卿，基本上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

这一次为了打击林彪的军方力量，从政界的陈伯达入手，因为陈伯达相当于林彪在政界唯一的依靠。打倒陈伯达，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和政界的联系。

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和罗瑞卿同时打倒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等人，因为他们都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此次为了打倒林彪，和陈伯达同时受批斗的还有吴法宪等人，因为他们是林彪的左膀右臂。

当初刘少奇的优势在政治局。文革一段时间之后，中央政治局名存实亡。政治局委员，要么靠边站，要么写检讨。此次林彪的优势在军委办事组。三板斧之后，军委办事组土崩瓦解，四大金刚的日子都不好过。在几乎相同的时候，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仿佛

是另一个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但是康生是个老狐狸，他不想步当年陈伯达的后尘（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长，却夹在江青那里受气），所以康生就一直在生病，权力就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手上。几年之后，康生翘辫子，临死之前去周恩来那里告状，说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心中不满。

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

对比刘少奇在政界几十年，林彪在军方的实力毫不逊色。从红二十八团长开始，到红一军军长，到红一军团长，再到日后的第四野战军，林彪在任何一阶段都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才华是卓著的，战绩是优异的，声望是坚实的，再加上在副统帅的位子上被宣传了好几年。说真的，要不是毛泽东神话般的存在，没人能动林彪分毫。如果不是毛泽东神话般的存在，任何人想上台都必须看林彪的脸色。

和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不同，军人的作风还是相当靠谱的。政治舞台上的那些人，基本看风行事，一场政治风吹过，该转向的都转向了。军人不一样，军人认理，不会轻易变更，所以在文革初期砸碎行政系统，一帮红卫兵就可以了。但是要动林彪，三板斧过去了，还是没有底。毛泽东决定亲自南巡吹风。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也南巡。只不过当时是为了冷静思考，是为了下定最后的决心。此次南巡恰好相反，是决心下定之后去吹风。说白了，就是游说那些地方大员们。

真的要动手了。

（六）南巡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七十八岁的毛泽东南巡。毛泽东以往搞了很多次南巡，但是这一次跟以往不同。他带领中央警卫团一百多人，每人带手枪、自动步枪，全团还配置轻机枪，可以冲锋、可以狙击、可以近身肉搏。工作人员很少，一切由汪东兴负责。保密规格极高：每一次南巡，行程都是保密的，这一次的保密工作尤其严格。在北京的各个大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具体情况。林彪那些人，尤其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周恩来让他陪江青去青岛“视察”。因为在以往的历次行动，需要传送文件啥的，都需要空军，是瞒不了吴法宪的。这一次，啥都省了，可以说是全面封锁消息。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五日，列车到达武昌。毛泽东立刻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原国民党军人，后转为共产党，一直跟着刘伯承干革命，跟林彪没有干系）谈话。

毛泽东告诉刘丰：“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毛泽东对刘丰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说这些啥意思呢？平白无故的不会提这些事。提到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的主角。之所以说这些人，是因为毛要在他们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名字。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毛泽东把刘丰他们和庐山会议上的那些人撇开：“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三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穷图匕现。

并且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并且拿出信心：“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事实上，他说中了林彪的死穴——就是：林彪虽然是军方代言人，但是军方并不会跟着林彪走，因为林彪上面还有毛泽东的存在。

武汉是毛泽东的第一站。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武汉军区的那些人和庐山会议的区别对待。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地方军区的一大批人，包括南京的许世友在内，一开始都是支持林彪的那个观点的。

为了消除那些人的顾虑，毛泽东举了汪东兴的例子：“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那意思，你们也不要怕。

为了说服大家相信林彪的动机不纯，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

接下来毛泽东批判了林彪的观点：“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如此这般一番，就完成了对武汉军区的说服教育工作，因为那些人都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毛泽东的话，比任何东西都有用。刘丰等人主动找毛泽东检讨，并且表示坚决跟随主席的脚步。毛泽东带着他们唱了一遍《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至此，部署完毕。

后来林彪之所以没有去广州，就因为毛泽东的南巡。毛泽东一路南下，去了中原，去了两湖，去了江浙，但都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地，他的目标是广州。

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就是瓦解林彪在广州军区中的势力，武汉只是一个开始。

毛泽东在武汉一直待到二十七号。前后十多天时间，都在给武汉军区的高级将领们吹风。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武汉军区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控制着长江流域。在近代史，从洪秀全进入武汉开始，那一带就非常热闹。控制了武汉，基本上就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另一个原因是，武汉军区的骨干基本上都是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的人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毛泽东在武汉军区做文章，可以威慑林彪。

毛泽东在武汉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章是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已经六十四岁，身体还不好，显然不在培养接班人之列。那种话都说出来了，相当于和林彪对上了。

毛泽东不仅说，而且有行动。他把华国锋叫过来和大家见面。华国锋也是候选人之一，和王洪文处于同一个位置。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华国锋出现比较晚。比起王洪文，华国锋办事非常踏实，所以才有日后毛泽东的那句经典评价：你办事，我放心。

更致命的一招是，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的政委，实际上相当于第二次的致命打击。对于林彪而言，他的力量原本应该在北京军区。但是军委办事组改组，毛泽东一套组合拳之后，瓦解了北京军区的力量。这样他的另一个势力点应该在广州军区。广州军区一直是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是林彪的心腹。把华国锋放在广州军区，相当于在林彪的心脏边上放一颗钉子。实际上毛泽东整个南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把华国锋嵌入广州军区。

（七）丁盛

这个工作在武汉没有完成，到长沙继续。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去长沙。在长沙呆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五天时间，但是非常重要。在那里，他找了很多谈话，两广的人，两湖的人，很多人。那些人都是中南地区的精英人物，负责那一带的权力和安稳。其实那些人多数都是烟雾弹。

主角只有两个，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和那些人谈了很多话，大致内容和武汉差不多，让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然后把那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暗示或轻轻点到一切没完。

那些话都是说给丁盛和刘兴元听的。华国锋去广州军区之前，广州军区司令员是丁盛，政委是刘兴元，他们两个人共同负责广州军区。

两个人都是中央苏区出来的，都有四野的背景。丁盛是典型的猛将，刘兴元则是典型的政委。丁盛是少将，刘兴元是中将。但是在战场上，丁盛的强悍也是非常明显的。

共军为啥能打败国军？最经典的解释是民心所向。还有别的解释，就是高层将帅特别厉害。实际上和高层将帅同样重要的，是中层指挥官，比方说少将级别的。

在开国少将里，很多人打仗非常有名。比方说钟伟将军，也是少将，性如烈火，打仗如其人。比方说肖全夫将军，有一个称号叫老虎。辽沈战役之中开打之处，奔袭北宁线，当时共军指挥官就是东北野战军肖全夫。珍宝岛战役，指挥者还是肖全夫。丁盛将军也是那样一个人，战场上特别能折腾。

丁盛是个老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反击战。丁盛的特点就是勇猛。一九三一年，在一次战斗中，团长英勇牺牲，作为旗手的丁盛依然高举旗帜冲锋陷阵，坚持到最后。战斗结束，大家说他胆子真大，于是就有了“丁大胆”的绰号。遵义会议之后，丁盛担任连指导员，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抗日战争中，丁盛的表现并不突出，所以在解放战争，他的起点只是师长。丁盛在东北参加过从四平保卫战到辽沈战役等所有重大战役。接下来随四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随后南下，追击白崇禧到天涯海角。在衡宝一战中，丁盛痛击了白崇禧桂系第七军。

一九五三年，丁盛担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参加金城战役，战绩不错。

丁盛回国后还在打仗。一九五八年镇压过甘肃回民骚乱。一九五九年，丁盛平定西藏叛乱。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丁盛亲自指挥一三〇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那是印军王牌，号称在二战中击败过隆美尔的军队（天知道咋回事）。结果印度人如今只记得丁盛和他的五十四军，可以说丁盛一战击溃了印度人那膨胀的自信心，对共军惊恐到如今。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倒台，丁盛估计还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就参与了建国之后的所有战争，成为一个传奇。

丁盛的级别不高，一开始够不着林彪，但是他和黄永胜的关系不错。

两人在延安时代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从一九四四年开始，黄永胜成了丁盛的直系领导，丁盛的军事生涯也就从解放战争开始大放光彩，所以说丁盛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好。中印战争之后，丁盛离开五十四军，罗瑞卿安排他到新疆军区当副司令。丁盛一百个不愿意，没办法。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丁盛才得到机会，机会来自黄永胜和林彪。

一九六七年春节，丁盛回北京汇报工作，恰好碰见黄永胜的妻子在说军区同志给林彪拜年，丁盛也跟着去了。丁盛的心思黄永胜是知道的，黄永胜自己要调离广州军区，要选择自己人，就在林彪面前替丁盛说话。春节之后，丁盛由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位置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黄永胜调到北京之后，丁盛成了广州军区的司令员。

从这层关系看，丁盛和黄永胜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毛泽东把丁盛叫到长沙去，特意说，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办？

丁盛当时啥反应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林彪倒台之后，军方大洗牌，身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却安然无恙。

毛泽东到达湖南长沙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召见了丁盛和刘兴元。毛泽东一开始跟他们拉家常，让他们放松，然后切入正题。

正题还是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强调斗争的残酷性。

然后再把党内斗争和现实联系起来：“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是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这是在告诉他们，斗争还在继续，要睁大眼睛，看清楚、想好了才站队。因为提起党内斗争，谁也没有毛泽东丰富。他败过，被别人批斗过，沉浮过。但是最终，他打败了所有对手。林彪和他比起来，根本就没法比。

毛泽东继续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办法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但是要让丁盛和刘兴元转过脑筋来，光指出纲领是不对的还不够，还要批判那个纲领，也就是所谓的“天才论”。毛泽东说：“（丁盛和刘兴元）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泽东这段话透露很多信息。虽然跟庐山会议的关系不大，但对于研究他的早期生活经历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比任何传记作家写的都可靠。

毛泽东问丁盛：“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说：“打过锦州。”

毛泽东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毛泽东当然不是要和丁盛回顾战争史的，他的目的是要教育丁盛，所以毛泽东对丁盛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他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毛主席接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再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绕了一圈，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但是一圈是不够的，还是要继续绕。

再绕回“天才论”。毛泽东告诉他们：“《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

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告诉丁盛和刘兴元，要注意大局，大局，不要瞎折腾。

丁盛讲述自己的战斗史时，毛泽东提醒他：“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也不忘旁边的刘兴元：“你也要注意。”就是说不要昏了头。

这是思想教育，接下来是具体例子：“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都能品出来其中的味道。但是对毛泽东而言，他对丁盛和刘兴元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做一个结论。八月三十号，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再次找了几个人谈话，主要还是针对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泽东说这话并不是唠家常，他是要敲打、提醒丁盛他们：“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

接下来再一次谈到党内斗争，再一次把斗争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再一次绕圈，再一次强调团结问题：“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

事情做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向丁盛他们亮出半张底牌：“庐山这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这些话可以说是烟雾弹，也可以看成是麻醉剂。

此次南巡，虽然保密系数很高，但是到处找人谈话，而且军方原本就关系复杂，想要完全保密根本就不可能的。实际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把毛泽东的行踪泄露了——或许正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

毛泽东就是知道他的谈话会泄露出去，会传到林彪的耳朵里，所以他才说这次的斗争和前九次不同，要保护林彪。究竟有几分真假，随着林彪葬身大漠，永远不会有答案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这个策略非常成功：成功地令林彪放弃了南下广州的计划。因为林彪太了解毛泽东做思想工作的魔力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抵挡毛泽东的那种魔力，所以林彪对广州产生了怀疑。

（八）答案在程世清身上

为什么林彪知道毛泽东召见丁盛和刘兴元的事后就对广州军区产生了怀疑？是林彪胆小怕事没有信心？不，恰好是林彪太明白了。那个问题本身没有答案，但是答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显现了出来，那个人就是程世清。

教育完丁盛和刘兴元之后，还需要做一些善后工作，具体说，就是在南昌召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几个人，再来一次教育。

程世清，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八年，起于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被编入一一五师，此后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参加过四野的历次战斗。一九五五年，被评为少将。从这层履历来看，程世清不像红一方面军的那些人，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战斗过。

由于工作关系，程世清对林彪比较“景仰”，可以看做是林彪的人。正因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程世清担任福州军区（负责解放台湾的，后来并入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

在武斗时代，程世清亲自带着坦克去解决双方的“纠纷”，很暴力，但也很有效，所以南昌没有乱起来。当然咯，程世清之所以可以这么干，是因为他和林彪的关系密切，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人不去找他麻烦。武汉的陈再道不是林彪的人，就没那么幸运。

文革之前，毛泽东重回井冈山。军队武斗那会，林彪也重回井冈山。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林彪到访黄洋界，陪伴者就是程世清。那本身没啥，关键是林彪到达之前，程世清让人炸掉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因为碑文是朱德手书。黄洋界的“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的笔迹，程世清也让人搬走。

建国之后，朱德逐渐淡去；文革开始之后，朱德被敲打，被疏散，开始很多历史被串改。比方

说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一部分善于拍马屁之辈，串改井冈山会师史，改为林彪和毛泽东会师。程世清干啥呢？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如果拍马屁到此，也不算太过分。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福建婆娘，让她舞文弄墨，绝对是难为人的。叶群没办法，直接抄了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半阙：“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遁遁。”此后，“界石”，一面刻着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把叶群抄的半阙词刻上。

可以说，程世清这一手很不地道。同时也看出，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不错，甚至可以说程世清是林彪的心腹。

庐山开会时，作为江西的地方大员，程世清负责接待工作。他做了如下安排：“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要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四十五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二十多公里，定了三百五十个哨位，布上四百零六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一百个哨位，两百名战士。”

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程世清安排：“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统统举家迁往山下安置，牯岭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那是程世清亲自设计的一张网。但是在庐山会议前几天，汪东兴到庐山视察时却发现一个巨大的漏洞。汪东兴看到毛泽东的住房上面，正轰隆隆地炸石头。汪东兴当即问程世清咋回事。程世清回答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纳闷：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紧追不舍：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到杭州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暂住在此的毛泽东。毛泽东追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也说不知道。

汪东兴说：如果连你都不知道，就有意思了。

周恩来虽然不知道，但他知道有人肯定知道，就给黄永胜打电话。黄永胜说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黄回答，报告了林副主席。周恩来给汪东兴回电话，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会议上，陈伯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时，程世清非常活跃。等到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

局势逆转。当时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吴法宪的人）批判张春桥很来劲，被迫作检讨。结果检讨还没有念完，张春桥就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帮腔，说：“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搞得陈励耘相当狼狈。

在那火药味十足的地方，程世清竟然勇敢地站起来替陈励耘辩护：“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当然，这番话把江青和张春桥得罪得干净彻底。

程世清对林彪奉承、拍马屁，要说得罪人的本事，程世清也是绝对第一流的。作为林彪身边的人，得罪江青和张春桥可以理解，但是程世清同时得罪了邓小平和陈云。当时为了备战，邓小平和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实际上就是在程世清的看管之下。程世清对两位大人物不太热心，日后邓小平和陈云主宰了国家政坛，程世清的日子就不好过。

既然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毛泽东南巡自然不能忘了他。毛泽东在谈话，程世清、韩先楚、许世友所有人在接受教育。毛泽东再次把武汉和长沙说的那些观点重复一遍：一，回顾党内历次斗争，总结经验教训；二，把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又数落一番林彪的身边人的不是，暗示根子在林彪身上；三，讲团结。

在谈话时，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心里一震，赶忙表态：“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表态充耳不闻，程世清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据他自己回忆：当晚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

所谓讲清自己的问题，无非就是表态自己干革命做工作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伟大领袖，而非为了林彪个人。说白了就是要和林彪划清界限。

就在那个时候，程世清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林彪可能要逃跑。

当时是八月三十一号，那个时候的林彪看起来还在浑浑噩噩的状态当中，好像没有任何动作。就连林立果也还没有下决心铤而走险。也许那个时候的林彪，还有某种期盼和某种等待，还在期望一线生机。

也就是说，程世清大概是第一个想到林彪可能逃跑的人。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林彪还是接班人。庐山会议之后批了陈伯达，吴法宪和叶群也写了检讨，但是离林彪还很远。毛泽东也只是暗示一下林彪有问题。周恩来见了林彪还是林副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江青、康生等人也不敢在林彪面前

嚣张。

程世清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难以用常理推断，或许是灵感的爆发？

听起来有点像小说的情节，但事实却是真的，比小说更真实。因为第二天程世清决定冒死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他首先见到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

汪东兴的位置和作用是很重要的，一般问题由他向毛泽东转达就可以了，但是当汪东兴听了程世清的话之后，再也不敢代为转达。他明白，那种事最好还是不知道为妙；就算知道，最好也不要掺合，因为那意味着很多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的命运将由此改变。如果参与过多，前途丢了不要紧，搞不好连老命都保不住。所以汪东兴对程世清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程世清见了毛泽东之后，摆出了如下情况：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一九七零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一九七一年七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八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出了他的结论：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不动声色，嘱咐他：“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其实毛泽东的内心已经波澜起伏。程世清离开之后，毛泽东“生病”一天，不见任何人。可以

肯定，毛泽东绝对不是生病了，应该是程世清一语惊醒梦中人。每逢需要决策重大问题时，毛泽东总要一个人静一静。解放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独自思考了很久。朝鲜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思考了很久。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发动起来，毛泽东依然思考了很久。

对于林彪的问题，他同样思考了很久，但是在这之前他所有的谋划和部署都是要瓦解林彪的团队：甩石头啊、掺沙子啊、挖墙脚啊，搞垮林彪的领导班子；南巡拉拢地方大员，防止林彪搞分裂。在毛泽东看来，这两手完成之后，林彪将成为温水里的青蛙，除了坐以待毙之外别无他途。然而林彪不是刘少奇，林彪本人就是一个军事奇才，一辈子什么样的情况没见过？如果不是毛泽东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肯定地说，不论何人上台，都要敬畏他五分，再给他五分薄面。

程世清的话，惊醒了毛泽东，因为在他之前的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到林彪铤而走险的可能。

毛泽东“病休”一天之后，匆匆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然后突然北返。看看毛泽东的南巡，在武汉的时间最长，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在长沙，为了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也浪费了很多唾沫和口水。唯独在南昌，启程非常突然。九月三号午饭过后，工作人员刚刚躺下睡午觉，毛泽东突然决定走人，此后行踪飘渺不定。

应该说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程世清那个突然迸发的灵感非常关键。按道理说，此后程世清的命运应该往上升。很遗憾，程世清的命运是往下走。答案很简单，他的嘴得罪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文化大革命之后，程世清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答案还是一样，得罪人太多了。其实也不能怪程世清。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中，让程世清在江西“巴结”邓小平和陈云也不现实，正如让丁盛在广东“巴结”叶剑英不现实一样，因为“巴结”的结果只有一个——自身不保。

日后程世清在秦城监狱里写材料时回忆“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晩，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如果说以程世清对林彪的那种奉承和依附程度，都能在毛泽东的教育之下和林彪划清界限，那么林彪也有理由对任何人、任何事产生怀疑，所以林彪的选择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铤而走险，正如当年的张国焘。

（九）另外两人

毛泽东在南昌实际上要见三个人，除了程世清之外，另外两个分别是韩先楚和许世友。在毛泽东之前的设想中，许世友和韩先楚比程世清重要。

两个人都是硬骨头。一九七六年，邓小平再次下台之际，江青号召大家批判邓小平，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就是不动。江青气得不行，但也没办法，只能咬牙说，军中有两霸，一是韩先楚，二是许世友。

毛泽东刚到湖南长沙时计划就安排好了，让许世友和韩先楚在南昌觐见。毛泽东南巡，主要就是防止林彪带着地方大员闹，所以他先到武汉打个招呼，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到南昌敲打广州军区的丁盛和刘兴元。在江西南昌，主要目标其实是许世友和韩先楚。

当时韩先楚是福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

这两个军区非常重要。南京就不用说了，长江流域的核心，南中国的核心，在整个近代史上相当热闹，地位仅次于北京。所以建国之后，军区变来变去，唯有南京军区永远不变，原因无他，太重要了。所以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散会不久，军衔刚刚评定，毛泽东就把许世友放在南京，一直放在那里，放了将近二十年。

因为许世友勇敢；战场上作风过硬；更因为许世友的“忠心”。自从被毛泽东收服之后，基本上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所以许世友在南京，毛泽东放心。毛泽东南巡之所以找许世友吹风，并不是因为林彪的问题，而是要他继续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真正重要的是韩先楚。

一九五七年，韩先楚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并且落地生根。其实在中国地图上，福州的战略地位并不是一直都十分突出。清朝末年，在福州那里搞了一支舰队（在中法战争中覆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福建和台湾毗邻。之所以有个福州军区，只为照顾海峡对岸的蒋介石。因为国共之间内部的成见太深了，深到一代人都无法解决，所以福州军区就因为台湾而存在。

日后中国搞改革开放，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欧美那边靠拢。台湾那边蒋经国上台，两边关系缓和，福州军区便进入历史。

福州军区第一任司令员是叶飞将军。叶飞一生极为传奇，以后有机会说说他。但是叶飞传奇的军事生涯的最后一笔却非常糟糕——就是在金门惨遭失败。那一场败仗大概是解放战争以来共军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场失败。朝鲜战争之后，台海再次出现危机时，叶飞在福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就呆不下去了。

换人，换谁呢？韩先楚。当时开国将帅都在，能征惯战的人很多，为啥是韩先楚呢？因为韩先楚虽然不是唯一的选项，却是最佳的选项。从当时上将的履历来看，代替叶飞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只能是韩先楚。

（十）韩先楚

在共军史上，韩先楚是一个模范，打仗那是没得说。韩先楚只是上将，当年评军衔如果纯粹是按军事能力评的话，韩先楚应该是大将，正如如果按照纯粹的军事能力，粟裕将军应该是元帅一样，甚至可以说，韩先楚是上将里面的粟裕。

韩先楚和大多数共军的开国将帅一样，没上过军校，是战场上泡出来的。

韩先楚和许世友等人一样，也是起于红四方面军，出身于放牛娃，从小兵、班长、连长一路上去的，作战甚为勇敢。韩先楚当了团长仍带头冲锋陷阵，刘伯承赞曰：“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

鄂豫皖那些事就不说了，韩先楚在徐向前手下从小兵变成一名战将。长征途中，韩先楚的队伍就是负责突击中锋的，甚至救过徐海东于危难之中。建国之后徐海东笑着对韩先楚说，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突击冲锋的是林彪和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就是韩先楚。当然红四方面军面对的压力不如中央红军大，但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损失也小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中央在红四方面军，那么韩先楚的地位必然更高。

抗日战争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人马基本上编成一二九师，但是有部分划归林彪的一一五师。这样，韩先楚就成了林彪的一员战将。在抗日战争中，韩先楚的表现尚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没有特别出彩；东北时的韩先楚迎来了一生的巅峰。当时林彪带着大队人马一路向北撤退到松花江以北，扭转战局的一战就是韩先楚指挥四纵打的。后来韩先楚带领三纵，更是把它打造成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

杜聿明在指挥东北夏季攻势后黯然离职，感叹道：“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代替杜聿明的是陈诚，对韩先楚的评价是：“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

陈诚干不下去了，卫立煌在绝境中上任，对韩先楚的评价是：“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在东北战场上，国军最后的精英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廖耀湘手上。在辽沈战役决战之际，韩先楚一番快打，阴差阳错之际，端了廖耀湘的司令部，廖耀湘成为俘虏。日后廖耀湘表达了对韩先楚的敬意：“韩先生，我很钦佩你的指挥！我来东北后，多次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小心你的‘旋风部队’。”

在朝鲜战场上，韩先楚指挥几个军一路冲杀到汉城。

这些是韩先楚光荣的履历。为什么说接任叶飞将军的人非韩先楚莫属呢？归根结底来自一场魔术——那便是解放海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大吼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解放军还在秋风扫落叶般向南推进。第三野战军占领福建之后，没啥准备就直接进攻金门。当时金门离厦门也没多远，因为后勤没有跟上，结果共军全军覆没。

半年之后，第四野战军消灭桂系主力之后推进到海口。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向海南岛挺进，林彪一时难以下决心。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表现最好的是三野和四野，林彪和粟裕是共军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最耀眼的统帅。粟裕指挥的三野在金门吃亏，林彪是看在眼里。

海南岛离大陆的距离比金门岛离大陆更远，岛上的国军最高指挥官是薛岳将军。薛岳是国军名将，是抗战中表现最出色的国军统帅之一。他的作战特点就是防守，在长沙保卫战中展现出来的军事素养让鬼子头痛不已。

所以登陆海南岛的难度不小，至少不会比金门小。但是海南岛作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海南岛很大，有利于共军施展陆军作战的优势。金门岛太小，基本上无处闪躲穿插，国军海空军一通扫射，基本上就玩完了。

从指挥风格上看，林彪比粟裕更为谨慎，所以难以下决心。但是时间不等人，因为雨季很快就要来了，共军那些小帆船很难在雨季渡海作战。

此时，韩先楚意识到机会就在眼前，同时也明白危机就在眼前。如果海南岛登陆作战再一次战败，那么对共军气势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反过来说，如果成功，荣耀也是很大的。对于一个战争将要结束的将军而言，那种诱惑是致命的。

所以在林彪一时难以下决心的情况下，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却执意要在雨季来临之前强攻，而且直接把自己的意见捅到中央。中央当然也想拿下海南岛，就让邓华前来核实韩先楚的作战计划，准。

此时只有五天的时间了。如果五天内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韩先楚极有可能重演叶飞在金门的那一幕。那么韩先楚的一世英名也将归于尘土。韩先楚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六号傍晚，韩先楚亲率四十军和四十三军渡海作战。没有空军掩护，没有海军支援，只有帆船。第二天凌晨，先头部队抢滩成功。韩先楚随部队一起上，强悍程度非同一般。

当时薛岳已经在海南岛经营了一年多，但是三天之后，薛岳就撑不住了，主要不是薛岳无能，而是国军的战力和士气和共军相差甚远。

攻下海南岛之后，韩先楚一个人面对大海静坐一夜。当然他不是修行静坐，而是他需要思考。至于思考的内容，只有他自己知道了。韩先楚冒险打下海南岛的意义是啥呢？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两个多月之后，金日成入侵韩国。又过将近两个月，联合国军入朝。又过两个月，志愿军入朝。然后美军封锁南海。

如果不是韩先楚在那么几天内攻下海南，那么海南岛很可能成为台湾第二。一个台湾已经够折腾了，再加上一个，那就更难了。

所以等到金门炮战之际，叶飞离开福州军区，接任者必然是韩先楚。在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和黄永胜的关系不怎么样，两人彼此不爽。黄永胜得到林彪的青睐，韩先楚和林彪的关系不怎么样。有人到毛泽东那里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林彪就说是韩先楚在搞鬼。从韩先楚冒险把强攻海南的作战计划直接捅到中央时，林彪就有点不快。

福州军区因为台湾而存在。当台湾问题不是很严重时，那么福州军区对广州军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牵制。

毛泽东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之后，就找韩先楚谈话，同时也是对丁盛的一种威慑。所以一切就那么巧合；就是那么巧，在那一切的巧合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和设计。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

还是重复之前的话，但是又有了新意：“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这是在南巡之中，明显表达对林彪的不满。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又把张国焘拉出来：“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直接把张国焘相提并论

了。

就是那次会面后，程世清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了毛泽东。

（十一）恩与怨

一九二八年井冈山会师，三十五岁的毛泽东遇见二十一岁的林彪，犹如刘邦遇见韩信，李世民遇见李靖，朱元璋遇见徐达。仿佛命中注定的一样，他们的相遇预示他们注定要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在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林彪是毛泽东手里最锋利的武器，毛泽东是林彪最大的靠山。如果时间在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停止，那么两人的关系无疑是史上佳话。

想当年，林彪从一个底层军官，在毛泽东的提拔、栽培下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最后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将领。

想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政治地位飘摇不定时，林彪义无反顾地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哪怕和老领导朱德和陈毅争吵也在所不惜。

想当年，林彪对前途感到困惑时，毛泽东耐心地给予解释开导。林彪抱怨毛泽东在四渡赤水走弯路时，毛泽东予以包容。林彪觉得陕北没前途，想去陕南山区打游击，毛泽东也只是把他冷落一点点。

想当年在长征路上，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在前方突击，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湘江之畔，红军将士损失惨重，硬是林彪的坚守保住了中央的安全。大渡河边，泸定桥上，林彪用神奇的速度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

想当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把红一方面军的家底交给林彪，另外又拨红四方面军的精兵强将（如韩先楚）增加他的实力。林彪不负重托，在平型关打出共军名片。遗憾的是，林彪意外受伤，错过了抗日战争的大部分。

想当年，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林彪已经远离战场很久，可以说是久疏战阵，毛泽东依然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东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失败之后，林彪还是那个林彪，还是那个天才统帅，并且把战争技术推向极限，一路由北向南，推进到天涯海角。

想当年，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了解决彭德怀问题，让林彪上山。林彪就算心有不甘，却依然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两人的合作关系达到巅峰。毛泽东成功地利用军方势力砸碎了刘少奇的

行政系统。林彪也分得红利，晋升为林副统帅，变成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然而很遗憾，该来的还是要来。

既然两人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深厚交情，既然两人携手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为何还要走上对立面？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们是没有理由争斗的。但是不管是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看起来高高在上，实际上都是身不由己。

毛泽东本身代表一种政策，一种由上而下、轰轰烈烈地推翻一切，打倒一切，埋葬一切的政策。那个政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策。虽然名为文化大革命，其实她的激烈程度不下于流血的大革命。那个政策是毛泽东经过长时间构思，精心策划，亲自推动实施的。不论任何情况、任何人，都休想阻挡他。

林彪上位，可以看成是那个政策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林彪稳住军方势力，那么即使强如毛泽东也不见得能如此迅速地砸烂那个他自己一手建立的行政系统。林彪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林彪一起上去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按照资历、声望、功绩，他们都不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比方说黄永胜只是一个上将，却坐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

总参谋长是共军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处于神经中枢上的一个位置。抛开黄永胜那糟糕的私生活不说，就功绩而言，虽然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但差距还是明显的。当时共和国十大元帅，九个人还在世。战场上能决胜千里的人物也不是没有，如刘伯承，如徐向前，他们不论是临敌经验，还是人品，还是指挥水平，乃至人生境界，均远胜黄永胜。当时的十大将军，九个还在人世。其中赫赫有名的粟裕将军在各方面都远胜黄永胜很多吧？当时共和国正面临北方苏联的巨大压力，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如果中苏大战爆发，总参谋长这个位置，怎么看都不应该由黄永胜来坐。不是说黄永胜没有能力，而是比他能力强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不是在写检讨，就是靠边站，所以情况相当诡异。

再比方说李作鹏，只是中将军衔，在海军中却可以把肖劲光大将批得东倒西歪；再比方说邱会作，也只是中将，竟然能在总后呼风唤雨，整人不眨眼。

所谓四大金刚只是几个典型而已。那些通过文化大革命上去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通过打倒别人上位。上位之后自然不希望自己被打倒，于是那些人躲藏在林彪的身后，林彪已经是他们的保护伞和代言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政策。它需要不同的目标，宣泄那种被政治鼓动起来的旺盛精力。

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前后二十年的时间，经历过高岗事件、反教条、第一次庐山事件、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牵扯到的人物如下：陕北根据地标志性人物高岗选择自杀，第二野战军代表人物刘伯承靠边站，第三野战军的粟裕靠边站，红三军团兼第一野战军的代言人彭德怀被打倒，红四方面军代表人物徐向前靠边站，红二方面军的贺龙被打倒，新四军的象征陈毅靠边站，永远的总司令朱德淡去。这些还都是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前。

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出身的干部多半投身到行政系统的建设，大多被打倒，代表人物包括彭真、陆定一、薄一波。以邓小平为首的根据地出身的那帮人也被打倒了，如陶铸等人。

二十年之后，如果那个政策继续，还需要继续打倒一帮人。很不幸，林彪成为那个政策打击的对象。

也许毛泽东无心对林彪动手，但是他的政策需要继续执行；也许林彪根本不想伤害毛泽东，但是他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不会无动于衷。在那个集团里，有林彪的老婆和儿子的身影。

正是利益集团的诉求，林彪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精心设计了一场闪击战；正是政策需要执行，毛泽东抓住林彪不放，一招一式，招招致命。

在那种情况下，别说两人半个世纪五十年的交情，就算是五百年的交情，也要走向对立。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政策和利益集团的诉求不一致时，社会必然出现大动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存在妥协。究竟谁压倒谁，就看操盘者的水平了。

其实从毛泽东紧抓林彪不放开始，双方的矛盾就开始浮出水面了。当然除了几个高层人物心照不宣外，其它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国家才会变得如此惊恐。其实两人的关系早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号的时候就已经有征兆了。

在那个强调劳动光荣的年代，五一劳动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逢重要节日，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亮相。根据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形成的不成文规矩，毛泽东身边总会有林彪，照例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林彪落后一个身位表示尊重，如果这样表示一切还正常。按照惯例，晚上要有盛会，领导人会在一起表示团结，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在那样重要的时刻，会出现很多重要的人物。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号那天也不例外，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陈毅。当时陈毅的身体不好，刚刚动完手术，依然大大咧咧地出现了。

按照陈毅的级别和资历，出现在那种场合很正常，问题是当时局势很不正常。在过往的历场运动中，陈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当初的延安整风运动，陈毅就被冷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得了，特别是“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批斗会没少参加，检讨没少写，而且一直处于被批斗写检讨

的状态。

但是到了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陈毅又出现了，发言了，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其实所谓的“二月逆流”，本身就是新版本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要把那些老师、老同志们敲打一番，让他们靠边站，然后让新兴势力放手搞文革。所谓新兴势力，就是林彪那帮军人和江青那帮文人。陈毅他们原本是作为障碍被放在一边的。

更奇怪的事发生在庐山会议上。陈毅是个直脾气，爱放炮，所以在庐山会议上他继续发扬热爱放炮的优良传统，发言表态支持林彪。然后有趣的事情出现了：陈伯达表态支持林彪，被批斗了；吴法宪他们表态，也必须不断写检讨；陈毅当然也被批了，但是火力很小，基本上就是触碰一下而已。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而且还在重大节日中出现，跟在周恩来后面相当拉风，然后和毛泽东又是握手，又是亲切交谈，仿佛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陈毅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要给林彪制造麻烦。

解释这个信号要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十大元帅之中，林彪因为军功排名第三位；朱德年事已高，已经淡去；彭德怀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状态。除了他们两个，已经没有人可以和林彪比影响力。加上林彪当时的地位，军内已经无人可以牵制他。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也隐退了。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即使他在，论资历，论战功，也无法和林彪对抗。三野的粟裕有战功没有资历。陈毅虽然战功并不大，但是陈毅是老资格。当年以书生的身份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在队伍转战湘南的过程中，朱德是第一号领导人，陈毅就是第二号领导人，也就是说陈毅是林彪的老领导。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被划为对立派。陈毅的复出，会对林彪产生心理压力。如果贺龙当时还在，应该更为合适。换句话说，陈毅的复出，是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一场心理战。

当时陪在毛泽东身边的是西哈努克亲王。林彪迟迟不见出场，属于他的座位一直空着。应该说毛泽东的那个心理战很见效。

当时周恩来非常着急，不停地看表，不停地让秘书打听林彪的下落。三番几次之后，林彪终于缓缓出现。对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没有说话。

然后，然后就是不辞而别。再然后，就是毛泽东南巡。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林彪也在静静地思考着对策。

十一、林彪最后的武器

（一）上阵父子兵

林彪一辈子遇到过很多情况，南昌起义之后到井冈山之前，他是一个最基层的小军官，指挥的人马甚至不足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且部队一直在溃败，在颠沛流离，时刻在危险之中，但是他生存了下来。

在井冈山上，虽然他的地位逐渐升高，但是总体上红军仍然处于弱势，只能打游击，对敌人游而击之，他的人生也就随之不稳定、不强壮。虽然在行军穿插中成长，他的人生依然孱弱。而且在长征途中，他的红一军团主力丧失殆尽；在抗日战争中，他的部队依然弱小，但是已经可以主动出击。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和他的部队开始龙飞九天，翱翔天下。

在那个过程中，林彪从弱变强，从小到大，一步步迈入名将行列，载入史册。他的对手也是当时国军中的人杰。不论在有利还是不利的情况下，林彪总是能生存，总能发展壮大，总能走出困境，反败为胜。等到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林彪在理论上掌握着一生中最为丰富的资源，最后却输得一无所有。原因无他，只因为他的对手是毛泽东。

按照林彪的想法，上位的最好办法是正常途径，也就是从党内的正规渠道上升。也许他本人不想和毛泽东对着干，但是他身后的那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推着他向前走，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正因如此，他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策划了那一出闪击战。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那一幕设计得很漂亮，不愧是林彪的手笔。但是毛泽东的威望还是太高了，当毛泽东表示不同的观点时，那些曾经给林彪喝彩、表示支持林副主席的人要么默不作声，要么转向对立面。

从此以后，林彪的正常升迁之路被堵死了。接下来，就是传说的另立中央。因为林彪没有行动，现在就成了一个传说。但是毛泽东一路南巡说出的那个观点提供了佐证。

最终的最终，林彪发现，带兵几十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贵为副统帅，手中只有一张王牌值得信赖，那就是他的儿子林立果。虽然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如果只有父子兵可以上阵，那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林立果生于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年头。那一年，那个跟在中国后面学习了两千年、脱欧入亚、自称香蕉民族的东瀛岛国，骑在中国头上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再一次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那一年，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一年。国共之间是合作还是战争，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

最终蒋介石先生选择了战争，林彪成了战争的筹码。但是对林彪而言，战争中一系列胜利的喜

悦比不上林立果的诞生。林彪说，林立果是他的眼珠子。

在林立果出生时，林彪已经赫赫有名。从记事起，他就记得他是他那了不起的老爹唯一的儿子，被众人捧在手心里。他念最好的学校，可以干别人想干而无法干成的事情。等到他成年，又是林彪得势的时候。他二十一岁那年进入北大物理系，第二年就在空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几乎没有遇到过挫折，不，应该说只有一次挫折，然而那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林立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很容易概括，就是一个二代——最牛的二代，什么官二代、富二代、权二代之流的，在林立果的面前都是浮云。

建国之后，林立果大概是最牛的二代，实在想不到有谁能和他比，但也正是那些让他牛气的资本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林立果有多牛，从他找老婆的事情上可以看出来——充满许多曲折和无奈。林立果那种人，要找老婆，绝对有姑娘排队送上门。空军内部就有许世友的女儿对林立果感觉不错。但事情就是这样，往往越容易办的事情上会闹出很多不可思议的结果来。林立果找老婆，原本只是人生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结果变成了沸沸扬扬的“选妃”，搞得满城风雨。

其实林彪本人对孩子找对象没有特殊的要求，主张“儿女的事由孩子们自由恋爱”；林立果本人也没有非要怎么样，但是到了叶群那个有小聪明、爱折腾的女人那里，一切都不一样了。叶群想要选择“最好的”，就告诉林彪，以孩子害羞为由，请老朋友们帮忙物色一下。林彪一想也对，表示同意。叶群很高兴，决定大干一番。

叶群就把林彪的粉丝的老婆们召集起来，请大家帮忙，给儿子找一个最好的老婆。他们虽然都是女人，但是她们的男人分别坐镇陆海空三军要害部门。一张网下去，基本上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力度堪比古代的皇帝选老婆。

既然如此大力度，选老婆有啥标准呢？当然，第一关必须是美貌。美貌对不同的人标准又不一样。大家各自发动选美女，分别把照片和资料送到叶群和林立果那里，先让他们过眼、看得上才行。

第二个标准则是健康。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应该是名门闺秀就行，但林立果不是。林家当时已经是中国排名第二的权势家族了，不论和谁联姻都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林家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挣回来的，完全没有联姻获利那个必要，所以他们选择健康——也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凡是身体有问题的，一律淘汰。

根据游戏规则，各位妇人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因为按照正常情况，林彪日后成为一把手，林家媳妇的媒人的身份就很重要。所以邱会作的老婆胡敏从老家西安市找到一位干部的女儿，号称“杨

贵妃第二”。听那绰号，就没啥希望的。纵观中国历史，也只有唐朝以丰腴为美。而这个姑娘到北京之后，胃口很好，很短时间内，从丰腴升级为肥胖。叶群对她不满意，把她淘汰了。吴法宪的老婆陈绥祺从军队艺术学院找了一个扬州姑娘，号称“西施现世”。能配得上西施二字的，自然不错。但是很遗憾，依然没能进入林立果的法眼。

当然天下美女之多，只要用心挑选，总能找到合适的。胡敏的“杨贵妃第二”被淘汰之后，充分发扬不畏艰苦的作风，亲自去南京挑选。经过一番磨难之后，她终于找到一个钟意的女孩子，就是张宁。好吧，就是她了。

从现在的照片来看，张宁属于那种文化程度不高，但堪称美人的人，美而健康。她的照片让叶群满意，她的人让林立果和林彪也都满意。但是她自己不是很满意，因为她当初有心上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她的个人意愿不算啥，她的那个心上人更是微不足道。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林立果对张宁满意，叶群又从满意变成不满意。原因是叶群的处境就像太后给皇太子选妃子，可以通过妃子控制皇太子，慈禧在同治和光绪的皇帝身上都用过这招。叶群担心小两口太过甜蜜，会削弱她在林家的地位。但叶群终究不是慈禧太后，因为林彪还在。林立果通过林彪的表态解决了问题。

从这件事情上看，好像完全是叶群搞起来的，看似和林彪没有关系，然而那才是问题的所在。前面说过，叶群只是一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的女人，她的理想归属应该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她之所以可以兴风作浪，无非是因为她那个怕风、怕水、怕光的丈夫而已。她的一番折腾，风浪波及大半个中国，可见势头之盛。

至于林立果本人，和林彪的个性一样，很少说话，但是折腾事的本领远胜叶群。从后来的事情来看，九一三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叶群和林立果太能折腾了。叶群折腾，不过是女人小家小闹的折腾，风声大，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林立果的折腾。

（二）致命的林立果

一九六六年，二十一岁的林立果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应该还是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工作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空军虽然成立的时间较晚，但是因为它的机动性，受到很多领导人的重视。按照吴法宪的说法：“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毛新远）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毛新远是毛泽东的侄子。除此之外，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等人都有亲属在空军上岗就业，但是他们也就是上岗就业，而林立果却是走得太远。

林立果去北大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大幕。以林彪的战略战术头脑，自然不会把独生子放在红卫兵中瞎胡闹，于是就把他放在机动性最强的空军。空军司令吴法宪又是林彪的铁杆粉丝，自然想办法把林立果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也就是党委办公室。吴法宪当时觉得给林家办了件事很正常，若干年后才感叹：“我万万想不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么严重的后果！”

当时的吴法宪只想给林立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首先他找一个年轻人帮助他，那人就是周宇驰。周宇驰生于一九三五年，比林立果年长十岁，为人机敏，曾经担任过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秘书，有次因为没有把参考消息送到刘亚楼手上，惹了刘亚楼恼火，被下放地方一年。吴法宪上任后，见周宇驰的写作功底不错，又把他喊了回来。

林立果当秘书，自然要写作的。林立果的写作水平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吴法宪为了让林立果的秘书工作干得不太孤单，就把能写作的周宇驰拨给林立果。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其实林立果当时才二十二岁，离开林家大院，没啥朋友。周宇驰虽然也只有三十岁出头，却是从最基层爬上来的，久经世故，搞人际关系那是一流的。而且见到林立果，他仿佛看见了一个希望，他的人生变得一切皆有可能。从那以后，周宇驰就成了林立果的狗头军师，联合舰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尽管他干得很失败。

吴法宪对林立果的照顾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介绍林立果入党。这些事当然都是讨领导开心的马屁文章，但是很成功。比方说叶群就喜滋滋地对吴法宪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正确的。”又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叶群这些话，可以理解为，林立果是林彪放在空军里的一颗钉子。所以吴法宪有时候也觉得很烦：“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尽管他是空军司令，但并不能控制空军的一切，尤其是林立果。

林立果在空军办公室当了两年的秘书。一般秘书的生活应该就是写点文件啥的，林立果显然不一般。进入空军第二年，他就通过王飞和周宇驰向吴法宪提出要求——外出调研。吴法宪自然不反对，特意让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组成“调研小组”。那个小组究竟干了啥，吴法宪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几年之后，“调研小组”的成员成了“联合舰队”的成员，搞得吴法宪的肠子都悔青了。

林立果当秘书那两年，林彪的位置渐渐上升，一九六九年九大上升到顶点。九大之后，叶群向吴法宪转达林彪的意图：为了加强空军战备和科研，建议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九大召开，林彪和江青两组人马把权力的蛋糕分割完毕，接下来慢慢从合作变成对立。那个时候，林彪让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究竟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不好猜测，毕竟那时候林彪和毛泽东还是亲密战友。除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对林彪都要敬让三分的。

但不论如何，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号开始，九大半年之后，林立果成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当时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员主要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世英。他们形成一个小团体，吴法宪都无法掌控。

这个可以说成是林彪的布局么？可以说不是。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稳如泰山，而吴法宪又是他的忠实粉丝，对林家鞍前马后，照顾得无微不至。林立果升职不久，吴法宪当着王飞和周宇驰的面对林立果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就是传说中的两个一切：指挥一切和调动一切。

后来这个成了吴法宪的罪证，老实说有点冤枉。因为以当时林彪的地位，谁能想到后来的事情。吴法宪当时那么说，无非就是想通过领导的儿子拍领导的马屁而已。如果不是林彪，以林立果的那个资历，想见吴司令一面估计都要排队好几天。后来吴法宪回忆：“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但不可否认，就是因为吴法宪的纵容，林立果才能在空军中搞那么多花样。

但是也可以说是林彪在布局。因为林彪一辈子都在搞斗争，武斗和文斗——建国之前武斗，建国之后文斗，他的副统帅地位就是通过斗争得到的。如果没有刘少奇的倒台，就没有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斗倒刘少奇的那个政策还在，可能以后这个政策也会把他拉倒，因此他自己也不见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所以他要一个百分之百忠于自己的力量也可以理解。

吴法宪不是很忠于他么？吴法宪是很忠于他，但有个前提，就是林彪忠于毛泽东。林彪之所以能成为副统帅，是因为他选择站在毛泽东的身后。但是对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人而言，他不能保证任何人百分百忠于林彪他自己。第一次庐山会议就是一个例子，红一军团兼红一方面军出身，一直跟着林彪干的邓华为彭德怀辩护，成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一员。钟伟将军也是林彪看好的人，当众为彭德怀鸣冤——那还是在彭德怀被批斗的情况下。

但是后来吴法宪又回忆说：“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策划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直接对我提起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内情我就知道了。”

吴法宪这是把脏水泼到叶群身上。原因是，叶群只是一个有小聪明的女人，能想那么多么？不

过以叶群爱折腾的本性，肯定能干得出来。罗嗦了这么多，结论是林立果在空军搞独立王国究竟是不是林彪的布局，依然还是个迷。

林立果虽然沉默寡言，但是并不代表他低调。其实他很高调，至少在干事情上很高调。一九七零年七月三十一号，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的二十三天，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干啥呢？听报告，听林立果的报告。

林立果虽然是林彪的儿子，但是要功劳没功劳，要资历没资历，年纪轻轻就去给空军司令部的人讲报告，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更为非同寻常的是报告的内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每讲一段，就要来一个实例增加说服力。那些例子非常有意思。比方说讲到政治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正确，刘少奇不对。举例说：“群众掌握了主席思想，真是不得了。某工厂有个生产发电机垫圈的车间，过去是车床加工，既浪费材料，生产效率又低，现在改用冲床加工，二小时就完成了了一年的任务。”看看这内容，还以为大跃进还在继续呢。

讲到毛泽东思想的神奇的部分，林立果举了一个例子：空军某医院最近三年治好了六十名精神病人。医院治病救人没错，问题是救人的方式。因为六十名精神病人“没打针，没吃药，就恢复了健康。病人高兴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打开精神病枷锁的金钥匙！’”并且引用这所医院的医生的原话：“精神病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靠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摧毁。”仿佛毛泽东思想比巫术还有用。

——看看那时代，何其荒谬！那些话林立果会相信么？当然不信。如果他相信，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下面鼓掌的那些人相信么？当然不信。谁信谁傻蛋——傻蛋是没有资格在那里鼓掌的。

林立果又说了中国必然强盛的部分：文明从东方开始，转到西方，再转到北美，必将“螺旋式”以更高级的形式转回亚洲社会主义中国。号召大家“为建设强大的空军，添一块砖，添一块瓦，添不了砖，添不了瓦，就添一段电线，添一点土。反正尽我自己的最大努力，和大家一起干！”并表态说：“我来空军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空军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在空军干定了！”——说真的，文明强大与否，中国强盛与否，离林立果有点远。那些都不是他应该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他有能力考虑的问题。

看那标题，看那内容，还以为是林彪在作报告呢。实际上那本来就应该是林彪干的活，结果被林彪的儿子干了。在政治上，林彪和林彪的儿子的差别是很大的。

诡异的是，林立果不仅作了那报告，而且大张旗鼓地宣传。许多人带头鼓掌，说林立果讲得好。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虽然没有在现场听报告，却也对叶群说，林立果讲得好，相当于放了一颗“政

治卫星”。

自从大跃进之后，卫星这两个字就特别敏感。当然，还是可以把吴法宪的行为理解为阿谀奉承、拍马屁。但是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林立果和他身边那几个货要来真的。

接下来，在几位死党的策划下，林立果的讲话迅速在空军迅速传播。林立果也从“人才”变成“天才”，再变成“超天才”。如果没有第三次庐山会议，天知道会不会变成“咸蛋超人”。当年他爹在他那个年龄就已经统帅千军万马，也没有那么多名头；而林立果当时啥都没干过，就敢如此嚣张狂妄，以至于毛泽东在南巡时对林立果念念不忘，说：二十几岁的孩子就捧那么高，是害了他。

很难想象那一切究竟是林立果身边的那几个脑残的精心策划，还是有其他幕后推手。因为当时林彪还没有上位，如果林彪已经接班，宣传一下，看看能不能子承父业还可以理解；而当时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已经策划了那场政治闪击战。在那种的时候，应该是避免嫌疑，而非到处张扬，因为那样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林彪要上位，而是林立果要接班。

吴法宪看到了其中的风险，试图挽回，但是没有作用，因为那颗卫星不久就飞出空军，飞向全军，飞向全国。吴法宪不准空军印刷林立果的报告，但是下有对策。当时文化大革命嘛，手抄的东西很流行，那颗卫星越放越高，然后就爆炸了。

因为那股宣传风一直吹到庐山。在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已经表态的情况下，在陈伯达已经完蛋的情况下，在吴法宪被牵扯到的情况下，那股风还在吹。

连周恩来都看不下去了，找到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周恩来是出名的和气，不是很过分，他绝对不会点林立果的名的。这样搞得吴法宪也很委屈，因为吴法宪也没有办法。如果是周恩来说话还不算什么的话，那么毛泽东办公室的人也跟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似乎不能置之不理吧？

吴法宪的压力很大，就找叶群说：“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倒也不糊涂，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部收回烧掉，磁带也全部收回洗掉，并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但是效果不大。直到一九七零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还对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很高，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

后来吴法宪回忆：“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的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吴法宪这些话，有帮他和林彪洗白的嫌疑。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吴法宪无法完全控制空军，至少控制不了林立果那帮人。至少自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完全独立，也许连林彪都不知道他干了啥。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去了广东。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话是很有问题的。在庐山会议之后的那种大环境下，林立果还有心思搞调研？连吴法宪都不相信：“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

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吴法宪只好表示同意。为什么要去广州？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前，林彪还想通过党内正常途径转正的话，那么在庐山会议之后，那条路已经不存在了。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心里有想法，也许不会实施；庐山会议之后，在那场闪击战失败的情况下，他必须为自己考虑后路了。前面说过，广州军区原本是黄永胜的地盘，下面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林彪的粉丝。如果有想法，在广州军区更容易实现。

林立果去了广州军区之后干了两件事，第一，开飞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练习开飞机。吴法宪坚决不同意：“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叶群也同意吴法宪的意见。

在吴法宪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有学开飞机，但是周宇驰偷偷学了。周宇驰学会开飞机之后，就驾驶飞机到处晃悠，一直晃悠到南昌。程世清恰好从周宇驰的到处晃悠中，突然灵感爆发，联想到“林彪可能逃跑”。正是程世清的灵感，导致毛泽东南巡时突然改变计划。

这一切是是非非，谁又能完全理清楚呢？

林立果干的第二件事——玩失踪。

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给吴法宪安排了新工作——陪江青。江青到处转悠，总有吴法宪等人陪伴。他们几个虽然看江青横竖不顺眼，却也没辙。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吴法宪陪江青转悠到广州，想到林立果那个小少爷也在那里，决定去看看他。按照吴法宪得到的信息，林立果应该在空军第九师蹲点调查。但是他不在那里，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却不知道他住在那里，一番周折之后，通过空军副参谋长才在某个地方找到他——那是林立果在广州的私人据点。让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林立果还有很多据点，他都不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九一三之后了。

也就是说，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林立果，完全是独立自主的。

（三）林立果在干嘛

吴法宪虽然找到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在干嘛。日后吴法宪以此为依据，试图把他自己和林彪置身事外。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空军司令员管不了空军里的一个小卒子，只因为这个小子他爹是司令员的偶像。那么事情闹出来以后，小卒子他爹和司令员又如何能逃脱关系？

应该说林立果的做派林彪是知道的，至少知道一部分。

送林立果去空军，虽然是叶群出面，但必须经过林彪同意。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也是林彪的意思。吴法宪到处给林立果开绿灯，不是因为他看林立果多么顺眼，而是要拍林彪的马屁。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说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就不是林彪了。林彪从出道开始，从不干没把握的事。

那么林立果神秘秘地干了啥呢？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具体说，就是和他的那几个心腹写一份文件，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份文件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只有初期的《五一六通知》等少数文件才能与之相比——它对时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一份经典，一份非毛的经典之作。现在各大论坛中看到的非议毛泽东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赶得上那份文件的一半。

文章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捣鼓出来的。这里提前说一说，九一三之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都死了，只有李伟信还活着。很多证据来自李伟信，有些地方则存疑，即使《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也存在疑点。这里先说说文件本身。

文件一共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当前的局势和背景：九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

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政局不稳导致以下结果：

一，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总纲，因为不稳定产生危机。

二，夺权正在进行。——因为危机导致权力重新分配，也就是夺权。

三，对方的目标是改变接班人。——说白了，就是夺林彪的权。

四，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夺权方式：和平演变。

五，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六，他们“故计（伎）重演”。

七，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的方向发展。——和平演变的后果。而他们都属于枪杆子，处于不利的地位。

八，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要反抗。而且给反抗找了光明正大的理由：防止很多人头落地，还是拯救中国，反正自己代表正义的一方。

九，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的头上。——为未来干的事做一番展望。

和国外的“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的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自我打气一番，准备开工。

这份文件开始部分写得还是像模像样，很有总纲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处境很不好，我们要反抗，我们是被逼的，同时我们有反抗的资本。

一句话：反抗利益极大，不反抗危害极大。

夺权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作业，要干，就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当然，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一，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个假设，最为理想的假设。没有人能保证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必须考虑

另一种可能性。二，割据。就是只夺得部分权力之后的选择。至于第三种可能性——失败了怎么办？文件里没提，但是他们应该心中有数。参照之前的历史，只有两个结果：一，死；二，跑。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风险，但还是要去做。文件接下来论证行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B—52（毛泽东）的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道义在我们这边，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而已。

所有搞政治的，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都要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要强占话语权，不然的话，就站不住脚。林立果他们虽然没经历过真正的革命斗争，但长时间泡在权力中枢里，对这一切还是懂的。这一段甚至可以看成“讨毛泽东檄文”，甚至可以称作是最犀利的檄文。

优点摆完之后，自然要摆困难了。

困难第一条：目前我们的力量准备还不足。

——这是致命的一条，准备不足。凡事就怕准备不足。准备不足，是要害死人的。但是真正致命的一点恐怕他们还没有说出来，就是无法准备充足。

准备不足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难以准备充足。因为林彪虽然贵为二号人物，但是一号对军队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林彪必须小心翼翼地动作避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直在北戴河疗养，基本上没动。不仅如此，林彪甚至连身边的小团队都不敢绝对信任。事后证明，所谓的四大金刚，均没有参加九月十三号的具体行动。这说明林彪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忠于林副主席的同时，也忠于毛主席。

既然林彪都要小心翼翼地，不敢动，他都没有十足把握去行动，那么林立果凭什么能“准备充分”呢？他之所以有能量活动，是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如果他准备过于“充分”，那他也就暴露

了。于新野开直升机到处转悠一圈，就激发了程世清的“灵感”。在那种情况下如何准备充分？

所以困难的第二条才是致命的：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这个就不用说了，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接近“神”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对毛泽东的不敬，甚至不满，都将粉身碎骨。

毛泽东有那么高的地位，很大一部分是拜林彪所赐。如果不是林彪接过刘少奇造神运动的大旗，长时间坚持不懈地挥舞，毛泽东也不会那么神的。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尊神像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有超一流的手腕，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当毛泽东决心要干一件事时，唯一能让他罢手的就是他自己。当毛泽东施展他的手腕时，唯一能战胜他的人还是他自己。对此林立果没有多少感触，林彪却应该有切身体会。

所以第三条难点是：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的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这条本来就是多余的。如果能统一掌控军方的力量，也就掌握全部权力了，何必去夺权？而在毛泽东还在的情况下，任何人想掌控军方全部力量都是痴心妄想。

其实真正夺权，就是要从毛泽东的手上夺权。要夺权，必须能触及毛泽东本人。问题是林立果他们无法触及到毛泽东本人。

所以第四点困难：B-52 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说了这么多，就是行动很困难。所以需要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对己方有利的时机，而且不会等待太久的。文件指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

平衡打破之日，就是时机到来之时。时机到来的时候，无法有两种可能：

可能之一：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

——说真的，这种可能性不大，详情如上。

可能之二：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此后局势验证了第二种可能。因为双方虽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但根本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接下来应该考虑行动的技术手段了——要实现战略目的必须有足够的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之一：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掌握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可选择方法之一：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可现在方法之二：先斩局部爪牙，先造成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这两个手段都是非常乐观的幻想。

想要掌控毛泽东，需要突破以上罗列的种种困难。林立果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突破那些困难。除非是碰到异常走运的情况，但那是用两块钱博五百万的概率。那样子的馅饼，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就算走了大运，掌控了毛泽东，也休想把上层一网打尽。因为即使掌控毛泽东，也不敢公布出来。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想调动军队很难。别的不说，就吴法宪和黄永胜都未必同意。至于斩局部爪牙的方法就更可笑了。毛泽东的局部爪牙是哪些人？江青和中央文革那几个人。其他人如各方领兵大员，如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斩掉几个喷口水的，于大局无补。至于要斩许世友他们，呵呵，林立果也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反过来被斩的可能性倒很大。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属于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那么就转向技术手段之二：逼宫。

在历史上，类似的节目都是用武力威胁最高领袖。林立果他们也是有模有样。《五七一工程纪要》写着：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来达到目的。

——说白了也就是不对称战争，俗称恐怖袭击。

只不过林立果他们隐藏得更深。因为他是副统帅的儿子，可以调动很多资源。谁也想不到他会伟大领袖动手，那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如果放手去干，成功的机会还是有的。只是那几位大爷都是没有经历过考验的货，有机会也未必能抓住。

具体下来可以借助哪些力量呢？纪要给出了答案，分为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这些是联合舰队可以使用的力量。但是真正可以为他们所用的，也就是江腾蛟他们那些空军力量。实际上也未必可靠。因为在中国，凡是牵扯到反对毛泽东的，任何军人都不能保证是可靠的。这也是他们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们可以借助其他力量，纪要中分别罗列出来：二十军，三十八军，黄军委办事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这些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就算里面有部分林彪的人马，也不可能听林立果的指挥。特别是毛泽东南巡之后，他们反而是林立果的羁绊。话说回来，林立果也正是天真地以为那些力量会为他所用，才敢在开头部分写出，夺取全国政权或部分武装割据。

当然，任何时候搞政变都不能忽略外国因素。在那个时代，真正能影响到中国内部决策的两个超级大国是苏联和美国。所以纪要记载：要和苏联秘密谈判，利用中苏矛盾。

其实中国当时跟苏联搞得很僵，正在跟美国接触。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并不容易。

所以单看这些对内的口号，就能明白，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是靠不住的——最后的结局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外口号虽然也有荒谬的部分，但还是有点弦外之音的。

先看荒谬的部分：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空洞口号，不提。力度还不如天安门上毛泽东手书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呢。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这点也挺搞笑，前面还要利用集会把高层一网打尽。这些外交工作原本是周恩来和陈毅在搞。难道说要把周恩来和陈毅留下来搞外交吗？能如愿么？周恩来在，林彪能稳么？

有弦外之音的是下面这几条：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毛泽东）的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如何办到，林立果等人应该也不清楚。但是接下来透露了部分信息：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如果这几条能够实现，那么很明显的一个结局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前面说的一切都是计划、设想、评估，充满“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这些表示不确定的词语。要把不确定变成确定，必须付诸行动。没有行动的计划都是幻想。所谓计划，也就是把前面说的那些浓缩一下。他们把行动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又分成若干部分。

1，计划设计。——参照上文，不同时候，有不同的准备方式。

2，力量准备。——这个最难，也最重要。难，是因为保密性不好做，可靠的人不好找，而且还要有人指挥。他们建立的指挥班子一共有三个人：江腾蛟，陈励耘，王伟国。

江腾蛟生于一九一九年，湖北黄安人，一九三零年参加革命，担任儿童团大队长，但是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新四军干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的级别为三十八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评为少将。文革之前，担任空军第四军政委。江腾蛟很会来事，通过吴法宪赢得叶群的好感，叶群认为江腾蛟“政治突出”；同时江腾蛟和林立果的关系也很不错。

林立果初入空军时，江腾蛟常常带着林立果参加各种会议，结识长三角一带空军部队的负责人。

付出就有回报，不久，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可以说，江腾蛟是林立果在空军的内部心腹之一。

陈励耘是四川人，生于一九一九年，地下党，一九三八年去了延安。整个战争年代，陈励耘都在华东野战军里干活，跟林彪没有交集。不仅战争年代没有交集，建国之后，陈励耘和林彪私下也只见过一次面，前后不到一分钟。当时陈励耘担任空军第五军政委，和江腾蛟的关系不错。一九六九年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九大之后，因为一个空军工程建设问题去北京向林彪汇报。当时他看见沙发上的林彪，敬了一个军礼，问好：“问林副主席好”。林彪只回答了三个字：“好，好，好”。然后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就领着陈励耘到她自己的办公室看电影去了。严格意义上讲，陈励耘甚至不是林彪的人。

林立果之所以把陈励耘列入指挥班子，只是因为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非常积极。据陈励耘自己回忆，庐山会议之前，江腾蛟带口信给他：“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张春桥是反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上庐山之后，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林立果又用打电话给他：“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陈励耘说：“没有。”林立果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林彪讲话之后的第二天，陈励耘就在华东组开火了：“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等等，说了一大堆，慷慨激昂，自以为得计，没想到后来就遭了殃。因为表现过于拉风，林立果就把他划到指挥班子里去了。

至于王伟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一九三八年入党，整个战争年代处于半文半武的状态中。当时的王伟国很神秘，担任七四三一部队政委。

接下来就是基本力量：警卫处。

公开的力量，李松亭。

李松亭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然后进入空军，在王维国的手下担任警卫处长。他担任过毛泽东的警卫，曾经阻拦过王洪文；也担任过林立果的警卫。王维国指示李松亭，林立果来上海，要拿出最大热情，给予最周到的招待。李松亭表示领命。林立果喜欢吃螃蟹，上海螃蟹不好吃，李松亭就想办法去苏北搞螃蟹。这本是拍马屁的行为，没想到林公子吃了很开心，觉得李警卫人不错，能干、可靠，于是当成自己人。可见拍马屁也害人呐！

秘密力量，上海小组。

再有其它一些杂七杂八的力量，属于补充、辅助性质。

3，物质准备，分成两个部分：武器装备和通讯器材。

对林立果他们而言，要获取武器并不是难事。以他们所处的地位，有很多办法拿到武器，具体就不说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改装了一批武器。通讯器材，有一个传说中的 01 工程，是林立果自己主持设计的。

4，情报系统。

这一点最重要，也是最危险。只有充分的情报系统，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收集情报的可靠性非常重要。要实现情报的高可靠性，必须有可靠的人。可靠的人，恰恰是他们的短板。因为在那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崇拜毛泽东的。想要在那样的环境里收集情报而不暴露，难度不下于以前的敌后工作。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实施。

在《纪要》中写着：奇袭。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具体方式也罗列了，就是一种类似恐怖袭击的不对称战争，只不过恐怖分子袭击之后要表态承担责任云云。如果林立果他们成功了，会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充当正义之师，为“伟大领袖报仇”，就好比清朝入关那会，打出的旗号是“为大明皇帝报仇”。

这里他们又根据之前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下面三种办法：

第一个是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基本算是幻想。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想在上层联络大家反对毛泽东，基本上不可能。上面能串联好，庐山会议上林彪已经上岗就业了，不至于沦落到现在由林立果来筹划这些玩意。

第二个是先斩后联。——可行性不高，关键是后面的“联”，难度很大。

第三个是上下同时进行。——介于前两者之间。

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

——用张春桥当替罪羊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在中央文革的那帮人中，灵魂人物就是张春桥。张春桥能思考，办事有原则。江青只是地位独特，有自己的立场，并无多少实际的才华。康生有才华，但是老滑头一个，没有立场。姚文元只是一个文人，跑到中央文革纯粹是一个误会。只有张春桥既有立场又有才华。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场闪击战，矛头就是对着张春桥去的。当时有那么多人赞同林彪，其实

也就是因为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而已。彻底批判张春桥，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所以林立果虽然鲁莽，头脑还算清晰。

而且在《纪要》里明确指出：奇袭一旦进行开始，就要坚持到底。

所谓坚持到底，就是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要做到这点，必须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的联系卡断。——看来大家都钟爱上海呵，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搞起来的，林立果也看中了上海。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担心许世友。许世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听林立果的话的，因为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就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

固守浙江、江西。——把程世清看作自己人。却不知半年之后，毛泽东仅仅在南昌见程世清两次面，程世清就把一切都交代了。不仅把所见所闻交代了，还把自己的“灵感”也交代了。把如此重要的战略机密泄露给别人，林立果的行为，无疑是飞蛾扑火。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也就是上层串联，参照前面。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如果军事接管成功，这个可以有。但如果仅仅是占领一小部分，这一招未必灵。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四方串联

——这招就是由点到面，迅速扩大组织，壮大力量，达到全面夺权的目的。

最后一块要做的就是善后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打江山容易（夺权）坐江山难（守成）。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夺权之后的事情，和夺权一样重要。对此林立果他们在《纪要》里写到：

打着 B-52 的旗号打击 B-52 的力量。——每当看到这一点时，都有点怪怪的。可以肯定，这个主意绝对不是林立果他们几个的原创。以林立果他们几个那点人生资历，创造出如此有效的政治策略，说真的，有点难。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今年 4 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

友们那样提法（林彪谈政变）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 5 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和“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是异曲同工。而文革时代发生的武斗，两派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林立果把那招写下来，并且作为第一条策略，表示他对这种做法很熟悉、很认可。接下来又抄袭了一系列口号：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一小撮

——看看这些口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说白了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奉行的那一套。

为此，林立果他们还特意写了一段文字为自己的这种抄袭行为辩护：“他们所谓的‘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无非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接下来又说道：“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在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他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

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的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后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相当于“讨毛檄文”第二部分。

那么同样是“打击一小撮”，自己又有啥不同呢，《纪要》写到：“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 B-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予）政治上的解放。”

《五七一工程纪要》初看起来，写得头头是道，仔细看一看，矛盾众多，可行性不高，基本上是一篇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只是揭示了当时很多社会问题，如此而已。

这篇文章是于新野执笔的。但是李伟信也好，周宇驰也罢，也不论是否于新野，真正的核心人物还是林立果。没有林立果就不会有这篇文章。而文章本身就有很多疑点。

首先的一个疑点就是，这个文章是不是伪造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除了林彪一家外逃之外，还有一架飞机起飞。飞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几个都是林立果的心腹死党。后因逃跑失败，三人相约自杀。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则放了空炮，随后被捕。所有关于《纪要》的证据均来自李伟信的供述——孤证。孤证总是让人难以信服。

李伟信生于一九三四年，上海人，十六岁参军，擅长美术。估计连同自己都没想到，美术功底把他送上人生的高峰又把他推向深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李伟信在空军大院到处画毛泽东的巨幅像。林立果去上海收集“毛泽东像章”，李伟信帮忙。此后两个人走到一起，形影不离。李伟信成了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小舰队成员之一。

于新野执笔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生活秘书”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李伟信被捕之后，供出了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切。九月十三号那天，李伟信负责烧文件，而且是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李伟信烧掉很多东西，据说连避孕套都烧了，怎么会遗漏了这个如此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要知道烧掉的那些文章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比得上这个文件犀利给力。因此有人怀疑它是伪造的。

那个东西确实很值得怀疑。既然要烧文件为啥把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其实答案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复杂，就是因为大家怀疑它是伪造的，纠缠不清。这里面有很多问号，所有问号无外乎

两个字，真或假。

根据主流意见，是真的。因为它的当事人还在，经过法院确认，供认不讳。所以有人怀疑，除了只有李伟信孤证之外，还有其他政治因素。因为九一三疑点重重，很多谜题难以解开，所以中间让人想象的东西太多了。怀疑者的依据之一就是，李伟信可能受到政治压力。从周宇驰和于新野都自杀了，而李伟信放空枪的事实看，他是想活命的。在那个年代，活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配合。因为那个年代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信的。比方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比方说周恩来身上所谓的“伍豪事件”。还有一大堆冤假错案。不怀疑，才不正常了。

其实那个东西的真假，和之前那个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李伟信没有把它烧掉？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很简单的动机，反过来问，李伟信为什么要把它烧掉？

九一三爆发时，意味着一切都完蛋了。按照搞阴谋的流程规范，应该把文件啥的全部清理掉，也就是掩埋证据。最好把蛛丝马迹一扫而光。但是这样一个流程规范有一个前提——掩护自己不要暴露。当时他们都已经走了，也就没有掩护的必要。但是他们依然要把能烧掉的东西全烧了。目的也很简单，走后肯定要被人泼脏水。见不得阳光的证据少点，就少点泼脏水的机会。

但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不同。它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阴谋，包含各种计划；另一方面也是一篇檄文。这篇檄文就是揭露当时社会的不足，并且是攻击毛泽东的。留下来，让别人看，也是一种宣传作用。即使去了苏联，还要继续斗嘛。留下来，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辩护和宣传。

另一方面，计划暴露了，那么他们的同志如江腾蛟岂不是也暴露了？干吗要把自己的战友暴露出来？答案，恨。

因为江腾蛟他们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才政变失败。要说林立果他们不恨才怪，应该恨得牙痒。而且林立果甚至怀疑，有人是内奸，所以他们会借刀杀人，把内奸除掉。

所以从这个方面看，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完全合情合理，甚至是小舰队刻意为之。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李伟信没有说。就算事实真是这样，李伟信也不会说。原因很简单。说出来对他很不利。

上面解释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与否的可能性之后，再说说另一个谜题：林彪是否知道这份纪要。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但是必须要说。说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说林立果。

一九七一年，林立果只有二十六岁。这个年龄如果放到现在，也就是刚刚走上社会品尝酸甜苦辣，开始慢慢成熟的时候。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不论是内心还是头脑都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从林立果进入空军算起，他进入社会也才四年的时间。而他将要面对的那些人，却是纵横天下四十年以上的精英，在整个历史上都排得上号的精英。一个没有达到人生巅

峰的年轻人去承担了他所不能承担的重量。

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人只有经历过足够的挫折之后才会真正成长。即使是林彪，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之后才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林立果经历过什么挫折？他小时候可以有最好的玩具，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所有人把他捧在手心，没有人敢欺负他，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最好的学校，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单位，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在单位里干任何他想干的事，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他经历过最复杂的事情，就是选老婆。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他的肩膀还是稚嫩的，不足以和他面对的任何一个人对抗。

但是他自己却不那么认为，在他的人生中，一切都太顺了，还没有挫折的概念。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态。从好处讲，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从不好处讲，鲁莽。

从性格上讲，他并不是特别张扬。从很多回忆录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甚至沉默寡言，很像林彪的个性，但也仅仅是很像而已。个人经验上，人生境界上差太远了。二十六岁的林彪已经身经百战，踏上名将的征途了。

当然，林家处于权力的核心，林立果接触到的事情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看待。他很小就接触权力斗争，对上层发生的那些事了如指掌，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林立果搞的那些事，林彪是否得知？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结果，无法就两个，知道或不知道。

知道的可能性：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情形急转直下，林彪看似没有任何动作，但不代表他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毛泽东三板斧打出来之后，即使是政治盲人也能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林彪自己看似没有动作，那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动。他的身份太惹眼了，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注意。而且他身体也不好，动不了。让他来一次类似毛泽东的南巡，会要了他的命。

但是不代表他不想动。他自己不动，可以找人代替他自己行动。找谁呢？那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他的核心团队成员也很惹眼，而且正在挨批写检讨。另外林彪也无法保证那些跟随自己的将军就能因为忠于自己而背叛毛泽东。他唯一能信任的就是林立果。

不知道的可能性：连谋略超人、手腕出神入化的毛泽东都无法掌控每一件事，各方面都逊一筹，而且身体状态非常不好，甚至行动不便的林彪能掌控每一件事也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叶群的一言一行，林彪就掌控不了。林立果在外面干啥，林彪也可能掌控不了。

林立果毕竟是少壮派，初生牛犊不怕虎，顺风顺水不知道挫折为何物。那种人应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那种人的世界观里，不干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不足以显示自身的价值。所以他私下里搞那份《纪要》也是有可能的。至少吴法宪等人就认为林彪是无辜的。

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知道一个大概。如若不然，林立果也无法在空军里搞

出一个独立的王国。吴法宪纵容林立果，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是同时也要指出一点，拍马屁也需要水平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能揣摩对方的心思。如果吴法宪揣摩不到林彪的心思，也就不会纵容林立果。

但是林立果的行动细节，林彪是否知道，知道得早还是晚，这些先放一放，后面再讲，再回到林立果的事情上。因为林立果同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就是把《纪要》从理论变成现实，从唯一的一条巷子里走到天黑。

（四）一次诡异的会议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成之后就要落实。林立果组织《纪要》指挥班子开会，号称“三国四方会议”，也是一次极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三月三十一日。

三国四方，是林立果使用的一个隐藏的暗语。当时越南、柬埔寨、老挝三个国家要开会解决问题，地点在中国。当时越南分为南北两方。三个国家，变成四个代表，故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跟现在关于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差不多。林立果使用那个词，不至于引起怀疑，这是他精明的一面。

林立果口中的“三国”代指上海、南京、杭州，长三角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其中王维国代表上海，陈励耘代表杭州，周建平代表南京，再加上北京的江腾蛟，一共“四方”。

从九一三事件之前的走势来看，这个会议是落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个关键性步骤。但是它的诡异性就在于，《纪要》里明确记载的指挥班子成员，王维国、周建平、陈励耘，甚至包括江腾蛟在内，都不知道林立果的真实目的。

前面介绍过江腾蛟和陈励耘，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王维国和周建平。

王维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家庭条件还行，高中文化，后来受共产党影响，二十一岁那年加入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跟着中原野战军干，解放战争结束之前升到团长，长时间在秦基伟的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加入空军，一九六九年接替江腾蛟担任空四军政委。当然空军是林彪的后花园，吴法宪是园丁。任何空军高层干部，都与林彪和吴法宪有扯不清的关系。但是真正把王维国推向林彪的还是中央文革那帮文人。空四军在上海，上海是文革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龙兴之地。他们和林彪的军方力量是对立的。而王维国作为军方人物，不可避免地要站到林彪那边。按照王维国自己的辩护，他是“把林副主席看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

周建平也是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八年入党，一直在新四军干革命。建国之前也混到团长的级别。建国之后进入空军。周建平和江腾蛟是搭档。江腾蛟在空四军当政委时，周建平是军长。一

九六九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时，周建平升任副司令。按道理说，两个人关系应该不错才是，其实不然，复杂着呢。

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关系，有关系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总是复杂的。林立果在《纪要》里构建的指挥班子，成员之间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

江腾蛟原来在空四军当政委，因为善于拍马屁搞关系，对林家表现很好，比方说之前叶群买东西啥的，都是空四军出钱，因此赢得好感和信任，升了官。继任者王维国则是另一个风格，上任之后，就卡了一部分。江腾蛟很不爽，有机会就为难一下王维国。日后周建平到了南京军区当空军副司令，江腾蛟对周建平也有意见。

陈励耘和王维国原本八竿子都打不着，竟然也产生了矛盾。原因是陈励耘在杭州生病，请上海的专家会诊，需要十支白蛋白。那玩意当时是贵重药物，由王维国掌握。王维国说谁叫你答应的？说这不是小问题，是路线问题。陈励耘和王维国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江腾蛟和周建平的矛盾。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江腾蛟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要造许世友的反，搞得许世友很烦，又是躲到大别山，又是往北京跑。周建平则比较平和。因此江腾蛟告诉空四军和空五军，不要让周建平插手。同时调人写材料，说周建平是假左派真右派，搞得周建平很烦。

三月十九号，也就是《纪要》起草前夕，林立果让江腾蛟去上海联络关系，化解一下各方面的矛盾。林立果让江腾蛟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腾蛟给王维国投了信任票：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样的人最可靠。江腾蛟给周建平投不信任票：周建平的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关于陈励耘，江腾蛟说：他和我的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别人的船。

从这番话来看，江腾蛟很会做人。不回避私交和矛盾，也不忘夹带私货。

林立果对江腾蛟的回答很满意。江腾蛟去上海做王维国的工作。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建平。

江腾蛟到上海之后和王维国拉扯一番关系，做通了王维国的思想工作。起草完《纪要》之后，林立果让于新野代表自己去杭州找陈励耘，让他去上海。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当时陈励耘正在医院疗养。于新野说：“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陈励耘当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看见王维国。于新野又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陈励耘嗯啊一阵子，一直拖了三天，到了三月三十一日。于新野再次出现：“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这样陈励耘才去了上海。当然他没有觉得难受，因为王维国笑脸相迎。就是那天夜里，开了

那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晚上十一点。

据陈励耘回忆说，大家一开始东拉西扯，讲到陈励耘帮助林彪建别墅的问题和武器改装的问题。然后大家又是一番吹牛，王维国说空四军多么厉害，陈励耘说空五军备战了得等等。

扯了一阵子之后，扯到了二中全会。

陈励耘在大会上放了炮，挨了批，表示：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接下去说：现在军队的日子都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陈励耘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耘接过林立果的话：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

这正是林立果想要的效果，他接过话：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林立果的话刺激了在场的将军们。因为他们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都是军方的人，看那些笔杆子不顺眼。让他们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撒野，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江腾蛟直接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则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按照陈励耘的回忆，林立果冒出来这样的话让在场的将军们暗自吃惊不小，不敢再往下接。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正常情况大家应该洗洗睡了。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

正是因为江腾蛟论断周建平政治上靠不住，所以才没能参加会议。此时又突然提出让周建平前来开会，究竟是何用意？

按照周建平自己的回忆。因为路线问题，他和江腾蛟与王维国都不怎么对路，离开空四军后“人走茶凉”，经常挨点批斗啥的。三月二十六日，周建平去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做手术；二是把家搬到南京。三月二十日晚上，于新野去看望他说：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林立果）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周建平判断：林立果来上海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三月二十八日，王维国拉周建平去看林立果，老对头江腾蛟也在。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儿，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江腾蛟则说：“我打成五一六，你周建平也不好过。”总之一句话，要团结。

三月三十一日的会议，周建平赶到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又是一番东拉西扯，几个小时过去，已经是六点多，大家吃早饭，各回各家。临走之前，林立果告诉大家，周副司令（周建平）负责南京，王政委（王维国）负责上海，陈政委（陈励耘）就负责杭州，中间的协调工作找老政委（江腾蛟）。江腾蛟则谦虚一下说，他只能当参谋。

林立果的意思，那是要这几个人执行《纪要》，指挥作战的。从九一三事件的审查结果来看，几个将军根本就不知道《纪要》的存在，甚至连江腾蛟都不知道。他们把林立果的话理解为对付那帮以张春桥为首的秀才们。

这就是那个会议的诡异的表现。确切说，都不能算是会议，更像大家在一起侃大山。但是又的确是一场会议，而且在九一三事件的发酵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尽管并不成功），那么《纪要》将是一个空中楼阁，林立果接下来的各种举动将变得毫无意义。

此次会议透漏如下几条信息：

信息之一，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真的想大干一番。

信息之二，林立果之所以没有对几个将军交心，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他们几个并非绝对忠诚。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把它们拉进来，因为他们几个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可靠的人了。比方说周建平就和许世友搞得不错，为此惹了江腾蛟不满。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绝对不可能为林家所用。

由此可见林彪的位置非常微妙。以林彪当时的地位，如果对手是毛泽东以外的人，他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偏偏对手就是毛泽东，所有可靠的人都变得不可靠。所以林彪的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终的决策，林彪唯一能信任的人是林立果。林立果能信任的人也就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指望的几个将军都不可靠。

正因如此，日后毛泽东突然北返，大出林立果的意料之外。林立果的反应之一，估计就是出内奸了。那也是《纪要》出现的原因之一。

林立果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好先把几个勉强能用的人拉上自己的战车，至于日后怎么样，只能边走边看了。很遗憾，这招的效果并不理想。从那时看，九一三的结局就注定了。

（五）手令

林立果炮制《纪要》，召开三国四方会议有大背景——毛泽东在打“三板斧”。区别仅仅在于，毛泽东是明争，林彪借助林立果进行暗斗。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处于自高无上的位置，明争最为有利。林彪位置尴尬，只能暗斗。

从第三次庐山会议到林立果炮制《纪要》，前后五个月时间。在那五个月的时间里，恰好是毛

泽东对林彪步步紧逼的时候。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林彪逼入死角，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容易，二是不能。

说不容易，是因为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已经写入了党章国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毛泽东是一体的，要割开不容易。之前的刘少奇也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为了拿下刘少奇和他背后的行政集团，毛泽东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费了很大的功夫。

说不能，是因为林彪和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的支持者是行政系统，而林彪的力量来自军方。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打碎行政系统，却不能用那一套来对付军队。如果军队乱了，国家也乱了。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林立果在《纪要》里写的那些东西，毛泽东想得更明白。可以说毛泽东不担心政治上的林彪。在政治局上，甚至不用毛泽东出面，林彪都未必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不是喷口水的料。

毛泽东担心的是军事上的林彪。林彪的军事天才并非只有他战场上的那些对手才明白，发现、提拔、塑造了林彪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了解林彪。如果毛泽东真把林彪逼急了，结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把林彪逼入墙角之前，必须消除林彪的威胁。

所以毛泽东选择南巡，南巡的路线也是精心选定的，先去武汉，然后南下长沙，转而去南昌，最后沿江东下进入长三角。

在这些地方中，武汉军区负责人多半出自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毛泽东给他们吹吹风，提醒他们不要站错队伍。同时武汉军区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中国腹地，控制着中原。自古以来中原安，则天下安。近代中国混乱的源头就在武汉。疏通了武汉军区，相当于保障了中国北方的安全。

毛泽东在长沙的主要目的就是瓦解、挖出林彪在广东军区的根系。主要手段是安插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政委——华国锋是绝对忠于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给广东军区的主要领导丁盛和刘兴元上了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一手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并不能保证掌控广州军区，因为黄永胜在那里经营了多年。

所以毛泽东在南昌时召见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和福建军区的韩先楚——这两个人毛泽东完全放心。如果林彪真的决定在广州孤注一掷，那么必然要开启战火。韩先楚和许世友两个人将是处于最前沿的位置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此部署，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动武的可能。而林立果在《纪要》里的那些构思，基本上化为泡影。所以这就是差距：林立果只是畅想一下，组建指挥班子都不敢说明；毛泽东已经把他的路全部堵死了。

毛泽东部署的时候，一边行动诡秘——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一边又不断地向大家吹风

放空气，实际上就是把消息传播出去，传到林彪的耳朵里。当时的林彪正在北戴河度假。据记载，那时候的林彪喜欢擦火柴，燃烧了，闻一闻硫磺味，然后就坐在那里默想。毛泽东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他下一步的默想的依据。

两个相识、相交、相知数十年的男人就通过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隔空过招。

如果没有程世清那个灵感的爆发，毛泽东应该在南昌多住几天，一切部署完毕才东去。

九月五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和刘丰上当，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传给周宇驰和于新野。周宇驰和于新野把内容传给林立果。刘丰把内容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告诉了叶群。

这样林彪就从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的举动言行。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给林彪准备了第三个信息通道——更为隐蔽、更有杀伤性。

当林彪得到毛泽东的讲话内容而思考对策时，毛泽东已经在两天前到了杭州。在杭州，毛泽东找了三个人：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军区司令员熊应堂任省，另一个就是被林立果写进《纪要》的陈励耘。当时的浙江，这三个人就是老大。除空五军政委之外，陈励耘还是杭州警备司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如果他铁心追随林立果，决心鱼死网破的话，毛泽东还真的危险。

当时驻防杭州的是二十军，原华野一纵王牌，司令熊应堂，政委南萍。熊应堂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后来在第三野战军战斗，五五年封为少将；南萍是政工干部出身。杭州本来就是是非之地，各派混杂其中。南萍和熊应堂也挺能折腾，在文革期间风头很足，对南京军区的许世友不感冒。许世友看他们也不爽，双方闹得很僵。毛泽东在中间调节了很多次，效果不大。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有一个模式：先讲党内历次斗争，再联系到现实问题，再讲团结。

在杭州则完全改变了这个模式，单刀直入：“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问得那几个将军心惊肉跳，特别是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放了炮，正后悔不已。

毛泽东盯着陈励耘问：“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正常情况下，领袖都是和蔼可亲的，亲自追究某件事时，表示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按照陈励耘的资历能量，原本是不够资格领袖亲自过问的，问题是庐山上那一炮太响了。陈励耘顿时很紧张，赶紧辩解：“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然后又

补充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已经很自觉地划清界限了。如果林立果看到这一幕，估计会气得脸色铁青吧。不过陈励耘把所有事都往领导吴法宪身上推，干得有点不地道。毛泽东也不满意：“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回答不了，看着毛泽东发怔。

随后毛泽东的谈话才进入正常轨道，什么党内斗争啊，庐山问题不简单啊，要团结大多数啊，还是之前的老一套。只不过力度更大一点。毛泽东说：“那份简报（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反革命都出来了，实际上接近摊牌了。因为到杭州时，南巡基本结束，部署基本完毕，剩下的就是扫尾工作。这应该是毛泽东改变谈话方式的原因之一吧。

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这话直接指向林彪，“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庐山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同时又有意把林彪区别出来，“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庐山会议之前，林彪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

毛泽东再次告诉陈励耘：“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这就有意思了，毛泽东为何抓着陈励耘不放？原因有三个：第一，他知道空军是吴法宪经营多年的地方，空军的主要领导都是林彪带出来的。在空军，林彪的威望和力量相当强大。林立果捣鼓出来的《纪要》，也是以空军为主。指挥班子成员全部来自空军。

第二，毛泽东知道陈励耘和林彪那帮人的关系，他需要借助陈励耘给林彪传递信息。告诉林彪，一切没完。陈励耘会传递消息么？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林立果、于新野他们都挂了，已经难以对证。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在杭州时，毛泽东的行踪已经不再是秘密，召见哪些人也不是秘密。

据陈励耘自己的回忆：“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我才清楚一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

陈励耘这话并不全对。身为林立果信任的人之一，庐山会议参与者，中央委员之一，经过那么多事之后要是连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都看不出来，这个也太愚钝了吧。如果这种愚钝是真的，那么他就不会对林立果等人设防。如果他的愚钝是假的，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应该会有办法从陈励

耘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因为他应该明白，不管愿意与否，他和林立果都站在同一条船上。事实上，陈励耘在八号晚上把毛泽东的讲话告诉了于新野。

——不论哪一种情况，林彪都可以从陈励耘那里得到信息。这样他就从三个方面得到了毛泽东要动手的信息，都是对他自己不利的信息。

至于毛泽东抓住陈励耘的第三个原因则隐蔽一些。毛泽东九月三号到杭州，九月八号转移到绍兴，九月十号才去上海，中间在杭州附近整整呆了一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三号和几个将军谈话，四号、五号两天让汪东兴找了几个人，要他们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南巡时的讲话精神。接下来的四天，毛泽东好像啥都没干。汪东兴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的行动。而七月六号到十号中间，毛泽东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说实话，南萍和熊应堂也就是地方军区级别的，根本不够资格让领袖如此关心。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里走走。杭州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跟武汉、南京根本没法比。毛泽东在等待什么呢？

日后陈励耘回忆：“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

毛泽东想从陈励耘那里得到啥呢？可以参照南昌的程世清。毛泽东给了一番教育之后，程世清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倒出来了，而且加上自己的假设和猜想，毛泽东对陈励耘应该寄予同样的希望。如果陈励耘把一切倒出来，那么日后的政治斗争，就多了很多证据。然而陈励耘没有那样的觉悟，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敢。

陈励耘的想法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想把事情糊弄过去。

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一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而在相同的时间里，各种消息汇集起来之后，林彪终于有了反应。

于是在九月八号，林彪写了那张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

——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唯一的反应，留下的唯一的活动证据。

就这么短短一行字，而且中间没有标点符号。它成了九一三事件中另一个幽灵。

这个手令又引起了一系列疑问，因为它有好几个版本。

九一三那天，周宇驰和于新野驾驶飞机逃走未遂，自杀之前把林彪的手令撕成碎片。抓捕人员把那些碎片拼接起来，就是日后法庭上出现的那份，为林彪的“反革命”和“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

的直接证据——但是那份手令是“竖”着排列的。

于运深是林办秘书，也是第一个看到手令的人，他看到的是“竖”体。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这个版本。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日后江腾蛟在法庭上公开表示，他见到的手令写得很整齐，与拼接起来的那份（有些潦草）不一样。另外的当事人，如林办老秘书关光烈从林立果那里看到的则是“横”体。专机师副参谋长胡萍是另外一个看到手令的人，是林立果拿出来的手令，也是“横”体。胡萍后来从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知道那个“竖”体版本，觉得很奇怪。但是“横”体那个，在林立果手上，跟随林立果一起完蛋了。

更直白地说吧，林立果手上那份是“横”体，周宇驰手上那份是“竖”体。

这就很奇怪，林彪即使写手令，也不至于写出横竖两个版本吧？以林彪的性格，能精简的绝不会繁复。也就是说，两个手令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也就是说有人冒充林彪的签名。关于这个，当事人提供两个证据。

证据之一，胡萍见识过于新野专门模仿林彪的签名。当时他还很奇怪，心想这小子模仿首长签名干嘛？

证据之二，叶群在毛家湾让秘书模仿林彪的签名。林办秘书张云山回忆，林彪当时拿笔就会着凉出汗（衰弱得可以）。叶群让秘书练习代笔，首先找到张云生。他觉得事关重大，假装练习很久练不成，同时和其他几个秘书串通，也假装练不成。最后叶群找到年轻、有点文化的保密员李根清。李老实、能干活，没有那么多心眼，就练习了。李根清是个实在人，把每一次代批的文件都做了记录。那个著名的“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迹写的。

据张云生回忆，叶群和林立果也模仿过林彪的字。

那么问题就来了，手令是不是被模仿的呢？是与否，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手令不是林彪写的，那么又回到问题的原点上，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是否知晓？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周宇驰撕碎了，后面再被粘结好的，然后在法庭上公布的那份手令，应该是真的。笔迹的问题即使能难倒后世的观众，绝对难不倒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对林彪的熟悉程度远在林彪团队的成员之上。别忘了，还有康大专家，虽然为人狠毒，鉴别水平可是大师级的，想要模仿几天就瞒过他们，很难。

此外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手令的内容：盼，希望的意思，舒缓的祈使句；手令内容本身是一项命令，需要执行的，也就是句式和内容之间有矛盾。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手令”的书写者并非权威，更像出自一个中间人的手笔，进而怀疑，手令有造假的可能。

这点基本也可以排除。周宇驰拿的“手令”是林彪的笔迹，那也就不存在内容上造假的可能性。而句式和内容之间的那点小小的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客观上说，那种小小的矛盾，可以舒缓双方的距离感。毛泽东签发的电令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林彪也一样。另一个原因是，那个矛盾恰好反映了当时的林彪的处境。如果林立果拿着林彪的绝对命令到处招摇，那么很显然，绝对会引起很多人的警惕。如果那样的话，消息就会很快传播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反而失去隐蔽性，大大不利于己。

尽管如此谨小慎微，杭州的毛泽东还是探测到了细微的波动。

（六）警觉

从毛泽东对陈励耘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毛泽东已经知道了点什么。九月八号晚上，林彪有所反应不久，毛泽东探测到两条信息。

信息之一：空五军军长白崇善给毛泽东暗示：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实际上就是在说陈励耘。陈励耘改装过一批飞机和武器，尽管事后证实他并不是林立果的忠实追随者，但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相当敏感的。

信息之二：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走路。

“这种事之前从来没有过。”汪东兴回忆说，“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毛泽东找到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

于是专列转移到绍兴，那恰好是在林彪写了手令之后，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如果仅仅只是巧合的话，那么真正引起毛泽东警觉的正是陈励耘本人。改装飞机和武器啥的，作为一个中级指挥官，根据现实需要改点装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毛泽东要移动列车时竟然找不到陈励耘本人。要知道陈励耘可是负责杭州的警备工作的，直接负责领袖的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对领导应该是鞍前马后，而现在呢，跟领袖玩失踪？而且是在那种非常微妙的情景下。

当时陈励耘在干吗？和于新野聊天。于新野和陈励耘的关系不错，但他们可不是唠家常的。林彪的“手令”传递出来之后，于新野到杭州给陈励耘布置任务。直到那时，于新野向陈励耘亮出底

牌，即行刺毛泽东。于新野对陈励耘说：“林副部长考虑，可以用改装的伊尔-10 飞机轰炸。”

陈励耘之前大概能隐隐约约地猜到林立果的疯狂，但是没想到疯狂到如此地步。就算陈励耘认同林立果的疯狂，他也绝对不会自己去执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刺杀最高领袖毛泽东，成功或失败，结局只有一个——死。

荆轲刺秦王，失败，死。专诸刺王僚，成功了，也是死。

当时毛泽东的威望无边无际，任何对他不敬的言论都可能遭殃，何况是动手？如果不能一击得手，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力量相当强大，一般武装力量难以突破。陈励耘贸然出击，即使侥幸成功，结果也只有一个——被格杀。即使不是被军队格杀，也会被林立果格杀，而且可能性更大，因为那样就死无对证，林立果就可以做文章。

去干，必死。不干，可活。陈励耘只要不傻，就不会听于新野的鬼话。所以陈励耘对于新野说：“这里没有可靠的飞行员，干这件事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行动。”于新野早有准备：“这个你不要发愁，准备给你派个人来。”准备派谁呢？鲁珉。鲁珉在朝鲜战场上打掉五架美军 F-86 战斗机，立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嘴上说：“那就好！那就干！”心里估计在想，去你大爷的，老子才不去当炮灰呢。

陈励耘看着于新野，如同看着催命阎王。好在于新野的重点并不在杭州的陈励耘，而是上海的王维国。据说他的房间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陈励耘看见画像就发愁。

毛泽东在绍兴又呆了一天半的时间，等陈励耘的回应，结果还是一场空，已经意识到危机将要来临。十号中午，毛泽东把汪东兴喊过去，吩咐：“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根据一系列的分析判断，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陈励耘。但是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司令，又不能绕过他。如果绕过他，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岂不是正好给了他推脱责任的口实？如果单独接见，可能给陈励耘提供了图谋不轨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和汪东兴又想到“掺沙子”的计谋：让南萍、熊应堂和陈励耘一同前来。因为空军和陆军并非铁板一块，如果搞阴谋，也不可能跨界搞。而毛泽东特意交代：空五军的军长白崇善，这个人也请来。”

毛泽东南巡，原本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林彪在地方军区的势力。程世清在南昌的猜想改变了毛泽东的行程；在杭州，白崇善则起了另一个作用。正是白崇善提供的信息引起了毛泽东对陈励耘的警

觉。

九一三事件之后，原来的空五军领导班子只剩下两个人，军长白崇善和副军长王海。白崇善是飞行员出身，原本应该去空四军的，当时江腾蛟死活不愿意，后来去了空五军。虽然是军长，地位和陈励耘没法比。从九月八号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可靠的，所以毛泽东要白崇善也过来。那样即使陈励耘要搞花样也不容易。毛泽东见到白崇善时，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九月三号那天）你为什么不来看我！”白崇善自己没说话，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在值班。”领袖问军长的问题，政委却在一旁辩解，答案很明显，陈励耘在说谎。在陈政委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白军长这个人。

临别的时候，毛泽东告诉几位将军：“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

（七）转折

九月八号晚，林彪的手令下达之后，北京西郊机场附近的秘密据点，林立果、王飞、周宇驰、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四个人在一起捣鼓出三个办法：一，用火焰喷射器或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的专车；二，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毛泽东的专车；三，趁毛泽东接见时，王维国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看看这些行动方案，只能用一个字形容——乱。在相同的时间里，毛泽东把列车从杭州转移到绍兴。如果这个原因不是几位冒险家能控制的，那么看看于新野去杭州找陈励耘说的那些话，林立果的统一行动方案还没拿出来，那样做太冒险，万一陈励耘不靠谱，反水怎么办？

于新野告别陈励耘之后去上海找王维国。王维国是关键的一环。之前林立果让江腾蛟说说对陈励耘等人的看法时，江腾蛟就说，王维国唯一的靠山就是你们。实际上在林立果的计划中，押宝于上海。

当初江腾蛟让王维国好好照顾林立果，王维国超额完成任务。他在十月九号从空四军抽调一百零六名战士，建立了一支教导队，训练得非常好。这支队伍相当于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使用得当可以干很多事。正如江腾蛟所说的，王维国的靠山只有林家。八月七号，毛泽东南巡前夕，林立果让李伟信去见王维国，送了灵芝草。林立果仿佛很喜欢给人家送灵芝草。江腾蛟去上海时，林立果也给了一棵灵芝。其实用意很明显：好自为之。王维国表达自己的忠心：部队形势不错，请副部长放心，将要进行骨干整风。

于新野离开杭州之后去了上海，见到王维国。他们的主要希望就在王维国身上。于新野在后唐招待所和王维国密谈。于新野告诉王维国，陈励耘已经决定在杭州大干一场，同时也指出：不管陈

励耘在杭州干得怎么样，首长的意思，还是准备以你这里为主来搞。上海是毛泽东回北京的必经之路。

之前王维国还不知道林立果的计划。王维国建立教导队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为了保卫林立果，而是准备在关键的时候解决笔杆子。因为当时上海的局势非常复杂，既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派大佬，也有林彪的军方嫡系——两派尖锐对立。

但是林立果却想用这支队伍来执行暗杀计划。

王维国的反应和陈励耘差不多。大家都不是傻瓜，都不愿意当炮灰。毕竟在“必死”和“可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

所以王维国的脸色乌云密布，说：“这事难办啊！”

于新野给王维国打气：“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上海这边有飞机、有高射机枪连、有‘教导队’，条件比杭州好。”反正鼓励别人去送死，成了之后自己的好处多多，“你用飞机将专列一扫，先打车头，再用高射机枪把停车的地点包围起来吧啦、吧啦一大堆。”

王维国是不会轻易上当的，开始摆出实际困难，“要是主席不在专列上，而是住在宾馆，四周都是上海警卫营的人该怎么办？”

于新野已经准备好了说辞：“那就在路上搞。”于新野说。

王维国继续摆困难：“主席坐的是保险车吧？”相当于说路上也不容易搞。

于新野沉默片刻，支招，“‘教导队’事先隐蔽在西郊公园。布置好高射机枪，到时一阵扫射，‘教导队’冲击，可大功告成！”看看这水平，赶上街头说评书了。

凭什么确定毛泽东会在西郊公园逗留？机枪能搞定保险车么？教导队能解决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力量？于新野没能确定任何一条。王维国是明白的，所以他没有吭声，用沉默表达不赞同。

最后于新野发狠说：“不干也是死，只能拼了，还能拼出点生的希望。”

王维国看出了于新野的外强中干，心想，“傻瓜，对你不拼等死，对我拼了才是死。”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王维国没有任何行动。

于是九一三事变之后，王维国出现两张脸孔，这个后面再说。

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到达上海，林立果还在北京西郊研究行动方案。

八号晚上研究的那三条并不能保证成功。一击不中的话，后果相当严重，所以要继续研究补全。周宇驰又想到新的一招：炸铁路。一番讨论之后，否决。周宇驰又提出炸油库。江腾蛟表示可以考

虑。因为油库爆炸之后，会有大火，制造混乱，就有机会。于是江腾蛟搞出来一个地图，捣鼓一番，也没有定论，很有书生造反的味道。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搞笑，那么看另外一点。九月九号下午开会时，又新增加一个人——关光烈。他在东北参加革命，随四野南下。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出山，他担任林彪的秘书。然后下部队，为一二八师政委。九一三事变之前，他即将升职。

林班秘书中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叶群毁了林彪，关光烈就是典型。据他说，林彪喜怒不行于色，叶群爱出风头。叶群虽然表面上顺从林彪，但因为地位独特，对付林彪很有办法。因为林彪身体很差，林办的具体事务都由叶群打理。关光烈给林彪当秘书期间，见过林彪两次推辞国防部长。一次是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让关光烈打电话给周恩来，说身体差，不宜当国防部长。叶群当时没说话，跟着关光烈出去，让他暂时不要打电话，她去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是，电话没打。第二次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份（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让关光烈代他写信给毛泽东，辞去国防部长，结果信被叶群压下。如果林彪当年真的辞去国防部长，结局肯定是另外一个情况——也许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关光烈下部队之后还算顺利，回林家的次数也不多，但是偏偏被林立果惦记上了。林立果把关光烈喊过来，给他看了林彪的“手令”，提出两个要求，一，让关光烈把火焰喷射器送到上海；二，调一个营的人去北京。

——也就是要武器和要人。行动都开始了，才要武器、要人。饭桌摆开之后，才想起柴还没有劈，米还没淘，菜还没有洗。不禁要问，林大少爷，你这是哪一出？如果你爹当年就这水平，估计都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准备得差不多了，林立果宣布：“就在上海搞：一，如果‘B-52’住在机场，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掉他；二，住在市里，就找几个人用手枪干掉他；三，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掉他。”——比于新野的水平稍微高点，但也没高多少。如果在场的人有反对的，估计林立果也会硬着头皮说出和于新野差不多的话。

在场人中间，真正经历过战场的考验，具有指挥能力的，只有江腾蛟少将。江腾蛟原则上同意林立果的方案，但是到具体设计时，江腾蛟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否决了第三个方案。具体原因不详，无非是行动困难。如果在车站强攻毛泽东列车，“教导队”那帮人未必能拿下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最关键的是，那相当于光明正大地动手，时间拖长了，必输无疑，而且无处隐藏。

诡异的是，毛泽东在上海，恰恰是没有下列车。当林立果意识到行动失败时，肯定会想到江腾蛟否决了那个方案——恨他入骨。

九月十一号的时候，林立果还在研究行动方案。这一次拿出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案，制造另一场“皇姑屯事件”，然后宣称有人搞破坏。一旦成功，林彪就可以以副统帅的名义接管所有的事情。不会像强攻列车，或者在市里动手那样惹出巨大风波。

行动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地点：一，容易安放炸药；二，相对偏僻，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经过一番勘察之后，林立果把地点选择在上海和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从地形上来看，非常理想。林立果的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但那笑容还没来得及绽开就僵化了，因为一个电话传来，毛泽东已经改变行程，离开上海北返，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林立果的眼前一阵漆黑，仿佛看见末日的来临。

在一贯的印象中，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可是从九一三事变之前那几天的反应来看，他办事拖拖拉拉，前后不搭调。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他的行动方案才最后定稿，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误判。林立果判断，毛泽东至少在九月二十五号之前不会回北京，他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从九月八号把专列转移到绍兴开始，毛泽东仿佛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列车刚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人，以防不测。离列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油库。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可以炸掉油库，趁乱实行计划。汪东兴看到了那个油库的潜在威胁，特地派人在那里守卫。

毛泽东在上海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巡视，而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这招分解成如下几步。

第一步，放空气球：由汪东兴通知王洪文，并且让王洪文把许世友叫到上海来。

众所周知，王洪文是文革派，毛泽东的文革的标志性的一个人物之一。许世友是毛泽东最忠实的铁杆。但王洪文和许世友不是一路人，他常常找许世友的麻烦。许世友呢，看不起王洪文那种直升机往上窜的家伙。毛泽东让王洪文去喊许世友，相当于放出一个空气球：要好好教育自己的文武两派，搞好团结关系。

毛泽东的列车停靠在靠近虹桥机场的支线上（上海虹桥车站和虹桥机场相距很近），却没有下车。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属于可行动（在机场）和不可行动（没下车，不容易搞）之间。没有行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那个空气球放的好；另一个原因则是，王维国一直在犹豫（不想当炮灰）。

这步棋走得很妙，但是也出了一点意外。就是王洪文准时到了，而许世友却没有出现。王洪文往南京打电话喊许世友，南京方面说许世友下乡去了。

毛泽东没法，让汪东兴去喊许世友，自己只好在列车上等待。

尽管心里很急，但毛泽东必须等许世友。因为许世友是当时整个长三角最重要的人，又是毛泽东的心腹。如果空气球放出去了，没见许世友就离开，可能会适得其反。

许世友下乡是很微妙的一幕。要知道许世友对毛泽东的忠诚堪比李逵对宋江，无需任何怀疑。晓得伟大领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南京军区管辖范围）内巡视，许世友没有理由跑到乡下视察。一月份的大地光秃秃的，有啥好看？

许世友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许世友看不上王洪文，不想鸟他，即使闲着无聊在打鸟，也故意说不在；二，许世友不想再听伟大领袖唠叨什么和上海帮的笔杆子团结之类的，听得比较烦。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许世友根本就不是下乡调查，而是在部署。如果说毛泽东窥视到林彪的动向，在长三角一带，最能信赖的人还是许世友。从十一号各路人马的反应来看，许世友和王洪文应该都知道点内情的，要不然也不可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十一号上午十点，许世友才到毛泽东的列车上。毛泽东十号下午四点到上海，九点钟见到王洪文，然后一直等许世友，等了将近十五个小时。能让毛泽东等十五个小时，绝对非比寻常。接下来，毛泽东实施金蝉脱壳的第二步，虚晃一枪。

许世友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自己去看农场了。毛泽东半真半假地批评了许世友：“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许世友赶紧承认错误。然后又说庄稼长得很好，要大丰收之类的。

——满嘴跑火车。一月份的小麦才刚刚出土，其它农作物还没有下地，哪来丰收？是许大老粗故意忽悠领袖？应该不是。

实际上是接着第一步来的。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团结问题，又说了许世友犯的错，没啥新意。如果有人把这些消息传递出去，传到林立果的耳朵里。林家大少爷估计会微微一笑，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伟大梦想即将实现。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谈话很少，时间也很短暂，而且一部分谈话内容永远消失了。在场的汪东兴虽然写了回忆录，但是汪东兴不可能把所见所闻全部记下来。他不敢，也没有必要。从接下来的进展来看，毛泽东和许世友之间，必然有不为人知的联系渠道。

接下来就是金蝉脱壳第三步，逃出生天。

临别之际，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让他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许世友要求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推掉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周建平、王维国、郑长应等人。

毛泽东得知他们离开之后，决定立刻离开。汪东兴问是否通知去锦江饭店的那群吃货。毛泽东

说得很明确：“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一点二十分，毛泽东从上海动身。从许世友在上海现身到毛泽东离开，前后只有两个小时。而此前毛泽东为了等许世友，十五个小时都没吭声。如此诡异、异常的举动，太出人意料了。此时的林公子还在北京调整暗杀方案，还在确定火焰喷射器的问题，还在思索如何对付中南海那些人。他还没有明白，虽然他已经二十六岁，但不论是头脑还是脚步都跟不上擂台对面的那位七十八岁的老人。

王洪文最先得到毛泽东离开的消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酒桌上通过咬耳朵的方式把消息告诉了许世友。要知道王洪文和许世友是政敌。如果没有某种默契，王洪文不会把自己的独家消息和许世友分享。九一三之后，上海一批人落到王洪文的手里，许世友想要，王洪文死活不给。

毛泽东对王洪文是信得过的。许世友出现之前，毛泽东和王洪文有充足的时间讨论那些七七八八的事。王洪文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日后四人帮垮台，就王洪文的反应最大。如果王洪文不知道一些信息，不会表现得那么淡定，应该是毛泽东把一部分信息告诉了王洪文。

许世友吃了晚饭立即坐飞机回南京，在南京车站等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列车在南京站仅仅停了十五分钟，毛泽东也没有再次接见许世友，时间是六点三十五。三个小时之后到蚌埠，停车五分钟；再过三个小时到徐州，停车十五分钟；十二号凌晨五点到济南，一点十分到北京丰台车站，停车布置。

听到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林立果心里估计把陈励耘、江腾蛟、王维国咒骂了好几遍。杭州的陈励耘不靠谱，江腾蛟敲定的政策也不靠谱，关键的关键是，王维国竟然也不靠谱。如果王维国不靠谱，那么就没有靠谱的人了。

林立果出逃的时候，焚烧了大量文件，唯有《纪要》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他的用意除了想揭示那个时代的种种问题之外，还想把指挥班子那几个人暴露出来。为啥要暴露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林立果的期望，导致整个林家的覆灭。

那种恨，可比天高，可比海深。

按照林立果的计划，要在上海搞，关键人物之一就是王维国。按照汪东兴日后的总结，林立果策划了八种办法暗杀毛泽东，好几种行动方案里都提到了王维国，其中第五种办法是专门为王维国设计的：利用接见的机会，开枪刺杀毛泽东。

其实十号下午，毛泽东接见王洪文的时候，也接见了王维国。如果王维国要动手，那是最好的机会。有人以此推断，王维国几个人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有人又进一步推断，甚至林彪也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所有的事都是林立果一个人捣鼓出来的。从后来的结果看，王维国和陈励耘“很可能”

不知道林立果的谋划——也仅仅是“很可能”而已。

更大的可能性在于，一开始也许不知道，最后时刻知晓了。那时候，他们已经站在林立果的船上，很难再下船去。关于这一点，关光烈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在林立果的策划中，原本没有关光烈什么事。最后时刻林立果想起了关光烈，让他送武器才把他卷入的。日后有人问关光烈：“当时知道林立果在干坏事，为啥不去中南海举报？”

关光烈回答：“现在回头看，事情很清楚。但当时太突然，弄不清楚。当时上面的关系太复杂，弄不好捅了大篓子。而我本身也不自由，被他们监视。所以想，干脆算了，听天由命吧！”关光烈当时离开林家已经好几年，尚且如此纠结，陈励耘和王维国一直跟着林立果混饭吃，想下船更难。

既然无法下船，干吗不豁出去干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本身：干吗豁出去干了？

王维国和陈励耘的理由是一样的：干，必死；不干，可不死。死与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话说回来，就算王维国想要去干，那也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干。从毛泽东放出的空气球来看，没有理由着急下手的。接下来就没有机会了，不仅是王维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动作如此之快。

何况王维国不愿意去当炮灰，原因如下：王洪文跟许世友咬耳朵之后，饭后许世友大张旗鼓地飞回南京见毛泽东，相当于公开了毛泽东的行踪。如果连王洪文都知道咬耳朵，那么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许世友更有理由警惕了。

许世友之所以如此选择，倒并不是因为许世友是大老粗。许世友人粗，但是粗中有细，要不然无法在战场上生存。许世友的举动恰好证明，他和毛泽东之间有某种联系：之前那些套路都是策划好的。

王洪文和许世友咬耳朵，那是毛泽东刚刚离开。许世友大张旗鼓地回南京，毛泽东已经离开两小时，已经出了上海，差不多到达无锡了。

与此同时，王维国的选择值得玩味。他没有选择向林立果汇报毛泽东的动向，而是回家大睡一觉，一口气睡到十点才给北京打电话，说毛泽东走了——那时毛泽东已经快到徐州了。王维国这个举动引起后人的争议，有人据此认定王维国不知道林立果的阴谋。这么解释可以说得通，但是并不能构成定论。

更靠谱的解释是，王维国不想当炮灰，只想和稀泥。按照林立果的策划，要在上海动手，不论结果如何，王维国的处境都不妙。所以只要毛泽东在上海，他就会心神不宁。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对王维国来说是最好的结果，既躲掉了当炮灰的命运，又不得罪林立果。所以等十个小时，就是给毛泽东离开的时间。到了南京，那就是周建平的事了。

只是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根本没有在南京停留，快马加鞭回北京了。

王维国虽然留下不少疑点，但他的种种反应都是可以解释的。

真正的疑惑在毛泽东本人。九月八号是一个节点，林彪在那天写了“手令”。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毛泽东仿佛姜子牙附体，处处棋高一着、领先一步。

一个人真的可以神奇到如此地步吗？还是有人给他传递信息——也就是传说中埋伏在林家的间谍？好吧，先看看间谍问题。

（八）谁是间谍

要说对立之时，双方都没有刺探信息的间谍，那是谁也不相信。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各种刺探、各种报告。在毛泽东身边，至少有两个人是绝对可靠的，就是周恩来和康生。那两位在收集情报上那是大师级别的。对于这点，国共两党都是公认的。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情报工作出色，当年共产党的家底很可能就被顾顺章卖了。国民党那边，各位大佬更是对此刻骨铭心。康生虽然不如周恩来那样显赫，但是主管党内审查工作几十年，大小事别想瞒过他。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林彪的人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却没有连带康生。

尽管周恩来和康生的情报工作出神入化，也不是说无所不能。比方说在孙维世案件中，周恩来使出全身招数也无能为力。毕竟林彪在战场上纵横天下二十年，没有一身金钟罩铁布衫（自我保护能力）的功夫，早就挂了。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也许是某个神秘人物给毛泽东收集情报，他的名字正躲藏在档案馆里，等待资料解禁的那天；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间谍。但是如果非要把间谍拿来说事，那么现在能追查到蛛丝马迹的人只有三个：程洪珍、李伟信，还有李文普。按照当初的剧情，这三位都应该死去的，偏偏都因为各个神奇的原因活了下来，而且提供了其他人无法提供的证据。

程洪珍，一九四四年出生，山东人，比林立果年长一岁，他的工作是替林立果保管文件和负责对外联络。两人关系很不错。林立果心情不爽时就会骂程洪珍，骂到神清气爽为止。对于高层人物而言，若非信得过的人，否则是不会暴露情绪的。林立果对程洪珍真的很不错，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仅仅在上海就介绍了十二个。程洪珍倒好，竟然一个也没有看上，不仅没有丝毫不好意思，而且振振有词：“我是‘康曼德’林立果身边的人，找对象不好，不是给林立果丢脸么。”也只有关系密切的人才会如此吧？最后林立果没办法了，把选美所得的“种子”选手之一介绍给程洪珍，才

让他满意地恋爱了。

九月十三号凌晨，身为林立果的心腹之一，程洪珍的任务是在山海关机场守电话机。然后按照原定计划，程洪珍将带着两个女兵和林家一起出走。因为北京方面行动迅速，打乱了原来的计划。林彪一家到机场时已经乱糟糟的。当时程洪珍联系不上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宇驰。周宇驰告诉他大事不妙，让他赶紧跟着林立果跑。程洪珍从调度室出来，正好看见林彪、叶群、林立果上飞机。按照常理，程洪珍也应该跑过去跟上。

然而就在那一刻，程洪珍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般停了下来，为啥呢？害怕。他可不是有了不祥预感啥的，而是害怕林立果骂他。这就有点狗血：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还在担心是否挨骂的事，极为不正常。如果说那一刻想起了漂亮的对象，舍不得她还说得过去。

后来有人根据程洪珍的不正常反应推断他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间谍。

就在那一念之间，程洪珍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虽然活了下来，日子也不好过。首先要进监狱，面对无休止的审查。好不容易出狱，精神却失常了。回老家后住在哥哥的家中，给人家看大门维持生活。一九九六年喝农药自杀，五十二岁，未婚。

比起程洪珍，李伟信知道更多。李伟信见证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最后一个负责烧材料的人，和周宇驰、于新野一起逃跑，没跑掉，一同陷入绝境。三人相约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急中生智，太有才了）。不仅如此，还主动坦白交代了一切。

那两人死了，李伟信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出狱之后虽然和夫人离婚了，但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投身于建筑事业，干得相当不错。后人怀疑李伟信是间谍有两个原因：一，他是林立果骨干成员中唯一活下来的；二，他提供了很多信息。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九月十三号那天晚上，李伟信就主动向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生于一九二一年，起于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的开国少将，战场上走出来的大老粗一枚。当时就发扬大老粗精神，拍桌子骂李伟信：“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幸好吴忠跟林彪扯不上关系，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人，要不然遭殃了。

李伟信被捕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高喊要见汪东兴。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红人，也是当时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很多人忍不住猜想：是不是两人之间存在秘密？

李伟信提供的消息成了九一三事件的呈堂证供。由于程洪珍精神失常，李伟信的证据支撑起林立果活动的骨架。按照阴谋论者的观点，李伟信比程洪珍更有条件当间谍，毕竟间谍混到程洪珍那个样子，实在有损间谍的光辉形象。

按照阴谋论者的观点，还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间谍，就是陈士印，在陈修文身边。按照周宇驰

的暴怒程度，陈士印应该也是难以逃脱的。但是他很精明，装死，躲过一劫。因为陈修文干事特别有力，以至于很多人把陈士印忘掉了。其实陈士印冷静、低调、不漏声色，非常有当间谍的条件。只是他的资料不好找，不了了之。但是同时也证明，如果他是间谍，也就应该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极为可疑的，就是江腾蛟。

按照参与程度，江腾蛟比李伟信知道的还要多。当林家葬身大漠，周宇驰和于新野开枪自杀。留下的人物之中，也就是江腾蛟责任最大。按照当时那个政治环境，江腾蛟竟然神奇的存活下来，而且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比起李文普，他们几个惹出的风波不算啥。

在林彪丰富多彩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特别的人物，有领导、有同事、有对手，各个都是人中豪杰。李文普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以微不足道之身，引起巨大争议。

李文普是黑龙江人，大字不识几个，解放战争末期加入四野警卫团。他算是大老粗一个，却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老粗，沉默寡言，办事沉稳，粗中有细。因此在一九五四年到林彪身边当警卫，调进调出好几次。最后林彪在生活上依赖李文普，离不开。

所有权势家庭都是是非之地，林家也一样，各种复杂。李文普却进进出出，应付得很好。除了粗中有细之外，就是不去参与各种是非，辛辛苦苦地干活，不管其它，因此林彪非常欣赏他。即使叶群对他不满，想让他走人，林彪保他；即使李文普去了中央警卫局上班，林彪也把他要回来：“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

林彪对生活要求不多，对奢华那一套不感兴趣；但是很苛刻，风声、水声都听不得，睡觉需要恒温；没法洗澡，只能用毛巾擦身体等等，这些事都由李文普来干。此外他还要负责林彪的安全警卫，可以说一个人干了很多活。

可以说李文普和林彪接触的时间比叶群或林立果还多，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自然会成为各方面的焦点。正因如此，日后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把他当成“林家大总管”去描述；更有甚者，认为他可以“监控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有人再进一步，认为他是中央警卫团安插在林彪身边的卧底。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这些描述夸大了李文普的能量。林家大总管永远是叶群，李文普的功能充其量只是林彪的副官。至于监控，呵呵，如果林彪轻易被人监控，他就不是林彪了。

但世间的事就是这样，总有它的根源。原本低调的李文普突然出现在风浪尖上，只因为他在九月十三号那天成了关键人物。

李文普原本只是低调地干活，不涉及林家是非。然而很遗憾，是非还是找上他。找上李文普的，是林立衡。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找到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表示很惊讶，那可是一个天大的阴谋。但是李文普也就是惊讶而已，因为林彪让他收拾行李准备去大连，并没有去别处。李文普问林立衡要证据，林立衡没有证据，于是李文普认为林家兄妹之间又发生矛盾了。

九月十二号晚上十点多，李文普在值班，林立衡把他叫到小厕所里说了同样的事。李文普的反应还是一样：“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林立衡没有再说什么，之后就去了八四三一部队报告。

李文普虽然没有认同林立衡的话，但心中也起了波澜。十一点多，叶群带着李文普去林彪的卧室。按照往常的习惯，林彪应该在睡觉。此时李文普发现，林彪已经穿戴好了，并且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去大连）。”李文普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则说会有吴法宪的飞机过来。按照李文普自己的说法，他起了疑心。因为他对林彪的生活习惯非常了解，正常情况下，林彪不愿意被打扰，会半夜三更爬起来去大连？

随后叶群让李文普赶紧调车：“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调来一辆大红旗防弹车。车子一共三排，林彪和叶群坐在后排，林立果和刘沛丰坐在前排，李文普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时间是深夜。

直到此刻还没有李文普的戏份。接下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车子经过五十六号楼时，李文普听到林彪问林立果一句话：“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

——这个跟李文普也没有关系，但是经过接下来一系列惊魂动魄的场面之后，其它人都死了，只有李文普活了下来。在李文普的供词中，林家父子的一问一答成了呈堂证供。

这些也没啥，关键的是这个问答之中，看起来有弱智的成分在里面。

伊尔库茨克地处西伯利亚的心脏地带，南邻贝尔加湖，是苏俄远东地区的第二大城市（第一为海参崴），是苏俄远东的中转站。中苏友好时代，领导人互访，货物互换都要经过伊尔库茨克。当初毛泽东访问苏联，那里举行过隆重的欢迎仪式。中苏对峙时代，苏联远东司令部就在伊尔库茨克。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之时，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小规模冲突不断，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林彪本人就是天才统帅，特征之一：地图痴。林彪带兵几十年，身经百战，空余时间就用来查看地图；上台十年都在注视苏军动向，随时准备和苏联战争，会不知道苏军远东统帅部所在的位置？这玩笑也太狗血了。而且林彪当年去苏联，也是在伊尔库茨克中转的。

当然这个疑点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方说林彪此次外出坐的是三叉戟喷气式飞机，和之前的

螺旋桨飞机不一样，所以询问一下。也可以解释为，就是出门时随口一说。林彪的一切还是由他的行为判定。如果他没有出走，随便问什么地方多远，都没人拿他怎么样。关键是李文普转述的那句话成了林彪出逃的证据，而那句话听起来疑点是如此之多，所以就把原本人微言轻的李文普推到舞台中央。

按照李文普和林彪的特殊关系，原本的结局应该是和林彪一起出逃，再随那架飞机坠落。然而李文普干了比林家父子的对话更为不可思议的事：听到那莫名其妙的对白之后，他竟然判断林彪要叛国逃跑！

根据李文普的回忆：“那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驾驶员）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五十八号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这段异常在哪里呢？

这么说吧，后人评价林彪的功过是非，是以林彪的行为为依据。当时林彪是二号人物，虽然和一号人物之间发生了矛盾，但较量过程李文普并不明白。一个小小的警卫凭什么根据一组对白就判定二号人物要叛国投敌？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当然，前面有那么多铺垫，比方说林立衡的表现，还有其他一些反常现象。但是这些都超出了——一个警卫的职责，甚至思维范畴。要解释李文普那种现象，只能用灵感爆发来形容，就像程世清根据一些细节推断出林彪要逃跑一样。但是人家程世清好歹推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去向领袖汇报的。而李文普的判断，基本上就在电火石花之间形成。从五十六号楼听见林家父子对话，到五十八号楼下车挨抢，用分钟计算都太少了。

因此有人怀疑李文普知道一点其他内情，甚至怀疑他是毛泽东的间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表现就很反常嘛。

退一步说，李文普是毛泽东的人，他也很难接触到核心部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变，林彪基本上没有动。所有的动作就是那个手令，还有给黄永胜写了一个纸条，其它的事情都是林立果在外面折腾。李文普没办法接触到林立果，也无法钻进林彪的脑子里知道他想什么。

换句话说，李文普即使是间谍，作用也有限。毛泽东那出神入化的动作，绝对不可能来自李文普的信息。那么毛泽东又是根据什么做判断的呢？

（九）机变

如果把八号到十二号那几天单独拿出来看，确实匪夷所思。如果把整个事情连起来看，就自然而然。

有人用一个杠杆就能撬动地球，有人手捧金饭碗还会饿死。

什么级别的人干什么级别的事。要判断一个人的行动，首先要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毛泽东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就谋略那一块讲，放在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也是名列前茅。

毛泽东本是一介书生，曾经年少轻狂，读书不少，说过很多看似愤世嫉俗的言辞，看起来有点像打嘴炮的。但是和“嘴炮们”又不同：手中还能写很多不甚成熟却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文章，同时提出一些还算实际的策略。

青年时代赶上历史转折时期，加入一个无法独立自主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事业开始并不顺利，遭遇一连串的挫折打击。在那种逆境中，共产党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陷入思维的泥沼而无法自拔时，湖南的毛泽东却敏锐地看到中国的主体阶层——农民——的需求，于是他做出了改变，自己拉队伍。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的日子并不好过，外部生存环境恶劣，被各种各样的国军反复围剿，只能依靠连续不断的游击战求生存。然而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他和战友们的队伍不仅没有消亡，相反却在不断壮大。在队伍壮大的过程中，内部斗争又兴起了。他又遭受排挤，大权旁落。

在长征时期，他在绝境之中复出，一举占据了党内领袖的位置，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经历诸多是是非非，但无人可以撼动他。而且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转变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实现本土化，一举夺得统治权。

看看这个过程：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到成为国家领袖，纵然有时代大潮所趋，和这样那样的巧合与机缘，就个人而言，必须有超一流的思想境界和谋略为基础，才能成就这番伟业。

建国之后的毛泽东从领袖的位置再进一步迈上神坛，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是非对错姑且不论，但都通过谋略战胜了所有的对手。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已经把矛头指向林彪，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拿下林彪，让他靠边站。

毛泽东的策略是，首先拿下陈伯达，斩断林彪和政界的联系，然后三板斧，瓦解林彪的团队。这一系列的决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动作是南巡。南巡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斩断林彪和地方上的联系，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整个一系列组合拳，可谓算无遗策。

正是在那个背景下，林彪才把林立果放出来折腾。

从南巡开始，毛泽东就处于高度戒备中，警卫部队的人员和装备，行踪极为隐秘，谈话内容精心选择。如何放风，如何调控，尽在掌握之中。换句话说，所有的局势走向都在毛泽东的操控之中。毛泽东操控局势的能力如何，之前半个世纪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

战争年代的高瞻远瞩，政治运动时的无处不在，这些早已无需多说。

一九七一年，恰好是林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相对于建国之前的张国焘、王明等党内政敌，林彪的身份是毛泽东的战友、学生、接班人；相对于建国之后彭德怀、刘少奇等曾经的战友，林彪好像掌握的资源更多。彭德怀一直就在军内，甚至连军内二号人物都算不上。刘少奇虽然也是接班人，但没有军方背景。而当时的实力派都有军方背景。文化大革命之后，行政体系基本上被砸碎，剩下的就是军方力量和一帮理论家。林彪是党和军内二把手，名副其实的国家二号人物。

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历次斗争中，林彪的处境最为狼狈。建国之前的王明、张国焘，都曾公开和毛泽东较量，并且一度让毛泽东难堪；彭德怀也大声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刘少奇也在四清运动中大显身手。唯独看似掌控很多资源的林彪，好像还没有动手就一败涂地。

当年的张国焘，看刚上台的毛泽东不爽，就拉着自己人南下，因为他有那个资本。王明也通过代理人的方式，把毛泽东折腾得不行。他们可以那么干，是因为他们当时和毛泽东平级，甚至是毛泽东的上级。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只能是跟着毛泽东走。所以林彪的处境极为尴尬，有劲也使不出来。

刘少奇在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之前，白区工作干得就很不错，是共产党文斗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刘少奇虽然依靠毛泽东成长为党内的参天大树，但是在饥荒之后，还是表现出独立的个性，在调整经济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林彪在文革期间，同样造成很大灾害的时候，没有做任何事，只有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才想起抗争。当他抗争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中，连当初的彭德怀都不如。

彭德怀从来都是毛泽东的下级，但彭德怀自己起家，自己拉队伍，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彭德怀就是彭德怀。林彪战功也很大，但是和彭德怀不一样。林彪的成功和毛泽东的刻意栽培、提拔分不开。井冈山上，是毛泽东和朱德让林彪接替王尔琢。当林彪担任红一军团长和彭德怀双峰并峙的时候，林彪的红一军团是毛泽东和朱德创建的，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主要自己拉回来的。在解放战争期间，林彪去东北之前，已经好几年没上过战场了。而东北的共军是最强大的，因为班子已经搭建好。给他搭建班子的人，就是毛泽东。不仅如此，林彪日后成为二号人物，班子也是毛泽东一手搭建的。

所以林彪不能动，因为他和领袖是一体的。他动一动，就会给领袖制造口实。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很少在北京，他唯一能干的事，就是让林立果去折腾。

从个人素质上说，放在整个二代群体来看中，林立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把他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让他跟毛泽东玩谋略，只能说命运太残忍了。双方差距太大了，除了年轻力壮之外，林立果在其它方面根本不具有任何可比性。

当毛泽东集中全力操控时势的时候，宛如雄鹰盘旋在天空。林立果同志的级别，也就是荒草里的一只山鸡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对手中，党内党外，林立果大概是吨位最差的一个，完全就是牛刀杀鸡。

南巡本来就是冲着林彪去的。程世清在南昌的一席话，足够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九月八号，白崇善的提示和陈励耘的反常，对毛泽东而言已经足够了。因为从毛泽东的部署来看，林彪也好，林立果也好，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那有限的余地中，最有杀伤力的一条，就是铤而走险。阳谋（正常途径上位）玩不过，阴谋（政治闪击战）也玩不过，那就没法玩对称战争。铤而走险，也就是不对称战争，是最后一条路。

已经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会对灾难丧失警觉么？当然不会。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一九六一年，蒙哥马利第二次来到中国，见到毛泽东，相谈甚欢。

然后谈到死亡的问题，毛泽东侃侃而谈曰：五种死法：

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

二是坐飞机摔死；

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

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

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

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经准备了。”

看看日后林立果的那些暗杀技术手段，基本上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综合这些来看，毛泽东处处占据先机也就容易理解了。两点：一，毛泽东在操控大局，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和推动者嘛；二，毛泽东洞若观火，因为拥有那个实力。离开了这两个大前提，其它都是扯。

单凭几个小小的间谍就能让一号人物对二号人物动手，那样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小说里。所以说，在毛泽东的行动中，特别是九月八号之后，间谍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

间谍很可能是存在的，可能是上面分析的那几个人，也可能是别人，甚至可能是林立果看中的

江腾蛟。但是主题还是毛泽东本人，因为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当他回到北京的消息传开，不仅林家鸡飞狗跳，连周恩来都有些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在整个行动中，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踪迹的。而上海启程之后，毛泽东的行动超过了周恩来的预想。毛泽东在丰台车站的一番部署，周恩来没有任何参与。

（十）布置

毛泽东没有急着回中南海，专列停在了丰台车站，因为他需要在那里安定大局。所谓安定大局，就是要保证任何人都玩不出花样。具体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强力压住一切可能出现的动荡不安。所谓快刀，就是军队。所谓强力，也是军队。

毛泽东在天津车站让张耀祠打电话喊人到丰台车站听候指示。他们是谁呢？既不是唯一知道毛泽东行踪的周恩来，也不是他信得过的张春桥等人，更不是林彪的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上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中将，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少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德（日后在解决四人帮问题时，他也发挥了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几位控制着北京的命脉。李德生和吴忠是战火里滚出来的将军，陈先瑞、纪登奎和吴德则是文官。李德生就不用说了，本来就和林彪扯不上关系，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入军委办事组的棋子，是毛泽东要“三板斧”时把他放进去的。

吴忠是接替温玉成上任的。陈先瑞一直在北京军区，政治一贯正确。相比李德生，吴忠的上位更为复杂。因为温玉成原本是林彪的人，但是得罪了江青，也没有讨得林彪和叶群的欢心，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前就降级去了成都军区。

毛泽东找他们几个做一番交代。对几个政委，还是老师对学生，上思想教育课，和之前的谈话内容差不多：第一，“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万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第二，“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们自己。”；第三，“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但是这次谈话却有些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吴德回忆：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且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这是干什么？如果他掌控了切实情报，就应该快马加鞭，立刻去抓人，搞得大家以

为他要为后面的三中全会做准备。事实上，毛泽东对政委也就是吹吹风，因为他不仅要引蛇出洞，还要让蛇动起来。

毛泽东和几个政委的谈话，其实还是烟雾弹：问题没完，接着算账。

玩政治嘛，需要证据。实际上就是逼迫林彪有动作。有动作，才有破绽。

毛泽东最后的筹码并不在那些政委们那里，而是在外围。谈完之后，毛泽东单独交代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是北京的西北屏障，向北是张家口，可以抵挡北方的力量；同时可以直接威慑北京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每当北京有大事发生，三十八军就会悄然出现在北京外围。三十八军布置到位，相当于一柄利剑悬在京城上空，任何人休想再有大的动作。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和林彪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就是调三十八军入关，然后对北京各大部门军事接管，刘少奇束手无策。几年过去了，威慑对象从刘少奇变成林彪。刘少奇搞党务出身，军方力量有限，也就罢了。林彪的根基就在军方啊，怎么会被威慑呢？答案很简单：当时的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林彪虽然是军委副主席，没有毛泽东批准，一个排也调不动。

这就是所谓九一三事变中的另一个谜团：毛泽东认为北京不安全。实际上称不上谜团，根据之前的反应，如此部署，在正常不过了。

部署好一切之后，大局已定，毛泽东才进入中南海。此时林家已经知道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慌乱一团。

然而事情没有结束，还需要解决一些细节问题。

所谓细节问题，就是可能引起的某些极端行为。九月十二号晚上，汪东兴指示中南海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部队拉出来，增加岗哨是最基本的；设置路障、挖工事是升级版的；中央警卫团成立机炮大队，是加强版的。

如果说京城外围部署军队是防止林彪乱动，那么中南海进入一级戒备，就是给林立果准备的，防止他狗急跳墙。

自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勇敢地变身为设计师。首先设计出《纪要》，接着根据它的精神设计行动方案。捣鼓出一大堆方案，却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最后好不容易要制造一场“皇姑屯”，却错过了机会——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应该说林立果是一个勤奋的设计师，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执行者。因为他还没有明白，方案不在多，贵在精。他的小团队本来就不是很融洽，再搞那么多方案出来，只会造成彼此推诿。

陈励耘在杭州不肯动，王维国在上海也不肯动。王维国回家一觉睡了十个小时之后才打电话给林立果，说毛泽东离开了上海。林立果并不着急，因为他判断，毛泽东会在国庆节之前回北京。判断的依据：以往惯例都是那般。

仿佛自己的计划极为高明，毛泽东会对此一无所知。自信？自负？愚蠢？都不是，而是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看见林家少爷如此反应，不禁让人觉得一切索然无味——差距太大了。

好比一场体育比赛。年近八十的毛泽东把所有动作都做完了，二十多岁的林立果还在热身。然而林立果的梦很快就被惊醒了：听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

当时林立果、周宇驰几个人在一起开会，场面相当有特色。之前每次开会，都是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仿佛天下已入我手。这一次则是凄凄惨惨戚戚。

骄傲的林立果流下了眼泪：“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一句话戳到了大家的心窝子。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狂妄的周宇驰抓起酒瓶摔掉，发狠说：“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如果不是半个世纪之后出了一个拉登拿飞机去撞五角大楼，估计后人会对这些话一笑置之。然而半个世纪之前，可行性怎么样呢？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国庆节还有将近二十天的时间，不论可行性如何，周宇驰都没有机会了。以毛泽东他们在战争年代的效率，二十天的时间都能组织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了。

从中南海警卫布置看，仿佛毛泽东再次得到内幕，仿佛又有间谍的可能。那么猜测也可以，其实根本没有猜测的必要，局面已经很清楚，在毛泽东掌控大局的情况下，所有的行动只能是非对称的局部战争。说得光辉一点，特种战争；老土一点说，城市游击战。毛泽东就是那种战术的宗师级人物。除毛泽东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老同志都很了解那一套。不用毛泽东动手指，汪东兴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与其费心思猜测或有或没的间谍，还不如看一看毛泽东是如何操控全局的。

（十一）阴谋与阳谋

现在绝大多数的史料都在描述林彪如何有野心、想上位，如何放任儿子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仿佛是毛泽东在无奈之下，被动反击。——那是一种“烂好人”的观点，一种误导。

“烂好人”的历史观，也是一种害人的历史观。因为它不仅低估了观众的智商，也同时向毛泽东和林彪泼了脏水。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一生是主动出击的一生，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不会被动等待。他可以接受某个时刻的失败，也会观望等待，但绝对不会“被动”。如果他是一个甘于“被动”之人，就不会上井冈山，就不会抗美援朝，就不会发动文革，也不会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抓住林彪不放。

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一直都是毛泽东在主动掌控大局，林彪被动应对。如果说之前那些有很多偶然，那就看另外一个问题：林家如何知道毛泽东回了北京？

毛泽东在杭州无法躲过林立果的眼睛，因为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司令。上海也一样，王维国参与负责警卫工作。南京就不一样了，按照“三国四方会议”精神，林立果让周建平负责南京，然而南京是许世友的地盘。在那里，谁也别想和许司令掰手腕。事实上，周建平和许世友的关系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江腾蛟拼命折腾，把许世友折腾得到处跑，依然不能拿许世友怎么样。周建平却相对平和，因此江腾蛟对周建平相当不满，甚至搞材料准备修理周建平。在上海开会时，江腾蛟还当着林立果的面警告周建平：大家站在同一条船上，我倒了你也别想好过，一起完蛋。

也就是说毛泽东到了南京之后，完全可以封锁消息，隐蔽起来。所以林立果接到王维国的电话时很淡定的样子，他以为毛泽东在南京某个地方跟许世友吹风呢，甚至还可能想：周建平那家伙啊，还是不怎么可靠啊。

然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毛泽东原本可以秘密潜回北京，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搞定一切：控制局势，抓捕所有嫌疑人。然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丰台车站停下来，大摇大摆地接待一批人，再大摇大摆地进北京。按照惯例，毛泽东很少白天回北京。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回来了，好戏开场。——为啥？

按照林豆豆的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也就是说那些还觉得不够，还要特意通报。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要理解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解释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体制自诞生那刻起，就注定与众不同，其中有两个很大的缺陷。

一个缺陷：生存艰难。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当时很虚弱，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类似晚清的那些“卖国条约”。如果当时的中国情况稍微好点，完全可以趁机把外东北收回来。那个基本事实导致了一个缺陷，就是干部终身制。要么死在战场，要么一直干下去。

然而任何组织都需要正常的新陈代谢：领导人变更。

领导变更需要自己人，如何知道谁是不同政见者呢？第二个致命缺陷出现了——大清洗。当时

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权威进行血腥的大清洗，基本上把苏联从上到下屠杀了一遍。中共诞生之初，也有类似的现象，比方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就用那一套。

建国之后就不能再用那一套了，那毕竟是阴谋，适用于特殊时刻，无法推广。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搞起了政治运动，把阴谋变成阳谋。

毛泽东要解决林彪和林彪背后的那帮人，直接暗中把他们抓起来审判，那是历史倒退。如果那种做法可行，之前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早就不在了，所以必须是阳谋。

所谓阳谋，也就是搞证据呗。

搞证据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对手动起来。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直不动，就是不给领袖机会，没办法了，才让林立果去搞。而林立果是蜜坛里成长的孩子，没有经历过任何磨练，取胜的概率微乎其微。

毛泽东的三板斧、南巡都是逼迫林彪有所动作。他成功了，因为林立果本人行动了。接下来毛泽东再一反常态，高调回京。把阴谋玩成阳谋，林彪想不动都不行了。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林立果叫喊一通，乘飞机返回北戴河。叶群的反应：“一〇一（林彪），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

——事实远比想象中的猛烈。九月十三号，大概是共和国诞生之后最特殊的一天。

——证据不仅是全部爆发出来，而且多到无法想象，甚至超出了伟大领袖的承受能力。

——毛泽东大病了一场，原本硬朗的身子骨一下子衰老下去。

十二、林彪出走

（一）林立衡的爱情

平型关战役之后，林彪名扬天下。原本是应该在战场上再创佳绩的好机会，不想被阎锡山的晋军误伤。因为伤及神经，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跟不上，毛泽东让林彪去苏联治病。同去的还有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当时已经怀孕，他们最终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开。林彪在苏联恋上孙维世，无果。回国后和叶群结婚。一九四四年，林立衡出生。

因为林彪非常喜欢嚼黄豆，所以起名为林豆豆。

林立衡是个早产儿，母女两人仿佛天生关系就不好。叶群对林立衡不怎么样，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文革之前，林家常常收到陆定一夫人写的攻击叶群的信，搞得林立衡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亲生的。查出证明之后，林立衡仍然和叶群搞不好关系。

要说叶群不爱孩子，那也是瞎扯。天下不爱孩子的父母也有，只是极少数和变态的。但是父母的爱能否被孩子接受则是一个未知数。叶群和林立衡生长的环境从家庭到社会都是两个概念。叶群生于旧时代，母亲是姨太太，男尊女卑，养成了她的小聪明，有点自卑，控制欲望极强。林立衡恰好生长在建国之后，崇拜英雄，追求自由，是朝气蓬勃的一代。母女两人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不对路是必然的。

其实叶群当年念女子学校，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奔赴延安，也算是敢想敢干了。然而成为母亲之后，她性格中的缺陷就暴露了出来，具体表现是控制儿女和别人。控制的集中表现：包办婚姻。林立果和林立衡都是追求自由恋爱的，林彪对此也很赞同，但是叶群不行。她要控制，不仅要控制她那弱不禁风的丈夫，还要控制家庭和孩子。

控制孩子的关键是控制孩子的婚姻，控制孩子的婚姻是家天下时代的大家族的核心法规之一。当时林立果选美，叶群就很纠结。林立果看中的，叶群看不中；叶群看中的，林立果不愿意要。选中张宁还是林彪最后拍板的。

林立衡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林立衡自己谈过对象，当时叶群得知后先是把林立衡大骂一顿，然后让吴法宪下令把林立衡的恋人叫过来一番审查、写保证书、然后远调新疆。可怜的同志，呵呵。

叶群原来想与黄永胜攀亲，想林立衡嫁给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黄春光表态：本人不愿意，如果你们（爹妈）要这么做，我服从。理由：我在自家娇生惯养，进了林家就不一样了。黄永胜说，这样他们不会幸福的，算了。

黄永胜的老婆项辉方不敢得罪叶群，就使劲给林立衡介绍对象，先是介绍了一个搞美术的，人

挺不错，叶群满意，也见了林彪。然而很遗憾，美术搞得可以，人却太过老实。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叶群亲自指导那青年给林立衡写情书。林立衡发现真相之后，果断与之断交：“主任”不是给我找对象，是给她自己找对象。

项辉方再次忙碌起来，又介绍了几个，依然没成。

叶群决定两个孩子的婚姻一起解决。“选妃”的同时，也在选“驸马”。要求男方条件：基本条件，政治过关（不能和“黑五类”扯上关系）；身体硬件，身高一米七二至一米七八，年龄二十六岁至三十岁；软件，英俊有气质；学历，大学或专科文化程度。

和林立果一样，林立衡不买账。林立果还好，最后还选了几个。林立衡就是看不中，而且要自由恋爱。叶群宠爱林立果，对他的挑剔还能忍；本来看林立衡就不爽，现在自然毫不客气，把她狠揍了一顿。

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仅仅是拳打脚踢，那还可以理解为一个母亲的一时愤怒。愤怒的叶群把林立衡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揪下来，发根还带着血丝。这个已经是狂怒了。狂怒之后，又把她关在黑屋子里，关了三天，而且不给吃的。——对待犯人也不过如此吧？所以林立衡无法忍受了，愤而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

由此可见母女两人关系的恶劣，林立衡怀疑自己是否是叶群亲生的也完全可以理解了。林立衡对叶群的行为不满，就去林彪那里打小报告。叶群察觉之后，又是拳头和脚侍候，并且限制她和林彪见面。林立衡不喊叶群叫妈妈，而是“主任”；叶群更有个性，叫林立衡“豆老爷”。

就在叶群对林立衡很无奈之际，项辉方再一次出手，介绍了张清林。

张清林生于一九四二年，年长林立衡两岁。他的老爸是铁匠（政治过关），相貌也不错，医学院毕业之后去了广东野战医院担任外科大夫，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林立衡呢，在爱情拉锯战中感到疲惫了，也就同意了。如此一来，终于各方面达成妥协。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号，在叶群的亲自主持，吴法宪等人的见证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如果这个故事仅仅如此，仅仅是儿女情长，也没啥好说的，然而很遗憾，牵扯到政治。林立衡和张清林两个人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后，以后一直患难与共，也算是一段佳话。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政治，但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很不幸地成了那段迷雾般的政治风暴中的点缀。

在九一三之前的那场较量中，毛泽东可以肆无忌惮地玩阳谋，林彪只能通过林立果搞阴谋。玩阳谋的毛泽东可以遍地设局，占尽主动，而玩阴谋的林彪只能处处掩饰：看似消极无为，没有任何动静。掩饰的巅峰就是林立衡的订婚仪式。

九月六号，林彪写下“手令”的两天之前，叶群打电话让林立衡和张清林去北戴河。林立衡本

来就对叶群不爽，于是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去。叶群拿出绝招，说：你爸快要病死了。

林立衡和叶群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仇恨，对林彪则绝对只有尊重、敬爱。一听到林彪生病，立马拉着张清林去北戴河了，时间是九月七号，也就是林彪写下“手令”的前一天。其实林彪还是之前的那个样子，“病情”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严重。把林立衡叫去北戴河，实际是整个林家的决定。九月六号，林彪通过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的南巡谈话。他已经明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么甘心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要么果断出击。既然出击，决不能把宝贝女儿放在外面。

林立衡到了北戴河之后，林立果拉着她做思想工作：“首长（林彪）身体那么弱，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并表示，“情况很紧，主任昨晚（九月六号）提出要到国外。”林立衡表态哪儿也不去。她还给张清林说，如果他回不来，就去报告。但叶群却在办公室里面哭着对张清林说：“豆豆过去受了很大的刺激，经常精神不正常，你在她身边你多关心她。”

在接下来的几天，林立果去了北京西郊那个秘密根据地，前后搞出来好几个方案，还没来得及实施，毛泽东就回北京收网了。与此同时，林立衡和张清林一起研究对策。

当林家得知毛泽东回了北京之后，最后时刻来了。留下来，绝对没有好果子吃。走，往哪儿走，也是个问题，那个问题直到最后时刻才能决定。但是不管去哪里，都需要把核心人物召集在一起，且不被关注。以林家的显赫，要做到那一点并不容易，所以必须有一颗漂亮的烟雾弹。不管是战场还是谈判桌，烟雾弹都是必备的把戏。林家的烟雾弹就是林立衡的订婚仪式。那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林立衡订婚，林立果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妹妹的订婚仪式。

尽管林立衡本人不同意，但把整个事件联起来看，那个订婚仪式应该是之前就谋划好的，就是一颗准备在关键时刻使用的烟雾弹。但是林家却没有想到，那颗烟雾弹里装的是真火药，没有迷惑到对手，反而炸到了自己。谈那颗炸弹之前，先说说叶群和林彪的密谋。

（二）密室之中

密室，是悬案频发的地方。千年之前，雄才大略的赵氏兄弟在密室之中上演了一场千古悬案，“烛光斧影”之谜一直困扰着今天的观众。九一三前夜，林家密室的一席谈话，也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吸引力的谜团之一。

一九四三年，林彪从苏联回国后，忘记了等待孙维世的承诺，和叶群结为夫妻。第二年有了林立衡。又过一年，有了林立果。四口之家，看起来很不错。此后二十八年，夫妻两人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像平常人家的夫妻关系一样。

尽管如此，两人的性格差别很大。林彪喜欢安静，绝对不愿意多事；叶群的性格则是喜欢出风

头，这点她和林彪前妻张梅很像，不同的是，她比张梅更细腻一点。所以林彪能和怀孕中的张梅分手，和叶群则磨合下去。

日后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林彪对叶群的依赖越来越强，大事小事都要叶群办。到啥程度呢？张宁有过回忆：林彪见到未来儿媳妇，本来很愉快。然而叶群跑去捣乱，她把脑袋趴到林彪的怀里，拍拍他的胸口，说什么睡觉好不好啊、吃得好不好啊、感觉怎么样啊，吧啦吧啦一阵子，把林彪那点可怜的好心情全部破坏了。张宁就觉得很奇怪。

还有更奇怪的：通常情况下一颗花生有两个仁，四瓣。林彪自己不能动手去剥，只能吃别人剥开的。吃了四瓣之后，还想吃。叶群就跑过来说，喜欢吃嘛，喜欢吃就少吃点，吃多了要拉肚子，吧啦吧啦一阵子，又让人把花生米端走，搞得林彪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看见自己心爱的点心被拿走也没有办法。张宁很同情林彪，心想如此纵横天下一辈子的人物，竟然连吃花生米的权力都没有，就顺手剥了四瓣放在林彪的手中。林彪很开心，吃了，笑了，叶群则狠狠瞪了张宁一眼。

从这些事情看，在日常生活中，林彪完全掌控在叶群的手里。日后在所有关于林家的回忆录里，有很多同情林彪的内容，但基本上没有同情叶群的内容。是大家向叶群泼脏水？有这个嫌疑，但不能以此为结论。因为在回忆录中，还有人同情江青的。按照泼脏水的原则，往江青那儿泼脏水似乎更容易。毛泽东不爽江青，可以独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让江青知道或看见。林彪不行，他无法摆脱叶群。即使不爽，最多就是交代警卫处长，不让江青进入他的房间，但是时间有限，因为他的生活离不开叶群，而林彪的悲剧就在这里。

正因如此，九一三之后的几十年，林立衡一直致力于为林彪翻案。

在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他们有过无数次的闲谈，有过无数次的筹划，从来没有哪一次如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号晚上那般致命。晚饭之前，林彪和叶群为林立衡和张清林举办订婚礼。叶群牵着两个年轻人的手对林彪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又把李文普叫到客厅去，给四个人照一张全家福（林立果当时还没有回到北戴河）。然后又让林立衡和张清林接吻，拍照，和工作人员一起拍照。然后吃饭，放电影，其乐融融的样子。

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还整那些干嘛？答案是，那都是整个烟雾弹的核心部分。俗话说，像不像三分样。毛泽东能制造烟雾弹，林彪也能搞。毛泽东在上海那招“金蝉脱壳”就玩得很漂亮嘛，林彪当然也可以使出那个招式。订婚的过程越是顺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因为会有人把这些事传递到中央的。间谍么？八四三一警卫部队就可以代劳。

八点钟以后，叶群把林彪的内勤人员叫出去看电影，自己和林彪密谈。九点左右，林立衡到达

北戴河，进入林彪的卧室。

那天，叶群、林立果和林彪说了啥？具体内容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的时刻，越是没有秘密。因为那样的时刻，不用亲身经历都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天晚上，叶群肯定不会和林彪唠家常，那些琐事是无法让林彪牺牲睡眠时间的，当然她也许会顺带关心一下林彪的身体，接下来就是要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三层意思——不同时刻，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意思可以延伸到中共九大，那时候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刚刚被写入党章，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如何上位。一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他都在想办法依靠正常的途径上位，一直到庐山会议上使出漂亮的闪击战。但从批判陈伯达开始，这条途径就走不下去了。

按照《纪要》的精神，正常途径不行，那就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政变，争取夺取全国政权，或者武装割据。林立果折腾了半年时间，到九月十二号，毛泽东低调离开南方，高调返回北京城而宣告失败。这是第二层含义。

九月六号，当丁盛在广州召开两千人大会时，就意味着《纪要》里说的一切都落空。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它是林家三人组谈话的主题。

剥开这世界的纷繁面纱，繁华落尽，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生存问题。

毛泽东南巡，跑了大半个中国，到处讲党内历次阶级斗争，意涵由暗变明，指向林彪。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林彪想法也是一样，也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讲阶级斗争，那是要把林彪挪位，让林彪靠边。林彪也谈阶级斗争，但是讲生存。

毛泽东讲，王明、张国焘不安好心，又讲彭德怀、刘少奇路线走错了，这次说林彪犯了错误，准备让他步各位先行者的后尘。

在林彪看来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既然已经斗争失败，那就要承担结局。结局有两种：像王明和张国焘那样的失败者，去了国外；或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失败者，留在国内。

一九七一年的王明还在莫斯科不遗余力地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一九七一年的张国焘正在加拿大写字。两个人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紧巴巴的，至少还活着。一九七一年的刘少奇已经秘密地死去，骨灰盒上面是另外一个名字；一九七一年的彭德怀虽然还活着，却已经生不如死。

所以从生存的角度讲，并不难选择。正如杭州的陈励耘和上海的王维国不愿意行动一样，都是生存问题。很简单，人性嘛，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在九月十二号晚上，林家三口在林彪卧室里讨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走出去，先求生；或

者留下来承受无休止的批判。以林彪当时那种小身板，别说参加批斗大会，拉到外面晒半天太阳基本上就歇菜了。

从活命的角度上讲，既然政治斗争失败，为了保住性命出走，可以理解，但是他的目的地却是如此地致命。因为他的目的不仅仅为了性命，还要报复那个人——那个给他人生机会，让他叱咤风云又让他一无所有的人，那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三）选择是如此残酷

既然要走，总该有个目的地。

当时是两级世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霸占一大片地方斗牛：苏联的华约集团控制着欧亚大陆；美国的北约集团控制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两家巨头的关系都很僵，国际生存环境极为糟糕，除了朝鲜和巴基斯坦之外，周围整个一圈都是敌人。

只要走出中国大陆，都会有人接纳林副统帅。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南亚一大堆小国家，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北方则是苏联的利益所在，印度则是苏美共同的扶持对象。要走，要么去苏联的势力范围，要么去美国的势力范围。

很显然林彪放弃了美国。从当时的世界大格局来看，中苏对抗无法挽回，中美正在和解。

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为了化解苏联的巨大压力，决心和中国和解。那时候中共召开九大，林彪成为接班人。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第三次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国内正在批判陈伯达，尼克松让即将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带信：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做出回应：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的照片上多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斯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号，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一个照会：“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四月二十八号，尼克松交给基辛格去中国秘密访问的任务。七月八号，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抵达北京，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南巡。

那种情况下，林彪不可能往美国的势力范围去——没有任何好处。当然，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还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林彪，就是台湾。台湾有风烛残年的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国共双方还在对峙，有点和解的念头，但只要毛泽东和蒋介石还在，和解可能性不大。台湾的蒋介石和大陆的毛泽东都要代表中国。虽然毛泽东赢得了大陆，蒋介石并不服气，想尽一切办法赢得筹码，他还在为了很多黄埔学生在战场上投降

共产党耿耿于怀。如果林彪去台湾，蒋介石必然精神一震，会敞开怀抱欢迎的，长出一口气：总算赢了毛泽东一把。

海峡两岸虽然敌视，却很难打起来。大陆这边，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除了没有办法渡过台湾海峡，也没有心思打过去。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当了十几年的司令，也没有得到机会打台湾。台湾想反攻大陆，没有那个实力。美国正寻求和大陆和解，更不会支持台湾了。

如果林彪去台湾，对大陆的伤害并不大。但是林彪根本没有考虑过台湾，原因有两个：一，基辛格访华，重点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和基辛格东拉西扯两天之后达成共识：台湾属于中国，美国不再和中国为敌，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所谓人往高处走，那种情况下去台湾，相当于往低处走。

第二个原因是潜在的，或许更为重要的，就是林彪对蒋校长的追随者在战场上的表现过于深刻了吧。往那里去，相当于曾经战场上的胜利者寻求失败者的庇护。普通人都难以拉下面子，何况孤傲的林彪。如果那一幕真的发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如杜聿明等人在大陆这边，毛泽东曾经最信赖的统帅却跑到对面的蒋介石那边，也太喜庆了。

尽管如此，林彪依然可以去美国的势力范围。只是在中美和解的大势之下，他的身份地位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林彪仅仅为了活下去，到美国势力范围的地方隐居下去，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林彪总归是林彪，即使外表沉默寡言，内心依然孤傲；即使身体已经很差，内心依然有决绝的意志。原因无他，那是一个纵横天下几十年的英豪应有的品质。

在林彪的一生中，毛泽东曾经扮演过多种角色：领导、父兄、知音。

领导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刻意提拔、重点培养，给林彪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让林彪的天赋得以充分发挥。

父兄的一面：毛泽东年长林彪十几岁，对林彪曾经像儿子一样关怀和包容。毛泽东在林彪身上付出的心血，多于任何一个孩子。在林彪提出不同意见时，又可以如兄长一般循循善诱。即使在会理会议上，林彪建议刚刚出山的毛泽东放弃枪杆子，毛泽东也只是说，你个娃娃懂啥哟。

知音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可以让他的军事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那些策略根本无法逃过毛泽东的法眼。正因如此，文革之前，毛泽东对林彪的政治意图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写给江青的信中就流露出那样的心思。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看明白了林彪的意图，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对林彪穷追猛打。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当初的伙伴、盟友、战友转变为政敌。毛泽东想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继续扫除所谓的既得利益阶层，而林彪必须为新兴利益集团牟利，双方矛盾已经

不可调和。

既然是敌人，那就要你死我活。你逼我上绝路，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就这样两个曾经在绝路上徘徊无数次的男人开始决斗，只能有一方胜利，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

同样的戏码之前已经上演过好几次了，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失败的一方，这一次轮到林彪再一次进入绝地。绝地反击的机会在北方，也就是苏联那边。

中苏之间的恩怨情仇，足够拍摄一部长长的连续剧。早在苏联诞生之前，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就纠缠不清。苏联原本是共产国际的所在地，领导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原本是共产国际的分支。苏共就是共产国际实际意义上的老大。中共跟在苏共后面混，得过不少帮助，也受过不少委屈。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之后，中共慢开始慢独立。建国之后，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给过中国很多帮助。特别是建国前十年，苏联在支持中国建设方面的力度是罕见的。然而那种蜜月期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论战和对抗，大有不死不休之势。

中苏对峙的那段时间，双方在边境以及外蒙古周围大规模驻兵，中间的小规模摩擦从未间断，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如果那种级别的战争爆发，将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结合体：规模上类似抗日战争，强度上和抗美援朝一个当量。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将是亚欧大陆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必然打到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必然是黑云压日。而且当时双方都有原子弹。很可能爆发核战。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国家和民族将会面临生死考验。谁都不想那样的战争，但是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好在历史老人是慈祥的，没有让那种不幸的情况发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这边的统帅就是林彪。如果战争爆发，统帅只能是林彪。抗美援朝的时候还有不少选择。九一三之前，军队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那种情况换成别人（如粟裕）恐怕也不好办。

林彪担任副统帅期间，虽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上，但坐在二把手的位置上，中国军队和中国的一切对林彪来说都没有秘密。如果林彪去了苏联，那么原本在中苏对抗之中就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军队将进一步变成毫无秘密和抵抗力而言的一张白纸。

很显然，如果林彪要伤害曾经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代表的共和国，去苏联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去苏联，才能使他的能量和利益最大化。

林彪和当时隐居在苏联的王明不一样。王明是一介书生，从来就是打嘴炮的。中苏论战或许还

能用得上，其他实际用途不大。林彪则不同，战场上出来的，可以有很大的作用。

三十多年前，林彪还很年轻的时候，当时苏德战争还没有爆发。酒会上，斯大林询问他的高级将领们，让他们判断德军的前途。苏军高层判断：德军会在马其诺防线之前被拖住。——那是一个符合常理的判断。因为法军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经营马其诺防线多年，看起来很靠谱。不仅苏军，英法主流的看法也是如此。

当时林彪也在场，斯大林请林彪发表看法。林彪按照中国人的特色谦虚一番，表示不清楚希特勒的真实想法。斯大林决定进一步试探：“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林彪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很高明。但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正面攻击，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但是不能不提防希特勒会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

当时苏军同行对林彪的看法不以为然。几个月之后，德军的装甲部队从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插入法国的腹地，法国很快完蛋。斯大林和苏军统帅对林彪印象深刻。

如果林彪去苏联，就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苏联为了摸清中国这边的底细，必然给他高规格的待遇，至少要比王明强。他可以选择和苏联人合作，也可以选择模棱两可的态度来糊弄，如当年李凌在匈奴。不论如何，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威慑中国那位伟大的战友。

（四）小人物的选择

历史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不重要的人物有时候也可以影响局势的走向。比方说九月十二号晚上的林立衡，就做了一个影响历史走势的选择。如果没有她的通风报信，或许林彪可以更从容一些，比方说等飞机加满油再走，历史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林立衡为啥去报信呢？凭什么就认定叶群和林立果劫持林彪呢？

由于林家内部的关系错综复杂，造就了复杂的林立衡。林立衡对叶群感情冷漠，对林彪却感情极深，而且很复杂。

叶群虐待林立衡，而林彪拿她当宝贝。林立衡怀疑是否为叶群亲生，对林彪却从无半点怨言。林彪死后几十年，林立衡不辞劳苦，一直试图给他恢复名誉。

叶群想控制林立衡，控制她的婚姻。而林彪从不那样做，并且主张孩子们的婚姻自己做主，不要去影响他们。林彪曾说过，两个孩子犹如他的眼珠子。对林立衡他是关爱的，一段时间见不到，就会询问一下情况。有句话，女儿是父亲的软肋。

林立衡除了一般女孩对父亲的感情之外，对林彪至少还有更复杂的感情。

第一，对英雄的崇拜。这点毋庸置疑：林彪是个英雄。从井冈山开始，到抗战，到解放战争，

林彪的形象都是高大光辉的，赫赫功绩摆在那里。当年在苏联，一帮留学生对林彪的好感就来自于英雄的传说。加上后期的宣传，更是了不得。林立衡生于解放前，成长于解放后，正是林彪声望日隆的年代，对英雄的父亲崇拜有加是自然而然的。

第二，母性情节。女人的天性中就有伟大善良的部分，那就是照顾父母和养育子女。照顾父母，回报养育之恩。照顾子女，对生命延续的期望。当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照顾下去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林立衡和林彪在这方面的感情又更复杂了。

林彪的日常生活有困难，林立衡却没法照顾他。因为林彪的日常生活控制在叶群的手里。偏偏林立衡和叶群之间长时间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特别是九一三之前的一段时间，叶群剥夺了林立衡看望林彪的权力。而偏偏，林立衡特别崇拜英雄的父亲。

在林立衡的心中就造成这样一个观念：英雄的父亲落在恶魔的母亲手中，无力挣扎，无力逃脱。恶魔一样的母亲正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将要毁掉英雄的父亲，所以她自己无论如何也得阻止这场正在上演的悲剧。

那么林立衡为啥不相信林彪是清醒的呢？答案可从理智和感情两方面来给出。

理智方面：建国后教育出来的那一代人，爱国主义精神极浓厚。不论是谁，只要牵扯到“里通外国”这顶帽子，立马臭狗屎，哪怕那个人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原因很简单，新中国建立相当不容易。

感情方面：林彪是自己的父亲，有谁会相信自己的父亲逃到外国去呢？特别是父亲又是个大英雄，身居高位的时候。普通人叛国，可以解释为卑微的灵魂受到诱惑，英雄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而且林立衡和林立果不一样，终究是个女孩子，幻想的更多一点，对于政治的残酷性理解更少。而林立果的计划和林彪的手令，林立衡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事发突然，林立衡只想阻止悲剧发生而已。

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林立衡的反应未免过于“天真”。林立衡虽然没有参与事情的核心活动，却感到五十六号楼（林家在北戴河的住所）的反常。下面是两个当事人——李文普和张宁提供的两个版本。

从后来事情进程上看，林立衡的反应未免过于“天真”。林立衡虽然没有参与事情的核心机会，却感到五十六号楼（林家北戴河住所）反常。下面是两个当事人：李文普和张宁提供的两个版本。

李文普版本：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在阳台上找到警卫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很惊诧，但也惊诧而已，因为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畴。他知道林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不可能听信林立衡一面之词。他要证据，但林立衡没有证据。

李文普认为，只要林立衡向林彪说明情况，林彪一句话，一切都是浮云。

晚上就是订婚仪式，放电影。林彪和叶群在卧室里密谈。林立衡跑去偷听，结果当然是很严重。当时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把他叫到小厕所里，再次讲了同样的话。李文普还是同样的反应：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之后林立衡带着杨森去八四三一部队报告，然后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

张宁版本：

林立衡在九月十二号下午找林办的主要工作人员秘密开会：保护林彪。人员包括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李文普），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大家疑惑地看着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要找出谁是说谎者。

林立衡当时向这四个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叮嘱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的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两个版本有差别，但都是细节上的差别，而整体上一致：就是林立衡向八四三一部队报告。张耀祠回忆：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逃出来，向八四三一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

下面出现一个问题：林立衡为什么没有向林彪报告她的疑虑，而是要亲自“拯救”林彪？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幕，因为如果林彪发话无疑是最有效的。如果林彪的话没用，那么林立衡的话肯定也没用。从这件事情上，林立衡尽显一个年轻女人的“天真”。

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大致可以分析如下：她不能让林彪离开。因为一旦走出那一步，英雄的父亲立马就会被妖魔化为恶魔，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悲剧的发生。她不去向林彪汇报，或许她不敢面对林彪，因为她担心林彪知道一切，认同一切，那么她心中的父亲英雄的形象将会完全破碎。因为在林立衡心中，林彪不仅是父亲，还是英雄。她不想失去父亲，也不想失去那个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存活了很多年的英雄。她要保卫她的父亲，也要保卫她的英雄。至于林彪和毛泽东走向对立的过程，她或许明白，或许不明白，或许不愿明白。

本身就只是一个小人物影响了历史走势的故事。

（五）电话

林立衡报告的时间是九点五十分。

十点二十分，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重复了林立衡的话。张耀祠交代：“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同时把情况反映给汪东兴。同时张耀祠又给张宏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汪东兴立刻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事。周恩来问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说：“可靠。”周恩来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接下来张宏报告：“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听到情况之后，仿佛意识到什么，立刻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专门处理此事。周恩来首先打电话给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没有。”周恩来追问：“究竟有没有？”吴法宪：“绝对没有。”

根据情报，林立果去了山海关，空军司令吴法宪竟然不知道。对吴法宪的回答，周恩来当然不满意，但也没有挑明，交代吴法宪：“再查查。”当时周恩来也不能确定吴法宪是否参与其中，因为吴法宪本身就是林彪的死党，说太多可能打草惊蛇。

吴法宪自然从周恩来的电话里听到了反常，立刻打电话核实，得到的答案：“胡萍副参谋长调三叉戟专机去了山海关。”吴法宪觉得事情不对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告诉他：“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这个解释平时估计能过关，当时绝对忽悠不了吴法宪。如果仅仅是一次改装试飞，根本不会惊动周恩来，所以吴法宪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回答。吴法宪命令：“飞机立马返回北京。”

五分钟之后，胡萍打电话给吴法宪：“飞机在维修。”

——很显然，胡萍在撒谎。

胡萍，生于一九二三年，山东人。他家是民国时期的暴发户，生活条件很不错，受过不错的教育。后来鬼子进村，家道中落，全家转而支持革命党，成为革命据点。

空军建立之后，从陆军中挑选飞行员，二十七岁的胡萍加入空军。胡萍头脑活跃，行动能力强，很快出人头地，成为首长专机飞行员。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去参加万隆会议，飞行员就是胡萍。他的资历和信誉相当的好。一九五七年，胡萍成为毛泽东的专机飞行员。毛泽东基本不坐飞机，那架

飞机就成了二号人物林彪的专机。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已经是副参谋长。但是那个级别还是太小了，够不着接触高层内幕。

他又如何敢对空军司令吴法宪撒谎呢？——因为林立果。林立果进入空军时，吴法宪拍马屁放炮说林立果可以自由行动。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挨批。空军内部分成两派：反对派和支持派。林立果则让周宇驰在空军内部散播消息，说吴法宪表现不怎么样，有鬼。当时一边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边是正在写检讨，可能“有鬼”的吴法宪。胡萍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林立果。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果拿着林彪的“手令”找胡萍要林副主席的专机，没有任何障碍。林立果一定想不到，一家人最后葬送在这专机上。

当胡萍撒谎时，吴法宪并不了解情况，只说飞机修好了飞回北京。吴法宪把情况回馈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

当时的周恩已经不相信吴法宪的话，他直接打电话给叶群。周恩来和叶群究竟说了啥，已经是个谜。要揭开那个谜团已经很难，这里先从侧面描述一下。

根据当时另一个重要人物汪东兴的回忆如下：

晚上十一点二十二分，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看似平常的对话，其实一点都不正常。论地位，当时林彪的地位比周恩来高，国家的二把手，做事自然无需向周恩来汇报。论工作关系，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主持军队工作；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主要管政府的。军内的林彪调用专机无需周恩来过问。既然过问了，那就意味着问题很严重了。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是在暗示什么吗？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

——这应该是暗示了吧。

接下来周总理又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注：这些对话并不是汪东兴亲耳听见的，是周恩来后来告诉汪东兴的。周恩来该告诉汪东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按照汪东兴的结论：叶群听说周恩来要去北戴河，慌了，因为周恩来去北戴河，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所以连夜出走。

——但这个结论是汪东兴的个人观点，并非定论。

林彪是否南下广东跟周恩来是否去北戴河关系不大。周恩来又不是超人，单枪匹马搞定所有事。事实上在政治上，输赢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如何造势。林彪没有南下广东，关键还在于毛泽东南巡把广东军区基本上重新洗牌了一遍。如果广东军区百分百支持林彪，那周恩来孤身去北戴河能起什么作用？当初武汉五二零事件，毛泽东还在呢，还是闹起来了嘛。

在吴法宪的回忆里则是另外一个模样。

吴法宪把胡萍的话转告周恩来之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接下来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看到没有，说电话是叶群打来的。

那么究竟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还是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个问题现在不难回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叶群没有理由打电话给周恩来找事。当时林家放出的空气球是女儿办事。叶群怎么会半夜三更给周恩来打电话？现在关于《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都记载的是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吴法宪的回忆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吴法宪记错了？这种可能性有，不大。因为吴法宪写回忆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他自己和林彪辩解，那么重要的事，出错的概率不大。

那就是第二个可能性，周恩来出错了。出错的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随口说说，口误；另一个可能就是故意的。

如果是故意的，那又是为了啥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稳住吴法宪。

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林彪的各种行为和可能性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吴法宪和林彪的关系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的。当林彪可能选择铤而走险时，没有谁能保证吴法宪就没有涉及到。

面对突发情况，周恩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努力稳住局面。之前关于飞机的对话中，吴法宪的说法和周恩来了解到的情况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更不可能相信吴法宪。为了稳住吴法宪。周恩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如果他说主动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必然引起吴法宪的疑心。因为林家当晚在给女儿办喜事，周恩来要祝贺也是之前的事，没有理由深更半夜打电话。

在整个九一三事件前后，周恩来的作用远不止打电话这么简单，他几乎和毛泽东同样重要。这是后话，我们会在《周恩来篇》慢慢分析。

周恩来打了电话之后，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吴法宪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吴法宪告诉叶群：“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完毕，吴法宪立刻把通话的内容报告周恩来。

——此时的吴法宪已经完全倒向周恩来。

林彪的顾虑是对的：能信任的人只有林立果一个。

（六）离别伤

九月十二号十一点四十分，大红旗轿车匆忙驶出五十六号楼，车上没有林立衡和张清林。按照计划，是要带着他们一起出走的，但是林立衡打完报告之后不敢回去。周恩来的电话打乱了叶群的计划。

车子刚开不久，李文普找借口下车退场。随后车子孤零零地驶向三海关。北戴河，别了。

建国之后，北戴河就是林彪经常疗养度假的地方之一，前前后后也有二十多年的时光，曾经多次住过的小楼，还有那些花花草草，应该有感情了吧？

但是此刻他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李文普在那一瞬间改变了主意，大叫一声“停车”，司机并没有停车。李文普（坐在副驾驶上）趁车子放慢的一瞬间跳车而下。刚刚出发就遭遇“背叛”，不祥之兆啊！

对林彪而言，李文普非常重要。很多年了，林彪杂七杂八的事都由李文普来处理，感情自不必多言。当他想着“叛逃”的出走带给毛泽东的影响时，首先体验到了“叛逃”的滋味。车上的林彪会不会也在叹息：由他去吧。

八四三一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看见李文普跳车而出，决定跟上去。但是林彪的大红旗轿车性能极佳，一溜烟奔向三海关机场。

北戴河离秦皇岛市将近二十公里。穿过秦皇岛到山海关机场，三十公里左右。一共五十公里的路程，按照现在的路况，正常情况下开车半小时。当时路况差很多，考虑到林彪等人赶路心切，估计也就半个小时的样子。

九月十四号凌时二十二分，大红旗轿车进入山海关机场，直奔二五六号专机而去。

山海关，万里长城的起点，号称天下第一关。帝国时代，在牧民和农民南北千年对抗的时候，山海关以南归农民，北面任由马背上的牧民纵马奔腾。

林彪对山海关也有独特的回忆。想当年偷偷出关黑土地修炼，数年后磨剑归来，带着四野百万雄师入关，进华北，过华中，压中南，止步于天涯海角，气吞万里如虎。林帅威名由白山黑水之间传到海南热带雨林。

三十年之后，弹指一挥间，竟然孤身携全家（其实不全）仓皇出逃，没有辞别家乡父老，没有和朋友告别，茫茫前路，天涯孤旅。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离开时是带病之身。

然而他仍然没心思体会那一切。他身边那个自作聪明的婆娘已经跳下车，正高声嚷嚷：“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他那曾经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仿佛也失去了分寸，挥舞手枪高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一个自作聪明的婆娘，一个鲁莽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一个天真冲动的女儿，神奇的一家人啊，毁掉了一个天才的统帅。

林彪跟在叶群身后爬上飞机，匆匆而去，甚至没来得及站在旋梯上回望故土一眼。

九月十三号凌晨三十二分，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上的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飞机上一共九个人，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之外，还有当时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机长兼驾驶员潘景寅、专职司机杨振刚、机组空勤特设师邵起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

飞机开始向西飞一段，然后转弯向北，经过东北黑土地的上空，往中蒙边境飞去。曾几何时，

那里是马背民族的发源地，无数草原雄豪角力的地方。南方农民每一次深入到哪里，都牵扯到巨大的历史变更。那里曾经被称为龙兴之地，不仅是对当年的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而言，对共产党也一样。中共拿下东北，才真正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林彪就是那些东北的诸多将士中关键的一位，那里也是林彪的“龙兴之地”。

当年在东北黑土地，他有过惨痛的失败，有过苦涩的记忆，都挺了过去。然后他让黑土地成了国军将帅们集体的“滑铁卢”。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他们都有各自的辉煌和历史定位，但是都栽在了东北。还有廖耀湘、范汉杰他们，也是一时之雄杰，也栽了。好吧，还漏掉两个，孙立人与陈明仁，他们因为国军的派系斗争而躲过了在东北跌倒的命运。

想到这些，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有什么办法呢，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枯掉的万骨之中，不仅包括“主义”和“理念”不同的国军同胞，还有数以万计的共军同志。他们当年为了胜利而葬身在黑土地上，特别是四平附近，很多情同手足的兄弟们埋在了这里。

嘴角之外的其它地方，在那一丝隐隐笑意的别处，则是无尽的悲凉。那战死的同胞还能魂归故乡。失败者如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不论如何尚能在故国生存，而作为胜利者的自己却要从此亡命天涯，再也无法在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呼吸。

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也不太明白。

他的思维再次往前延伸到，延伸到平型关，对付日本人，在那里他看到鬼子的顽强。

再往前，那是长征之中惨痛的记忆。长征在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凤凰涅槃，但是在林彪的记忆中却灰暗很多。一开始的磨磨唧唧。湘江岸边，血流成河。尽管在大渡河畔赢得胜利，终于逃出包围圈，但是到陕北时，他的红一军团损失殆尽。那些同志，那些手足，那些兄弟因为不同的“主义”和“理念”而死在国军同胞之手。在他那沉默的内心中，常常为此叹息，但现在释然了。他们不管活着还是死了，尚能在故国，而他自己却要远走他乡。

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的祖先曾经在这里生存，我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付出所有。我曾经负伤，曾经流血，但没有退缩，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看着兄弟们倒下，血流在大地上，我没有畏惧，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让对手身败名裂，甚至献出生命，我没有后悔，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可以让土地上的人活得更好，最后，我自己却被迫离开。我不会流眼泪，因为我看过太多的鲜血和白骨。我知道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很悲伤，因为我要离开，离开故土，从此亡命天涯。

别了，昔日的一幕幕。纵然千般不舍，也要撒手而去，因为他是林彪，因为林彪的性格和方式。

（七）行为和性格

在那一幕幕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那人就是毛泽东，曾经的领导、知音、导师、父兄一样的人，如今如同一座大山一般横在前方，逼迫他离开故土故国。

想到毛泽东，林彪五味陈杂。

往日的一切都因为他：上井冈山，因为他在那里；被迫长征，因为他不在；绝处逢生，因为他又出现了。和他曾经是战友，如今又成了对手。

孙悟空耍了一个跟斗云，狂飞十万八千里，看尽天上地下的颜色，走到路的尽头，发现仍然在如来的手掌中转圈圈。虽然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但输在如来的手中，不丢人，因为如来从来都没败过。

在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如同如来一样的存在，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特别是建国之后，所有失败者或者未曾失败的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文如刘少奇，武如彭德怀，没有人能幸免。只有两个人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一个是自杀的高岗，另一个就是出走的林彪。

高岗自杀，是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误以为没了出路，一死了之。林彪自杀，是看了太多政治斗争之后，看不见苟活（他不愿意）的希望，选择破土而出。

纵观林彪的行为和性格，其实出走也不意外。

性格上看，林彪倔强、谨慎、敏感、多疑。

林彪沉默寡言，但性格中最基本的成分还是倔强。从军几十年，光荣的时刻很多，但灰暗的时刻同样多。比方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憋屈，再比方说初到东北的惨败。那样的时候，压力是巨大的。林彪有犹豫过，但从没动摇过。虽然上面有领导，解决问题却要靠他自己。

林彪非常谨慎，战场上，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去冒险出击。政治上也是选择最稳妥的方式，紧跟在毛泽东身后，攫取最大的利益。

很少有人注意到林彪的敏感。沉默寡言之人，多半内心世界丰富多彩，多半是敏感的，林彪也一样。其实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比方说当年叶群生孩子，让林彪去弄点奶粉，林彪就是不去弄，不想拉关系。

最后一点是，多疑。正是这一点害了他。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消极抵抗的策略是对的。

因为他已经和毛泽东紧紧连在一起，如果他就那样不声不响地呆着，毛泽东很难拿他怎么样。毛泽东批判了陈伯达，断了他正常升迁的道路。毛泽东改组了军委办事组和南巡，瓦解了他在军方的势力。然后怎么办？很难怎么办。因为毛泽东如果继续文革，军方招牌还需要用林彪。

性格决定行为：林彪的那些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林彪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

回顾一下林彪的一生，从黄埔军校对蒋介石开始，蒋介石让他等一等。林彪没有等，直接去共军那里了。

战场上，更没有一个对手能摸到林彪的套路。不仅对手不能。甚至连领袖都不能。比方说平型关战役，林彪并不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办事。至于四平撤退，更是先斩后奏。那些时候，林彪面对的仅仅是困境而已。

九一三事变之前，因为林立果太嫩，林彪实际上已经陷入绝境。困境中的林彪尚且做出惊人之举，绝境中的林彪会束手待毙么？当然不会。所以他用一种毛泽东也想不到的方式给予回击。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里通外国的帽子卖了一大堆，高岗、彭德怀等人都是买主。大家都明白，都是莫须有，没有谁会闲着没事往苏联那边跑。建国之后那么久，有个别人“跑”去台湾，但是从来没有跑到苏联去。

苏联那边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吃喝拉撒睡完全不对路，还要身败名裂，顶着叛国者的头衔遗臭万年，谁愿意啊。毛泽东完全没想到林彪会跑，更没想到会往北方跑。

评，林彪的一生，就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生。

既然林彪往北面跑，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这一切？

几十年以来，历史教科书上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叛国和反革命。

（八）一笔帐：叛国还是逃亡

现在来看，革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听起来有点扯。但是长期以来，反革命，一直是一项重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予以废除。

要说革命战争年代，正与反事关生死，反革命重罪，可以理解。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为了政权稳固，反革命罪也可以延伸一段时间。

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反革命就不适用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头顶反革命罪帽子的人太多了，一大批老干部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最后都被平反了。关于林彪，战争年代的赫赫战功是不容置疑的。建国后的十年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也就是从五九年开始走向前台。要说错，主要的错也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紧紧追随毛泽东而已，最后又和毛泽东决裂了。

反革命，反谁的革命？要说和毛泽东决裂就是反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被否定了。如果说之前跟随毛泽东走就是反革命，也说不过去，因为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人的旗帜都是毛泽东。

所以现在能讲得通的，也就是叛国。

从法理上讲，某人叛国，他（她）的行为对祖国不忠，协助外国政府推翻或严重侵害祖国，或怂恿外国对祖国宣战。从行为上讲，应该有损害祖国的行为举止。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组织或国家可以容忍叛徒。当今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叛国，也是少有的可以坐上电椅的几种行为之一。

但是理论归理论，在不同时期不一样的。在不同时期完全不一样：在家天下的时代，比叛国罪更严重的是行刺最高领导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虽然名义上进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只是意识觉醒，国人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所以才会搞出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会有“毛主席万岁”漫天响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行刺毛泽东未遂，行为并不比叛国轻。

这里看看林彪的行为。林彪是中国的军队统帅，知道全部军事秘密。苏联是敌国，他的举动自然有损国家利益。但是因为在温都尔汗坠机，后来的事情没法判断。

如果没有坠机事件，那么很简单，看他之后的选择是否有损国家利益就行了。如果他干了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叛国者。如果他没有干有损国家利益的事，那么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可略去叛国者，而用逃亡者代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前车之鉴。

第一个大叛徒是周佛海。此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和蒋介石同龄，湖南人，曾国藩的“私塾弟子”，早年留学日本，非常积极，一九二零年参加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周佛海为代理书记，地位相当之高。这样一位中共元老，最后竟然觉得共产党没希望，叛党，跟着国民党混了。如果仅仅是叛党，也就算了，日后竟然跟着汪精卫去当汉奸，标准的叛国者。

第二个就是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犯了战略性错误之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由于看不见胜利的希望，一咬牙跟着国民党去了。张国焘虽然日子过得不如意，但是比起周佛海，他终究只是个叛党者，和叛国者还有一道鸿沟。

第三个应该算王明。王明也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一九五六年去了苏联之后，不再回来。因为按照王明的历史，如果回到国内，在日后的阶级斗争中会死得很难看。王明留在莫斯科，用笔给毛

泽东和新中国添乱。但是后人对王明并无太多责难，因为他只是个逃亡者。

以林彪的地位而言，如果他到了苏联，既可以像周佛海那样，为敌国积极谋划，干损害祖国的事，甘当一个下贱的叛国者，也可以如王明那般，做一个逃亡者。王明之所以是一个逃亡者，那是因为他没有能耐为苏联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林彪不同，他了解全部军事机密。那么林彪会如何选择呢？因为温都尔汗事件，成为一个千古谜案。

因为是迷案，也只能从外围寻找蛛丝马迹了。

（九）温都尔汗

关于温都尔汗事件，把所有说法归纳起来可以写一本书，但没必要一一罗列，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两个版本可以介绍一下。

版本之一：其实温都尔汗那九具尸体根本没有林彪的。林彪在哪里呢？已经被秘密杀掉了。其中有本书专门写这个的，而且写得有板有眼。但是除了那本书自说自话外，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这个说法。那本书仅在海外流传，漏洞一大堆，但因为内容过于离奇，还是能吸引一帮猎奇者的。

版本之二：其实温都尔汗那九具尸体根本没有林彪的。林彪在哪里呢？并没有被杀掉，而是被关起来了，或者说退隐了，反正就是神秘消失了。不过没有死掉而已。至于那架飞机，本身就是一个局。这种说法可以让一部分人从感情上接受，在现实世界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对林彪很有感情的。

飞机越过边境之后就从中方的雷达上消失了，就没了消息。再有消息时已经是在温都尔汗坠毁。这样就给人这样的错觉：离开边境一直往前，燃料不足，坠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关于实际情况，共军专家组有一份相对详细的报告。我认为报告有两个特点：第一，接近真实；第二，里面蕴含着很多信息。

报告的结论否决了两种可能性：空中起火和被击落。

“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比较集中；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散布面就会呈宽、长、散的状况。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飞机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里。第三，若空中起火，飞机的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积焚烧。”

——排除空中起火的可能性。

“从现场照片和残骸分布的情况看，该机开始接地是完整地进行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烧，因此，不可能是被击落的。机翼上那个大洞，是油箱从里面燃烧爆

炸形成的。”

——排除了被击落的可能性。

报告论证如下：

“‘三叉戟’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依据是，第一，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现场全貌照片表明，着陆场正前方是山丘地带，着陆方向的左侧是山区，而着陆场是一片草地，降落条件比较好；着陆方向由北而南，而其逃窜的飞行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说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对着陆地点和着陆方向进行了选择。第二，飞行员做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从机翼残骸照片上清楚看出打开了前开缝翼(按：在机翼前缘呈长条形，可向前推开)，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摔打撞碰都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第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说明没有放起落架，这是野外有操纵地降落的一个特点。第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现场地面滑痕是飞机尾部接地时的痕迹(在视察飞机坠毁现场时，双方都认为那是飞机肚皮擦地的滑痕，滑痕右边的浅沟，是右翼撞地造成的；后来，我仔细检查了残骸照片发现，带有“中国”二字的右翼尖并无卷曲，而机尾右水平舵尖有明显卷曲)；机上先掉下的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也说明尾部先着地。地面仅有滑痕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为什么降落没有成功？首先，降落的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大。减速板(在机翼表面后缘横排两块，飞机减速时，底下有支架将板面从后向前撑起)没打开，减小速度的反推力装置(在发动机内腔)也没有使用，造成飞机的接地速度过大。打开减速板和使用反推力装置，在正常情况下降落，应是副驾驶员做的，而这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员。其次，从照片和现场步测示意图上看，飞机残骸散布面积为750米×80米的狭长形状，飞机破坏严重。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再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不利于野外降落。由于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因而在不放起落架着陆时，形成机腹和机翼同时接地，极易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从残骸照片和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地处仅二百米，就是说整个左翼是在落地后一百八十米范围内就已折断。降落场地虽是草原，地面仍然是不平坦的，这也是造成飞机撞击，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为什么要野外降落？一是油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不得已降落的可能性极大。从山海关起飞时，油箱存油十二点五吨。从山海关至坠毁地点，共飞行约一百一十八分钟，飞行高度从二

千五百米到六千五百米，航程约一千零八十公里。根据飞行实践经验，在三千至四千米高度飞行，每小时耗油量为五吨左右。从‘三叉戟’的飞行高度和全航程估算，耗油量要九点五吨至十吨。因此，飞机到坠毁地点时，存油量只有二点五吨左右，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所以，这架飞机要在低空继续飞行，最多只能飞二十多分钟。这可能是急于野外着陆的主要原因。二是飞行员在空中没有掌握飞机的精确位置。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明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该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六十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有一机场，如果驾驶员知道自己的位置，去该机场降落的油是够的。因此，不明自己的精确位置，可能也是促使其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的原因之一。”

——关于温都尔汗事件的基本信息都在里面了。

——根据各方面的信息，林彪确实在飞机上。温都尔汗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各方面相对靠谱一点的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这份报告告诉了很多一般让人难以察觉的事实。看看最后一段：飞机之所以野外冒险迫降，是因为油料不够。

根据报告，飞机坠毁时油箱了的油还可以飞二十分钟。飞机坠毁处直线距离向北六十公里处，就是温都尔汗机场。

当时飞机的速度大约每小时六百公里。六十公里，也就六分钟左右的时间。

如果说林彪逃亡，和苏联有联络的话，理应有接应。因为蒙古是苏联的附庸国，中苏冲突之际，蒙古完全在苏军的笼罩范围之内。如果苏联接应，断不会坠机。

不要以为低空飞行就能逃过苏军的耳目（雷达）。要知道飞机从中国境内消失时，雷达都有显示——而且苏联当时比中国先进许多。

这样又出现一个谜团：既然飞机逃不过苏联的监视，如果没有接触，那么苏蒙怎么会任它转悠？如果有接触，怎么会任它坠毁？

好吧，实际情况是，苏联人看见了它，既没有发现它的威胁，也不知道它的目的性。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苏联人不知道林彪出走的事。

不仅如此，苏联官员还提供了以下证词：“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蒙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

——向西和向北都是正常的，唯独向南很诡异。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颇有市场的说法：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的——林立衡就是这么认为的。

林立衡认为，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绑架的。由于那个说法漏洞太多，劫持论者发展了林立衡的说法：骗。

此话怎讲呢？具体就是说，林立果和叶群告诉林彪要去广州或香港。飞到半路上，林彪发现不对路，命令飞机调头南返，结果在温都尔汗坠落。

实际上这个说法也不靠谱。因为对叶群和林立果来说，能跑掉就是万事大吉。至于往哪里跑并不重要，苏联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也没啥吸引力。

当然，还有人指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林彪北上之后后悔了，想南返中国，想当苏武（终于归汉）而不愿当李陵（在匈奴郁郁而终）。——至于林彪怎么想，已经无从知晓。

不论哪一种情况似乎都隐藏一个事实：林彪和苏联人事前并无串通。

——林彪出走苏联，并非提前谋划，而是一种仓皇之间的选择。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这个选项。九一三事变之前，林彪也没有类似的动作。

能够证明这个结论的，不是别人，正是四大金刚的行为。按照当时的中苏局势，林彪要想联络苏联，可不像林立果搞小舰队那么简单，必须有军方高层的助力。能给林彪提供助力的，四大金刚是很好的选择。根据后来的调查，那几天，叶群确实频频和四大金刚通话。

那么四大金刚那两天都在干吗呢？

（十）四大金刚的表现

九月十二号那天是星期天，高层人士会选择在那天放松一下。

四大金刚中，邱会作攀上林彪的时间最晚，整人最积极，实际上最不重要。除非林彪成功，否则很难用上邱会作。九月十二号那天，邱家在庆祝孙女出生十天，所以很热闹。邱会作本人原想趁下午开会之际约吴法宪见个面的，因为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唯独没跟吴胖子通气。好歹大家都在坐在同一条船上，不能因为怕人家嘴大就无视吧。但后来因为事多，就没见着。

晚上邱会作多喝了点酒，又吃了安眠药，睡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敬爱的林副主席会在那个时候飞向北方的敌国。因为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他睡前，那聪明的林夫人还打电话给他，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很好听，还说林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打个电话给豆豆表示祝贺。所以脑袋昏昏沉沉的邱会作比其他人更为震惊。

李作鹏是一个比较沉稳的人，考虑比较周全，看问题比较远。当初庐山会议，让吴法宪检讨，李作鹏就看到结局：以后会没完没了。当他自己必须检讨时，就预测以后要被打倒。正是李作鹏向

林彪汇报了毛泽东南巡的消息。但是他同样没想到那天晚上会出事。九月十二号那天，李作鹏干嘛呢？在种地。在海军大院的自留地上消磨了一天的时光。

然而四大金刚中，唯有李作鹏想“帮助”林彪。

九月十二号夜晚，飞机起飞的两个小时前，周恩来打电话通知李作鹏：林彪的飞机要起飞必须通过周恩来、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和李作鹏（副参谋长和海军第一政委）的同意。但是李作鹏改了周恩来的命令：四人中一个下命令就能起飞。

林彪强行起飞时，李作鹏没有做任何阻止。李作鹏当时是山海关海军航空基地的负责人。

如果严格执行周恩来的命令，那么林彪的飞机就不可能起飞。是因为李作鹏知道林彪的最后举动么？当然不是，如果李作鹏知道林彪会跑，断不至于那般。因为林彪跑了，李作鹏留在国内，必然没有好果子吃。李作鹏为啥要篡改周恩来的命令呢？动机很简单，就是紧跟林彪。当时林彪的地位比周恩来高。李作鹏是林彪的人。在不知道林彪最后逃亡敌国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听周恩来的指示对付林彪，没有那道理，也没有那必要。

周恩来给李作鹏的理由是天黑飞行不安全。经验和知识告诉李作鹏，天黑飞行很安全。李作鹏就没想到最坏的结果么？按照李作鹏的说法：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有足够力量阻止林彪。如果必须阻止，应该是中央警卫团的事。

真正能给林彪实质性帮助的应该是吴法宪。因为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理论上手里掌握很多权力，可以带给他很多方便。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吴法宪最早倒向周恩来。

以林彪当时那个地位，没有逃出国境线之前，即使林立衡举报，也不能证明啥。毕竟林彪是全国的第二号人物，坐专机在国内晃悠两圈，没必要向所有人解释和报告——即便是周恩来。

当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飞机时，吴法宪拒绝了，给出的理由是——他要请示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赤峰附近时，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

所谓拦截，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打下来。

实际上从九月十二号晚上开始，吴法宪就在配合周恩来的工作。要不是吴法宪的级别太高，要不是吴法宪之前跟随林彪太紧，要不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检讨太多，要不是日后关的时间长，很可能有人会怀疑吴法宪是“间谍”。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的表现，吴法宪怎么看都像周恩来的人，跟林彪上演对手戏似的。有一个猜测，如果林彪不走，将来开批斗会的话，四大金刚中，最有可能批斗林彪的就是吴法宪。

在林彪的团队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是黄永胜。黄永胜的级别最高，战功最大，地位很重要。总

参谋长是共军的神经中枢，黄总长也是林彪团队的神经中枢，陆军象征之所在。

黄永胜对林彪的忠心自不必说。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打造培养出来的，那黄永胜也是林彪一手打造培养出来的。黄永胜爬得如此之快、爬得如此之高，皆因林彪的栽培。

林彪在还没能看见自己登顶的希望之前就对毛泽东忠心不二，同样，还处于“修炼”阶段的黄永胜，自然也紧跟林彪。在贺龙、罗瑞卿、许光达的案件中，黄永胜都非常配合，出了很大力气。他的配合赢得了回报，九大时晋升为中央委员。

黄永胜跟林家的关系很好，是林家的心腹。叶群也拼命拉拢黄永胜，甚至要和黄永胜结为儿女亲家。以至于日后有传言，叶群和黄永胜的关系不正常。九一三之后，叶群的卡片盒中留下了黄大老粗的打油诗一首：“缠绵五个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月，黄叶热恋时。”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黄总长自然要备战。但是军人出身的黄永胜抓备战的宗旨是：不管国家经济力量如何，必须全面为军事服务，军事第一，一切为军事工作让路。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头头一起研究战备工作时，黄永胜就说：“什么计划不计划、平衡不平衡，一切为了打仗，打仗第一，打仗就不管平衡。”

按照那一套搞法，就不用搞建设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黄永胜搞出来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日后这个命令成了林彪要搞政变的阴谋和预演，因为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指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调动一个排都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全军紧急指示布置完毕，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他的秘书汇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

在毛泽东和林彪玩对手戏时，毛的一只眼睛就盯着黄永胜。因为林彪的意图必然要通过黄永胜来实施。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后来上山的黄永胜立刻被毛泽东拉去谈话，就希望他能够反戈一击——然而黄永胜装傻。庐山会议之后的黄永胜，毛泽东一直让他检讨，他敷衍了事。毛泽东南巡，教育丁盛和刘兴元时就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林彪离开中南之后，基本把整个南方交给黄永胜。

在临近最后决战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丰台车站接见李德生他们，部署三十八军到位的时候，就在那次会面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不在场的黄永胜：“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那时候，大家意识到要对林彪动手了。大家记得，毛泽东在过去只有五九年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才说这种分量的话。

按照《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搞割据，必然是在南方。

九月八号，林彪写下那张“手令”时，同时写了另外一封信，给黄永胜的：“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王飞，生于一九二二年，山东人，抗战初期加入八路军。战火中活了下来，并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解放战争末期加入空军。按照他的资历，原本是没有机会和林家攀上关系的。一九六五年大四清运动时，王光美凭借桃园经验大出风头。叶群不甘寂寞，也跑出去蹲点，王飞就是工作组的一员。王飞机警、反应敏捷，能干事，是个人才；说起话滔滔不绝，口才好；最关键的一点——听话、会做人。叶群觉得王飞行，于是网罗之。

也就是说王飞取得林家信任的时间比周宇驰早。当初林立果前往空军办公室当秘书，主任就是王飞。此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就通过王飞和周宇驰活动。按照林立果的设计，王飞是“北线总指挥”，在必要的时候，负责把毛泽东“保护”起来。

顺便说一下，九一三事变之后，王飞被定为林彪事件的主犯。他知道林立果的全部活动轨迹，远比李伟信和程洪珍知道得多。但是很遗憾，也很奇怪，他患了精神病，没法继续受审。于是就把江腾蛟拉出来代替他，但是江腾蛟的角色远不如王飞重要。如果是王飞受审，那么许多谜团就会有答案。

林彪那封信并没有直接交给黄永胜，而是让王飞交给黄永胜（结果没有送到）。为何这样呢？按照日后研究这件事的专家的解释——林彪故意突显了王飞的作用。既然林彪如此看重黄永胜，那么黄永胜究竟卷入到何种地步呢？

其实和其他几个人一样。

——通过王飞送信这件事，就能从侧面证明黄永胜没有参与林立果的活动。要不然，以黄永胜的级别，林彪断然不会让他和王飞联络。

有一个关键的证人叫费四金，他是黄永胜的贴身警卫。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被隔离审查。根据一贯的作风，要搞材料。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弄清楚黄永胜和林立果的关系。如果黄永胜在九月十二号那天见过林立果，那么黄永胜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关键证人就是费四金。如果费四金想要污蔑黄永胜，只需要点点头即可。当时林立果已死，死无对证。费四金说个谎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那是极其关键的抉择，考验人品和良知的时刻。

人品、良知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很多人而言，一辈子都没有证明人品和良知的机会。很多大人物在不知不觉间就把它出卖了，而在很多小人物身上却完美地存留了下来。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费四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他选择了良知。

面对咄咄逼人的专案组，费四金表示：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黄永胜没有接见林立果。那么黄永胜干啥了呢？去了理发店，然后和儿子一起散步，又去看了孙子。

其实按照那时代专案组的一贯作风，各种证据都做好了。记录（京西宾馆的值班日志）、人证（部分软骨头的人）都有了，哪怕费四金不表态都行。费四金当时指出：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是一个人抄的。

尽管黄永胜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但费四金的行为让人钦佩。他是小人物，也是英雄，是顶天立地的真汉子。

说了这么多，只能证明林彪是匆忙逃走，逃走之前和苏联那边并无具体的沟通联系。

那么他究竟算叛国还是逃亡呢？

这个问题已经纠缠不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必须是叛国。因为那事不是林彪的个人事件，不是林家一家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定位和走向。

要说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还需要介绍周恩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两只手。一只手是林彪，另一只手是周恩来，两人缺一不可。至于江青，呵呵，看起来更像一个长舌妇。

介绍周恩来之前，先介绍一下众人对九一三事件的反应。

（十一）反响

当周恩来向各政治局委员宣布林彪出走的消息之后，张春桥意味深长地对旁边的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你们愁眉不展作什么？这是你们甩了一个包袱，你们解放了！”那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嘲笑和戏弄。

姚文元更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出来庆祝。叶剑英看不下去了，斥责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悻悻作罢。江青的表现更逗，和张春桥一起拉着吴法宪和李作鹏要去玩扑克。

那么毛泽东呢？

得知林彪的飞机上天之后，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汪东兴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然后两人到了毛泽东那里。很显然，这件事超出了周恩来拍板的范围。

很显然，毛泽东也没有料到林彪会决然出走，而且往苏联跑。

四十三年之前，两人在井冈山相遇。那时候，毛泽东的人生正迈向中年阶段，林彪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毛泽东从林彪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从此对林彪信任有加。即使在林彪犹豫的时候，毛泽东也总是开导他。毛泽东作风严厉、性格霸道，对林彪却相当纵容，甚至溺爱。

三十六年之前，毛泽东把林彪放在东北。那个时候，林彪正迈向中年阶段，而他的人生终于在东北达到了巅峰，如同出鞘的倚天剑，刺得蒋介石阵阵寒意。

十二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出山，主持军委。

六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成为亲密战友，站在同一辆战车里，一起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年之前，林彪在庐山发动一场政治闪击战，失败。毛泽东穷追猛打。直到一周之前，毛泽东经过二十九天的南巡，彻底消除了林彪想在国内有所动作的可能性。

毛泽东了解林彪，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如同父亲了解儿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想到，最终的最终，林彪会来这么一手。当程世清在江西陈述那个大胆的猜想时，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那种可能性。但是临了，还是难以解释。

毛泽东在心中念叨：数十年的情谊，就这么分手么，你就忍心离我而去么？

林彪在飞机上默想：数十年的情谊，我不想离你而去，只因情非得已。

彼时彼刻，坐在中南海里的沙发上的毛泽东和三叉戟上的林彪心境太相似吧？

飞机即将离开边境，吴法宪打来电话询问要不要在赤峰拦截林彪的飞机，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该怎么办。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靠在椅背上，沉思片刻。

如果用霹雳手段还来得及，但是向来果断的毛泽东犹豫了：“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要是把副统帅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毛泽东的犹豫正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结：宣传太好，现实太烂。林彪和毛泽东连成一体，毛泽东想动林彪也不容易。这事从日后逮捕四人帮之后，叶剑英的一席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叶剑英当时说，其实很多人老早就对江青他们不满，只因为毛泽东在，投鼠忌器。

一个林彪（党的副主席）尚且让毛泽东如此纠结。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时，那就更没有其他人能反对了。

“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多少感情，多少理性，谁有说得清呢？

好吧，既然你要走，请便。

（十二）转折

事实上，温都尔汗事件不仅是林彪生命的终点，也是毛泽东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从生理上看，他仿佛一夜苍老了很多，身体快垮掉了。

之所以身体快要垮掉，是因为精神倍受打击。

之所以精神倍受打击，是因为思想上遇到巨大难题而不得解。

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的失败，正如大饥荒意味着经济建设的失败一样。人嘛，一旦思想上遇到难题，就会影响到精神，就会波及到身体。如果思想遇到绕不过去的坎，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当初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提意见，涉及到经济建设问题时，毛泽东绕过去了。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升级的时候，毛泽东也绕过去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失败，毛泽东再也没有办法绕过去了。

说起林彪的影响，就要说一下彭德怀。

从三线回北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了残酷的批判，但是彭德怀是硬气之人。刘少奇、贺龙、陶铸、许光达等人都没能熬过去，彭德怀依然活着。其实他活着不如死了，让人心酸。他不是怕死，而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他想死前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还自己清白之身。

其实他还是不明白，有些事不必弄清楚，自己也是弄不清楚的，时间会还原一切。正如岳飞死时不明不白，于谦死时不明不白，袁崇焕死时也是不明不白，但现在这一切都很明白。

其实林彪出走四个月之后，监禁中的彭德怀就听到了林彪反党的消息。按照当时彭德怀的处境，如果不想让他知道，他是绝不可能知道的，陈伯达就是出狱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其实是专案组让彭德怀写材料揭发林彪。彭德怀想不通，表示不理解，不写。

彭德怀已经与世隔绝了好几年。在他的记忆中，不相信林彪会叛逃，正如他自己不可能“里通外国”一样。如果发生林彪叛逃事件，那意味着国家发生了巨大变故，所以他变得焦虑不安。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一九七一年八月八号，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哭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了起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号，彭德怀躺在床上哭了一个小时。彭德怀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之所以哭，无非是生命快到尽头，而小的方面讲，他的冤屈无法洗刷；大的方面讲，国家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中。

当时要批判林彪，需要有分量的人写出有分量的东西。毫无疑问，彭德怀有足够的分量，而且也有写材料的理由。毕竟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林彪是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之一嘛。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三号，专案组向彭德怀传达《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然后让他写揭发材料。

但是彭德怀就是彭德怀，那根硬骨头永远不会软化。在他的脑袋里，他认定林彪不会反革命，那就坚决不会因为听别人的话而改变这个看法。所以他对看管人员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董必武），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如果批判给力，那么彭德怀的人生或许还有一丝转机，原因可以参考邓小平的遭遇。江西的邓小平比彭德怀早些得到消息，他的表态是：“林彪不死，天理不容。”接下来，邓小平抨击、揭发林彪，并向毛泽东写信承认错误，表达复出工作的意愿。彭德怀就没有那种政治觉悟，或许只有那样才是彭德怀吧。

还有一个人的反应也很有趣，就是远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他得知林彪死后，特地喊蒋纬国一起吃晚饭，感叹说：“毛泽东去一臂矣！林彪死了。”蒋纬国第二天在报告上写到：“共产巨人已经断了一条手臂了，让我们等着看他如何失去他的另一条手臂。”据蒋介石的私人秘书透露，蒋介石还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蒋介石为啥掉眼泪？是在为林彪悲伤？蒋介石对林彪虽然有理论上的师生之谊，并无深厚感情。相反，林彪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则很大。或许蒋介石在后悔吧，后悔当年为啥要失去林彪那种人才？追究这个原因仿佛是不可能的。其实毛泽东晚年也落泪。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话：林彪死，毛泽东去掉一臂膀；那么另外一个臂膀是谁？像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连提鞋都不配。

答案很简单，只能是这个人——周恩来。

文革两只手，一只是林彪，另一只是周恩来。

反应最奇特的一个人是周恩来。九一三前后的事情，基本上是周恩来在处理。事情处理完毕后，一切恢复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纪登奎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去看望周恩来，见周恩来坐在临时办公室里发呆，心事重重。两人不知道向来积极乐观的周恩来为啥闷闷不乐，便好言劝慰，周恩来沉默不语。

当纪登奎说：“林彪一伙已经摔死，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周恩来开始默默地流泪，渐渐哭出声来，继而嚎啕大哭。

在两人的记忆中，周恩来永远是乐观的，镇定的，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周恩来并非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也哭。当初父亲过世时，他在重庆大哭一场。叶挺等人的飞机失事，周恩来哭过。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哭过。

但两人也不知道周恩来为啥哭，在旁边陪着。周恩来平静下来之后才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事情还没完，还没完。”

周恩来的眼泪代表什么？

林彪虽然选择不明，但必须是叛国，又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九一三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说复杂，是因为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解释清楚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精彩的一生。要了解他，需要不少篇幅。

林彪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结束，还差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林彪的罪名必须是叛国。

但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解释周恩来。

所以故事要转入周恩来篇。